章实斋年谱 齐白石年谱

胡适著译精品选

胡适／著









安

社



责任编辑 ⊙ 蔡宏淑
装帧设计 ⊙ 包云鸠
⊙ 吴亢宗
⊙ 王为民
⊙ 黄　彦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胡 适 著 译 精 品 选



⊙ 章实斋年谱
齐白石年谱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章实斋 白石 年谱

胡适著译精品选

胡适／著

ZHANGSHIZHAI、QIBAISHI NIANPU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实斋年谱　齐白石年谱/胡适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0

（胡适著译精品选）

ISBN 7-5336-2483-1

Ⅰ.章… Ⅱ.胡… Ⅲ.①章实斋-年谱②齐白石-年谱 Ⅳ.K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2261号



责任编辑:蔡宏淑
装帧设计:包云鸠　吴亢宗　王为民　黄　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7.875
字　　数:200 000
版　　次: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 000
定　　价:13.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出版说明

胡适著述甚丰，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多有开创性的贡献。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本社在出版《胡适全集》之前，先行出版胡适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译）作。这些著（译）作的出版，或采用初版本，或采用较善版本。书中个别有误植、脱字、衍字之处，均予改正。

《章实斋年谱》作于 1921 年，1922 年 1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姚名达补订后，1931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1968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据姚名达补订本重印。1986 年 7 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重行排版，收入《胡适作品集》第 33 册。1991 年 12 月，上海书店又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年本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三编第 76 册。今以商务本为底本，参阅台北远流本整理。(原书名为《章实斋先生年谱》，此次出版将两个“年谱”合为一本，为排版方便省略了“先生”二字。)

《齐白石年谱》由黎锦熙、胡适、邓广铭合编，编至 1948 年，离谱主逝世尚缺八年，故不是全谱。此谱 1949 年 3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 1966 年 6 月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的《胡适选集》年谱分册。齐白石，1957 年 9 月 16 日卒于北京，

享年 94 岁。年谱所缺的年代（1949—1957．9．16），正是谱主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画研究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画院名誉院长，荣获 1955 年度国际和平奖金。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吸收了一些胡适著作整理与研究成果，谨致以谢意！

1998 年



目　　录

章实斋年谱

何　序

替古人做年谱完全是一种论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过一种以事系时的功夫，并不很难；仔细一想实在很不容易。我们要替一个学者做一本年谱，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所以做年谱的工作比较单是研究一个人的学说不知道要困难到好几倍。这种困难就是章实斋所说的“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和“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只有做书的人自己明白。

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年谱》就是这样做成功的。我记得当民国十一年二月商务印书馆把这本年谱印好寄给他的时候，他曾经有下面这一段日记，我现在替他发表出来，来证明我上面所说并不是一种玄想。他的日记上说：

> 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适之先生此地所说的甘苦，我们看了谁亦要表同情。不过他说这本年谱是他的一种玩意儿，一时高兴之作，我个人却不敢同意。我以为适之先生所说的一种玩意儿，一时高兴之作，正是章实斋所说的："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所以就我个人讲，一面想到做年谱这种工作的困难，一面看到适之先生这本年谱内容的美备，我实在不能不承认这本书是一本"即景会心妙绪来会"的著作，不是一种"玩物丧志无所用心"的玩意儿。

这种工作当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们坐享其成的读者却不应过度的去求全责备。

今年秋间王云五先生因为很赏识适之先生这本年谱，所以要把他选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里面去，预备将版式改排。适之先生知道了，就很虚心的趁这个机会托一个对于章氏学说很有研究的人代他增补一下。这位受托的人就是刚从北京清华研究院毕业南下旅居上海努力读书的姚达人先生。当达人先生进行他那增补工作的时候，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里来交换一次我们对于史学的意见。他因为研究章氏已经三四年了，身边又带有充分的材料，所以能够从九月到十月不满一个月的工夫就完成他的工作。我知道他实在补进了不少的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适之先生当时还没有发现出来的；因此这本年谱便更加美备了。

达人先生增补完工之后，就把这增补本交给适之先生去校正。适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并且向达人先生说：他近来听见我对于章实斋的史学已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要叫我代他们两人再做一篇序表示我近来的心得。当达人先生把这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很是迟疑，但是亦就立刻答应。

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匡谬》篇中曾经说过："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美观也"；这是一句很合理的话。我们应该服膺他。我既然不是做这本年谱的人，当然不应该谈这本年谱的"作书之旨"。适

之、达人两位先生和我三个人既然多少都是私淑章氏的人，那末适之先生不该发起叫我做这篇序，达人先生不该附和他，我亦不该答应他。这是我所以迟疑的缘故。但是我当时反省了几分钟，终于答应了，而且自己觉得很有理由。

第一，我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有一种特殊的交情。我和适之先生的文字交，始于民国二年的夏季。我记得当时他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我是一个投稿的人。民国四五年间我和他才在纽约常常见面谈天，成了朋友。民国六年以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了五足年的书，又和适之先生同事，而且常常同玩。他和我不约而同而且不相为谋的研究章实斋，亦就在那个时候。结果他做成了一部很精美的年谱，我做了一篇极其无聊而且非常肤浅的管见。我的翻译《新史学》亦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了他的怂恿。民国11年后我到杭州办了两年最无聊的教育，受了两年最不堪的苦痛。可巧这时候适之先生亦就在西湖烟霞洞养他的病；而且据我所知，这次的休养是他平生最长的一期。现在我们两人又不期而然不约而同的同在上海过活了。我以为就十七年来行止上看，我们两人的遇合很有点佛家所说的“因缘”二个字的意味。

至于我和达人先生的交情，比较的时间很短。我们两人开始互通音问，不过三年；两人见面不过数月。但是我看见他这样热心的研究章实斋，他今年夏天为

了研究章实斋冒暑到绍兴去，到杭州去；我又看见他这样热心的努力学问，甚至辞去各地学校的聘请，单身自备资斧留居上海，一心向学问上努力。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学术界的情形和一般社会的风气，对于达人先生这种心胸那能不肃然起敬呢？他在上海的时候，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中谈一次话；而章实斋有时就做我们谈话的中心。所以我们定交的时期虽短，交情却已不浅。所以，就我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的交情而论，我虽然不敢以“章氏同志”的名义来互相标榜，我对于他们两位研究章实斋史学的经过却还配说几句话。

其次，我所以敢于承受他们的委托做这一篇序文的原因，就是我想趁这个机会，表示我自己一点忏悔的意思。我的研究章实斋大约在民国八九年的时候。现在自己回想那时候的情形，正像乡下土老游了半天的上海，就回家去向乡下人大谈上海的风光一样，我那篇《章学诚史学管窥》的文章就是这样做成功的。我现在每再读一遍《章氏遗书》，总要回想到那篇肤浅贻笑的文章不该发表，背上总要流了一次汗。我因为要想利用这个机会说几句忏悔的话，所以对于他们两位的委托，不但不加拒绝，反而极其愿意了。

章实斋推崇郑樵的时候，曾经说过：“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现在我把他这几句话来做一个比

论。我觉得从前研究章实斋的人，恐怕都只是求《文史通义》的事和文而不求他的义。从前的学者对于《文史通义》何尝不看得很宝贵。我们只要看章氏生前和死后一般学者争读或者争刊《文史通义》的情形，真有“洛阳纸贵”的神气。这种热心章氏学说的人我们当然不能不表示相当的敬佩，因为他们总算是能够赏识《文史通义》的人了。但是我以为他们所赏识的部分和我们现在所赏识的部分，却有根本上不同的一点：这就是他们所赏识的是《文史通义》中的事和文，我们所赏识的却是义。

我觉得从前赏识《文史通义》的学者差不多可以分做两大类：识见较高一点的，用经今古文的眼光来观察章实斋，硬要把他拖到“门户”里面去，把“六经皆史”这句话看做章氏一生学问的唯一贡献。而所谓今文家中人亦就扭住了这句话来打倒《文史通义》的全部书。古文家误以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是拥护他们的护符；今文家又误以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是打倒他们的凶器。结果他们两家都把章实斋看作“门户”中人了。我以为章氏固然是门户中人；这种拖人下水使他同流合污的情形，在科学方法还没有传入以前的中国学术界谁亦免不了；这不是章氏的罪过。但是我以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伟大的贡献，绝对不在“门户”中，却在门户外。这一班学者就是我的比论里所谓只能赏识《文史通义》中的事的人。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赏识《文史通义》中的文章，他们对于章氏讨论课蒙作文等方法的文字，尤其倾倒到万分。我以为他们这种识见实在是一种“帖括”的识见，亦是一种“骨董”的识见。他们所赏识的《文史通义》是赏识“墨卷”，赏识“册页”。章氏的文章当然是模范的“墨卷”和宝贵的“册页”。那是无疑的了。但是我以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伟大的贡献，绝对不是他的文章，却是他文章中所存的义。这一班学者就是我的比论里所谓只能赏识《文史通义》中的文的人。

我细细把适之、达人两位先生的著作读了一遍之后，我敢说据我所知道的人而论，唯有他们两位才真正能够赏识《文史通义》的义。我以为章氏的贡献，并不在事，更不在文，实在在义。这个义就是他对于史学的卓见。这种卓见最重要的，我以为有三个。我以为适之和达人两位先生已经能够把他们提出来编到这本年谱里面去了。但是因为年谱分年的缘故，这种卓见不能不分散到全书的各部分，读者不容易一目了然；所以我在此地代他们两位做一点比类的功夫，并且就把这一点功夫当做我自己近来研究章氏的心得，请他们两位指教。

我以为章氏对于中国史学上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记注和撰述的分家。换句话说，就是他能够把中国二千年来材料和著作畛域不分的习惯和流弊完全廓清

了，而且因此并能够把通史的旗帜树得非常的鲜明夺目。这是章氏独有的特识。原来自从唐代刘知几首倡纪传、编年两种体裁的学说以后，中国史籍上材料和著作的门类从此不分；而且这两种体裁并亦从此变成我国史籍分类的标准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编年类的序里面说："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刘氏两体说的根深蒂固定为一尊，就此可见一斑了。我以为我们倘使用史料的眼光去看我国这样丰富的史籍，又何必独限两体？照《四库全书》的例分做十五类，亦何尝不可？因为所有史籍既然都当做史料看，那末类例的繁简在史学上就没有很重大的关系了。

我国史籍的门类自从尊奉两体为正宗以后，不但所有历史的著作，永远在两体里面翻筋斗；就是通史一类著作亦几乎从此失去了独立的希望了。郑樵虽然曾经辨明"史"和"书"的不同，而且高树通史的旗帜，但是能够赏识他的人实在寥寥可数。《四库全书》里面"别史"一类，虽然大概都是含有通史性质的著作，但是总目叙里所说的话，依稀恍惚，并没有露出一点通史的意思；只是在《通志》的"提要"里面稍稍提及了一点通史的源流。纪昀的学问这样渊博，好像还没有见到通史是可以自成一家的一种著作。这不是材料和著作没有分清的一种流弊么？后来我国的历

史家尤其正史家看见司马迁用纪传的体裁得到了著作的美名，往往一心一意的去做所谓貌同心异的工作；因此我们就有《三国志》、《新五代史》和《明史》这一类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作品。当作通史看，嫌他们太繁杂了；当作史料看，又嫌太简单了。这不是材料和著作分别不清的又一个流弊么？

章实斋见到了这一点了。所以他在《史考释例》那篇文章里面，虽然还说“纪传、编年未有轩轾”的话，但是他对于材料和著作的分别看得很明，说得很透。他在《书教》篇里面说：

>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章氏此地所说的“撰述”，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著作”么？所以要能够抉择去取例不拘常。他所说的“记注”，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史料”么？所以要能够赅备无遗体有一定。他这种见解或者受了刘知几和郑樵的暗示亦未可知；因为刘氏在《史通·史官建

置》篇里面，曾经有过下面几句话：

> 夫史之为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郑樵在《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中亦曾经说过几句惊人的话：

> 有文有字，学者不辨文字；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书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

刘氏所说的“当时之简”和“后来之笔”，以及郑氏所说的“书”和“史”，显然可做章氏所说的“撰述”和“记注”的张本。但是我们看到章氏所说的话这样透辟，这样明白，很觉得不是自己对于史学原理“心知其意”的人，绝办不到。

而且，章氏对于材料和著作关系的密切看得极清，说得极精；比较刘氏单单说了“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八个字，真是大有“天渊之别”了。章氏在《报黄大俞先生书》里说：

>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章氏此地用“韩信用兵”和“萧何转饷”两句话来形容材料和著作互相为用的关系，真可以说是深切著明天造地设的比喻了。但是现在编纂我国国史的人好像还要努力追随司马迁的决择去取，不屑做班固那种赅备无遗的功夫，那真章氏的罪人了。我国现在的史学界要等到西洋史学原理介绍进来以后，才满口高谈“史料”二个字，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呢！

章氏对于史学上第二个大贡献我以为就是他对于通史这一类著作的观念表示得非常切实非常正确。我在上面曾经说过：我国史籍的门类自从尊奉纪传、编年两体为正宗以后，不但所有历史的著作永远在两体里面翻筋斗，就是通史一类著作亦几乎从此失去了独立的希望。所以刘知几虽然露过一点通史的意思，郑樵虽然有过通史的主张，但是《四库全书》把通史归

到不伦不类的别史一类里面去。独有章氏对于这一点见得很到，他在《文史通义》里面所发表的通史观念真可以说是详尽无遗、首尾完具。通史的意义怎样？通史的利弊怎样？通史编纂的沿革怎样？章氏对于这三个问题都有极深刻的了解。从前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里面，虽然曾经有过下面几句话："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但是此处所说的"前后相会，始末可寻"，不过稍稍流露一点通史的意思，决不能和章氏所抱的"纵横经纬"的观念相提并论。

郑樵在《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里面，亦曾经说过几句惊人的话，他说："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纪法制。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他因此主张史料以外应该另有通史。这真是郑樵独到的特见。只可惜他的遗著，除《通志》以外，并不很多；而且就此区区亦还要让七百年后的章实斋来代他鼓吹，来代他发挥光大。这是郑樵的不幸。不过我们就《通志》看来，郑樵所主张的通史可以说是"司马式"的通史，充其量不过打倒了班固以后的断代。至于章氏所主张的通史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史完全一样。这是章氏青出于蓝的卓识。他的伟大，就在这种地方。

章氏心里面所抱的通史观念，我以为在《文史通义·答客问》那篇文章里面最发挥得透辟。

他说：

>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此地所表示的观念纯粹是我们现在中外史学界共同努力而又还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寥寥几句话竟把通史这个观念全部活现在纸上了。至于通史的利弊和通史编纂的沿革，他在《释通》篇里面说得很合理叙得很详尽，我因为这两层比较的不重要，所以不去引他的原文了。

但是事实上章氏对于通史观念的表示，并不止上面所述的这一点；我以为他另外还有两种表示，很可以证明他对于通史的观念非常看得重要。我以为第一种是消极的表示，这就是他对于郑樵《通志》和袁枢《纪事本末》两种著作的极意推崇。我们知道章氏对于

史学很是自命不凡，同时批评别人亦很是不留余地。我们看他批评史学家如欧阳修，文学家如韩愈、苏轼、王安石，哲学家如戴震、汪中，何等苛刻；至于袁枚这样人更是不在他的眼里了。料不到他对于郑樵和袁枢两人的崇拜竟几乎弄到五体投地的地步；他竟称郑氏的著作为“为世宗师”，称袁氏的著作为“神圣制作”。这不是因为郑、袁两人是通史专家所以章氏引为知己么？章氏本亦很知道《通志》和《纪事本末》两书的本质很难叫人家满意；所以他说《通志》是“实不副名”，《纪事本末》是“本无深意”；但是因为他们能够“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他们是“通史家风”，所以他不能不崇拜他们，不能不极口赞美他们。

第二种我以为是积极的表示：这就是他对于纪传、编年两类正史，主张另编一种别录去补救他们的缺点。他好像觉得我国以前的史料既然都保存在纪传和编年两类史籍里面，我们要在根本上去改造他们当然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亦不必这样办。但是他们的义例虽然很精，文章虽然很富，而史的宗要却很难追求，这是因为“纪传苦于篇分，编年苦于年合”的缘故。所以他主张在诸史目录之后另做一篇别录附上去。他说：“诚得以事为纲，而纪、表、志、传之与事相贯者各注于别录；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治史要义，未有加于此也。”他这种整理我国旧史的方法，如

果能够实现，岂不是可以作我们更上一层达到中国通史的理想境地的津梁么？

所以我以为我们假使把章氏对于通史的学说综合起来，考察一下，那末他对于通史的观念或者可用下面几句话代他表示出来：

> 通史这种著作要能够“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编纂通史的方法要能够“参百家之短长，聚公私之纪载，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叙述通史的文章要能够不落旧套，“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我们一定要这样办，我们才可以希望得到一部理想的通史。所以他说：“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对于通史的观念真是明确极了。他的说明亦真是透辟极了；何以他的学说到如今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了，竟没有过一个知己，还要让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来竭力鼓吹和表扬呢？我以为通史的性质神明，变化经纬纵横，原来是一种“心知其意，传诸其人”的东西。纪昀在《〈通志〉提要》里面曾说通史的编纂

“非学问足以赅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我国通史一类著作的缺乏，和章氏学说的“曲高和寡”，原因恐怕就在这里罢。

章氏对于史学上第三个大贡献，我以为就是他所说的“天人之际”完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章氏自己曾说他的“原道”和淮南子、韩愈两人的“原道”不同；我以为我们亦可以代他说一句话：就是他的“天人之际”和汉代儒宗董仲舒辈根据阴阳五行而产生出来的“天人之际”，真正是风马牛的不相及。现在让我来把他这一说略略的疏解一番。

章氏在《文史通义·史德》里面说：

>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章氏此地的意思就是说精于史学的学者应该辨明什么是客观主义，什么是主观主义；应该纯用客观主义去观察一切事物的真相，不应该参杂丝毫主观的成见。这是章氏对于史学上客观主观的学说的一个大前提。

但是他说：

>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

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

他此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虽然寻常都多少抱有辨别是非的识见，但是这一些些辨别的能力要应用到史学上客观主观的原理上去，决是不够。

他又说：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他此地意思就是说：历史的内容是人类的事实，事实的外表就是史文。历史家研究人类事实的时候，看见他们有得失是非和盛衰消息，当然免不了出入予夺和往复凭吊的心理作用，因此就免不了生出气和情来。这种气和这种情就是史学上主观主义的两个原素。这两个原素尽量在史文上发表出来的时候，就是世界

上绝顶的好文章。但是这里面有客观和主观的不同，我们应该辨别清楚。

他又说：

> 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

此地的意思是说：凡是人类总不免有气，不免有情。换句话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总不免抱有主观的见解。这是无可避免的东西。

照这样说来，那末我们人类岂不是永不能得到一部平心静气秉笔直书的历史么？章氏以为不至于这样的；他居然提了一个调剂的办法来。

他说：

> 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

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观里面的气本来是违理自用的，倘使能够合于理，那就是客观的了。主观里面的情本来是汩性自恣的，倘使能够本于性，那就是客观的了。章氏此地主张用合理两个字来救济主观的气，用本性两个字来救济主观的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用我们的理性来限制我们感情的冲动，那末

我们主观里面的气和情自然可以和客观里面事实的真相两相印证，两相符合了。

章氏还要再进一步来说明什么叫做合理的气，和什么叫做本性的情。

他说：

> 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他的意思就是说：合理的气是我们燕居的气；至于因感而生的宕的，激的，和骄的气，都是不合理的。本性的情都是我们虚置的情；至于因感而生的流的，溺的，和偏的情都是不本性的。不合理的气和不本性的情都是由感动而来，不知不觉的伏在我们的心理中，发表在我们的文章上，我们应该注意他们。他的结论就是要我们“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章氏所说的话虽然不一定和现代心理学家完全相

合，但是他对于史学上客观主观的分别看得这样清楚；他对于主观里面两个原素的分析和性质，说得这样彻底；他对于限制主观达到客观的办法想得这样周到；我个人对他，实在不能不五体投地崇拜到万分。我近来再去翻看德国海尔达尔（Herder）的“观念”说，海格尔（Hegel）的“民族精神”说，英国白克尔(Buckle) 的“文化进步的定律”等等“历史的哲学”，我总要发生一种感想，觉得他们的见解太是肤浅，太是没有实质上的根据。就我个人研究世界各国史学名家所得到的知识而论，我以为单就这“天人之际”一个见解讲，章氏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至于我此地对于章氏发表出来的气和情，有没有不合于理和不本于性的地方，那只好请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指教了。

我对于章氏史学上的贡献见得到的虽然还有几点，但是我以为关系比较的不很重大，所以不再列举下去了。至于章氏在我国学术上别方面的贡献已经经过适之先生的全部研究而且已经在这本年谱里面发表出来，我亦不必再去画蛇添足了。章氏生在一百二十多年以前的中国，当然免不了受当时学术上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有许多不能使我们现在学术界中人满意的地方。关于这一部分，亦已经有适之先生合理的批评，我更不敢再做狗尾续貂的功夫了。不过我觉得这本年谱里面还有几处地方，虽然不很重要，但是值得我们略略

的再加以讨论。

年谱五十三岁条下：适之先生认章氏把掌故列为方志里面的专书确是章氏的一大贡献。我以为这一点根本上算不得一种贡献，因为我国自唐、宋以来早已有杜氏、郑氏、马氏辈所著的《三通》了；所以掌故列为专书无论是在国史里面或者在方志里面并不能算是章氏的特见。倘使掌故已经列为专书，那末在正史里面当然不必架床叠屋过于详细。适之先生以为章氏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所以说章氏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章氏对于《新唐书》以下的批评是可笑的“梦话”。我以为此地适之先生自己有点弄错了。章氏明明主张方志立三书，就是志，掌故，和文徵；这三书都应该列为专书的。章氏并没有单单说掌故是重要的；他实在说掌故应该列为专书的。所以他的主张和批评并没有矛盾，并没有闹成笑话和梦话。

年谱五十七岁条下：适之先生很赞美章氏《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书》。他说“此书首论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于已’，真数千年史家未发之至论。中间叙修志时之种种困难，末段自述作文的方法，皆绝重要之传料。”我以为适之先生有点不免用文学的眼光去赏识这篇文章，所以他对于中间那一段文字只截取了五句话，说是章氏叙修志时种种困难。我以为这一段文字的价值并不止这一点。这是一段对于我们现在

所谓“历史研究法”的极简括而且极精辟的纲要，他把历史研究法里面所谓“搜罗史料”、“参互考订”、“断定事实”和“编比成书”的各种重要步骤和历史家进行这种工作时的甘苦，都在这寥寥三百余字里面完全表示出来了。这亦本是章氏对于史学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不应该轻轻地放过他。

年谱五十七岁条下：适之先生以为汪中的《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这篇文章用意立言皆深可佩服，而实斋乃作长文驳他：此真“绍兴师爷”之伦理见解。我以为适之先生这句话不但嫌他轻薄，而且亦不很合理。因为我国学术界中“卫道”的先生们不止一个章氏，而且我们又明明知道章氏是宋学里面比较“开明”的一个人；我看适之先生在年谱里面很有几处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关系能够原谅章氏的地方，何以在此地独不肯放松他一点，要说他是绍兴师爷的见解呢？

此外，年谱里的书法，有时称章氏为先生，有时又称他为实斋，我觉得这种随意杂举的办法，不但嫌他义例不纯，有背章氏“临文而称先达，则必著其名讳，不可泛称字号，使人不知为何人也”的主张，而且容易使读者得到一种玩弄前辈的印象。这一点关系虽小，但是我以为我们在传述文字上既本春秋家学，法度却不可不严。

我研究章实斋所有的心得不过如此；我拜读适之、

达人两位先生合著的《章实斋年谱》以后要想提出讨论的意见亦不过如此，我很怕不能满足两位先生委我做序的一番好意。但是我自信这一篇文章或者可以当做我自己从前对于章氏研究得很肤浅的一篇忏悔录；倘使这一个目的果然能够达到了，那我就要谢谢适之、达人两位先生，能够给我一个这样好的机会。

最后我还有两个愚见要提出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商榷。达人先生曾经告诉我说他想另做一部章氏史学的书。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章氏的史学实在值得我们去研究他。不过我以为达人先生对于章氏可以走的有两条路：或者仿"记注"的意思重编一部赅备无遗的《章氏遗书》，或者仿"撰述"的意思做一本最多十万字的《章氏史学》，我们似乎不应该再闹记注、撰述两无所似的笑话。这是我想贡献给达人先生的一点愚见。不知道适之先生以为怎样。

还有一点，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下面这种风气：就是凡是我国原有的东西不管好坏总要加上一个很时髦的"国"字来做保镳的武器。你看中医一道现在叫做"国医"了；技击一门现在叫做"国术"了；甚而至于中国的饭铺亦叫做"国菜馆"了；这都是"国学"两个字引出来的流弊。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

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

民国十七年十月十八日，
何炳松于上海闸北寓中。

姚　序

我专门研究章实斋一家之学，已经三四年了：

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我父亲的指示，去买了一本胡适之先生做的《章实斋年谱》，到四月二十三日看完以后，才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月二十九晚，偶听何柏丞先生讲《文史通义》，才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然而无钱无友的我，到六月十一日才借到一部石印的《文史通义》来读，十七日才买到一部木刻的《文史通义》来读；至于浙江图书馆印的《章氏遗书》是得见而不得读，刘翰怡先生刻的《章氏遗书》是方知而无力买！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即初到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第二天，初受业于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

史学史的研究，就在“专修题”内认定了“章实斋的史学”一门。十月十八日始业，买浙本，借刘本，足足理解了一学期。

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起了一个信念，以为：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学，则颇疑他的环境不易产生他这种学术；最后乃断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响。而影响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鲁。那天便发心愿替邵先生做年谱，先来了解他一下。又两日就动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后来经过了十几次的补订，到十七年春始由柏丞先生介绍，付商务印书馆发印。

十五年春，再读《章氏遗书》，随手把《章实斋年谱》补了些新史料上去。六月二十日，初见适之先生，问他怎么办；适之先生说：请你拿一本年谱去，把她补好了寄给我。——但我不曾即刻践约，因为他往欧洲去了。七月，我回家去，又因我父亲的指示，打算改编《章氏遗书》。《章氏遗书》的各种版本都编次得不好，这是读者所公认而最感不便的。我不但想用新的分类法去改编它，而且想把人家批评或记述章先生的文章都附在她后面，使得读者对于章先生能得整个的了解。照这例，适之先生做的年谱自然最好是也摆在她后面；但因版权的关系，不能够。所以我就在那暑假内，自己另写了一部新的《章实斋年谱》。那新谱做的方法和适之先生的不同（和内藤湖南先生的略似而材料较

丰，且那时我尚不懂日本文，未读《内藤谱》)。直至十六年四月，才在《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四号发表。

十五年秋冬间，果然就刘刻《章氏遗书》改编成了一部《章实斋遗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个年表。十六年春，送这些给任公先生看，他很高兴，说：就拿给商务印书馆印行吧。我回说：慢点好，因为《文史通义》的最重要的几篇还不知是何年月做的。

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师朱笥河；自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十六间，不知不觉的又写成一部《朱笥河年谱》。做那年谱比做《邵念鲁年谱》容易多了。因为史料都是现成的；然而朱谱没有邵谱好，我自信：邵谱有许多创例，是空前的，如用直叙法，多制图表，辟“谱前”“谱后”两体等。写朱谱原是为的帮助“章实斋”的研究，任公先生又说朱笥河够不上做年谱。到“章实斋”的研究完毕时，那朱谱也可以销毁了。

经过了上述的工作，对于章先生的渊源应该是很亲切的了解了。至于对他学术思想的论评，也曾写过几篇文章发挥一己的意见；但隔了些时，便不满意，终究毁了，虽曾发表过。我对于章先生要说的话当然很多，但多记在片纸上；到认为见解已熟时，才可撰成有系统有组织的论文。所以自十六年以来，我就不肯做文章了。恰好那年春夏，任公先生要我帮他整理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和《广中国历史研究法》二种讲义，所以只好暂把“章实斋”丢开了。

王静安先生是十六年夏死的，他死了我才遍读他的著述，才深解他的学问。这里也有一点小影响，使我不得不注意《章氏遗书》的版本问题。章先生自己说过，他的文章，生前已有异同；但我们不曾留心。刘刻虽博，亦不及广征别本。我随便拿别本来校，除了抄胥手民因形似音近而致误的文字以外，整段的多寡，整句的异同，两皆可通的文字，就不知有多少，几乎没有一篇全同的。因此，我又化了好些工夫，去校勘《章氏遗书》，不管是单行本，丛书本，杂志本，只要在北京能找出的，我都找来校过了。北京虽是书籍集中的所在，但我所要找的《章氏遗书》钞本一本也不曾看到。十七年六月中我做《章实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义》，便不能不搁笔。八九月里，所以远渡东海，浪游两浙，不恤金钱和时间，不畏危险和辛苦的缘故，只是要找几个钞本看。虽然旅行的结果很不错，足以助我解决许多问题；但此行竟把我父亲吓坏了。他老人家从我简略的家信里看见我犯暑蹈危，东奔西跑，以为我是忙于求食，写信给我，竟说“谁令为之？吾有隐恸！”那时他正抱病，竟把他身边仅存的七十元邮寄给我，为的是怕我成野莩的一个。

说到这里，应该回头说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从上海到北京，谈起适之先生的近

况，说《章实斋年谱》又要改版了。我想，适之先生一时未必有补订这书的时间或趣味，我又曾经允诺过他的吩咐而不曾实践，就趁阳历年假，完结这场心事吧。起初是把我所补的插入原文中间，把原文偶错的径加删改。后来因侃如以为不免有灭裂卤莽的嫌疑，又把应补应改的另抄为一小本，邮寄适之先生，请他自家去动手。

九月十九这天，适之先生谈时提起那小本子，说我的事忙竟使我不曾完结这点工作，现在请你拿去代我增补好吧。当时就商定了增补的体例，再过二周就成功了这本书——增补《章实斋年谱》。

*

这本书成功以后，适之先生要我做篇序。我这篇序想说明三点：一是我曾经怎样的研究章实斋，上文已说过了；二是我对于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年谱》有什么意见，三是我怎样的代适之先生增补这年谱，下文便是。

适之先生这书有一点是我所最佩服的，就是体例的革新：

打破了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

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

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

注明白史料的出处；

有批评；

有考证；

谱主著述年月大概都有了。

她不但令我们明白章实斋整个的生平和重要的学说，而且令我晓悟年谱体裁的不可呆板。最少，我是受了她的影响的一个。我因看了她才去研究章实斋，才跑进史学这条路，才得著学问的乐趣，才决定终身的事业；我又因看见了她才敢创制许多图表加进《邵念鲁年谱》，才敢扩充谱前谱后到前后数十年数百年。对于个人的彻底的研究，她是史学史上的第一页了。

若问我对于她有没有些微不满意，也有。这是适之先生自己说的，初期的白话文不能纯粹，颇有文语混淆的毛病。其次便是偶然的错误也有几处；更次便是批评、考证和记述和文章似乎有不曾分开的遗憾（这点我从前很固执，现在又似乎承认不分开也不要紧了）。

上文说过，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现在适之先生叫我把她装饰一番，我"饮水思源"，怎不愿她长成一个完满润艳的美人呢？下文我便把增补这本书的条例，略为说明几句：

1. 极力尊重适之先生的原文，除非有新的证据可以改变他的记载，否则决不删改或修移。

2. 适之先生解释章先生主张的话，尤其特别尊重；虽然有一二条和我的意见不同，但我在这增补本里绝对不说一句话。我要说的话尽在拙著《章实斋的史学》里说；若在这里，恐有鱼目混珠之讥。

3. 凡适之先生所遗漏的，当时尚未发现的史料，我都按照年月，分别插补入原文，并不说明谁是新补，谁是原文。

4. 合于下列的资格的史料，都收在这增补本里：

A. 谱主有意识的行动（全录）；

B. 谱主最重要的著述（节录）；

C. 可显谱主真性的小事；

D. 谱主被人轻视的轶事；

E. 谱主理论文章的著述年月（不关紧要的记述文章虽知作年亦不录）；

F. 谱主关于一己学术的自述自评；

G. 谱主与时人、时风、时事的接触；

H. 谱主不为人所知的事迹著述经我考出来的；

I. 与谱主极有关系的人的生平。

总说一句话，凡是这增补本比初版较多或不同之处，都由我负责；倘有错误，和适之先生不相干，虽然这增补本经过适之先生校阅。

至于我所根据的《章氏遗书》，也得说明：

1. 会稽徐氏钞本，即浙江图书馆排印本。这本的好处是目录下有注。
2. 山阴何氏钞本，即杨见心先生藏本，即马夷初先生转钞本，即《杭州日报》、《中国学报》传印本。这本的好处是编次最有条理。

3. 刘翰怡先生刻本，据说是据王宗炎所编、沈曾植所藏的钞本，加上《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和州志》、《永清志》、《湖北志稿》和几种札记。这本的好处是收罗得最丰富。
4. 《纪年经纬考》。
5. 此外散见于《国粹学报》、《古学汇刊》、《禹域丛书》、《艺海珠尘》及其他丛书或杂志的遗文，也曾参考，不必详举了。

写到这里，不能再写了。自从接到家电，便心慌意乱。在倚装待发之际，匆匆写了这篇，实在不成样子，也顾不得了。

到最后的一行时我想起适之先生的先见和大量，柏丞先生的启发，任公先生的教诲，家父的指示，湖南先生的提倡章学，翰怡先生的刊刻章书，以及杨见心先生、马夷初先生、浙江图书馆的假我藏书，章川岛先生与其令尊翁的助我找史料，都是这小本子成功的动力，我至诚极挚的感谢他们，敬祝他们健康！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姚名达在上海

胡　序

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支那学》卷一，第三至第四号）。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一位专讲史学的人，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文献徵存录》里确有几行小传，但把他的姓改成了张字！所以《耆献类徵》里只有张学诚，而没有章学诚！谭献确曾给他做了一篇传，但谭献的文章既不大通，见解更不高明：他只懂得章实斋的课蒙论！因此，我那时很替章实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

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这真是王安石说的"世间祸故不可忽，箦中死尸能报雠"了。

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我读了内藤先生作的年谱，知道他藏有一部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替我把这部遗书的目录全钞了寄来。那时我本想设法借钞这部《遗书》，忽然听说浙江图书馆已把一部钞本的《章氏遗书》排印出来了。我把这部遗书读完之后，知道内藤先生用的年谱材料大概都在这书里面，我就随时在内藤谱上注出每条的出处。有时偶然校出内藤谱的遗漏处，或错误处，我也随手注在上面。我那时不过想做一部内藤谱的"疏证"。后来我又在别处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记在一处。批注太多了，原书竟写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个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谱。这便是我作这部年谱的缘起。

民国十年春间，我病在家里，没有事做，又把《章氏遗书》细看一遍。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章实斋的学问与见解。我觉得遗书的编次太杂乱了，不容易看出他的思想的条理层次；内藤谱又太简略了，只有一些琐碎的事实，不能表现他的思想学说变迁沿革的次序。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先生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

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因此，我决计做一部详细的《章实斋年谱》，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这个决心就使我这部年谱比内藤谱加多几十倍了。

我这部年谱，虽然沿用向来年谱的体裁，但有几点，颇可以算是新的体例。第一，我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摘录的工夫，很不容易。有时于长篇之中，仅取一两段；有时一段之中，仅取重要的或精彩的几句。凡删节之处，皆用“……”表出。删存的句子，又须上下贯串，自成片段。这一番工夫，很费了一点苦心。第二，实斋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也有很错误的话。我把这些批评，都摘要抄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我这部年谱，不但说了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例如他批评汪中的，有许多话是不对的，我也老实指出他的错误。我不敢说我的评判都不错，但这种批评的方法，也许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

章实斋的著作，现在虽然渐渐出来了，但散失的还不少。我最抱歉的是没有见着他的《庚辛之间亡友传》。年谱付印后，我才知道刘翰怡先生有此书；刘先生现在刻的《章氏遗书》，此书列入第十九卷，刻成之

后，定可使我们添许多作传的材料。刘先生藏的《章氏遗书》中还有《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和州志》(不全) 三卷，我没有见过。我希望刘先生刻成全书时，我还有机会用他的新材料补入这部年谱。

章实斋最能赏识年谱的重要。他在他的《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说：

> 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始末焉。然犹不能不阙所疑也。其穿凿附会，与夫卤莽而失实者，则又不可胜计也。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

照他这话看来，他的著作应该是每篇都有撰述的年月的了。不幸现在所传他的著作只有极少数是有年月可

考的；道光时的刻本《文史通义》已没有著作的年月了。杭州排印本遗书与内藤藏本目录也都没有年月。这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谁料说这话的人自己的著作也不能免去这一件“大错”呢？我编这部年谱时,凡著作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编注;那些没有年月的,如有旁证可考,也都编入。那些全无可考的,我只好阙疑了。

我这部小书的编成，很得了许多认得或不认得的朋友的帮助。我感谢内藤先生的年谱底本，感谢青木先生的帮助，感谢浙江图书馆馆长龚宝铨先生钞赠的集外遗文，感谢马夷初先生借我的钞本遗文，感谢孙星如先生的校读。

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胡适在上海大东旅社。

大事索引

编《和州志》	乾隆三十八		
及《文徵》	—三十九	36—37	65—68
始主书院讲席	乾隆四十二	40	72
编《永清县志》	乾隆四十二		
	—四十四	40—42	72—79
成进士	乾隆四十三	41	77
著《校雠通义》	乾隆四十四	42	79
编《史籍考》	乾隆五十二		
	—五十三	50—51	92—94
	乾隆五十五		
	—五十九	53—57	103—129
	嘉庆元—三	59—61	140—150
编《亳州志》	乾隆五十四		
	—五十五	52—53	97—103
编《湖北通志》	乾隆五十七		
	—五十九	55—57	118—129
始刻行《文史通义》			
一部分	嘉庆元	59	140
卒	嘉庆六	64	162
《文史通义》大			
部分刊行	道光一十二	（卒后31年）	163

年　谱

先生名学诚，字实斋，号少严，原名文敩。生长于清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据《偁山章氏家乘》）章氏始祖仔钧，五代时起家于福建浦城。北宋末，章综移居浙江山阴。南宋光宗、宁宗间，章颜武（文叔）再迁，始居会稽偁山南之道墟。（《章氏遗书》的《神堂神主议》、《乐野先生家传》、《章氏后宅分祠碑》，及《章氏家乘·章大来后甲集》下，页二十七）

到清乾隆时，道墟章氏已有万余人。人多，地瘦，种稻不足自给，所以就有种木棉、酿酒、做师爷三种职业。那地方上的人大都明锐而疏达，做事业往往有所成就。（《乐野先生家传》、《汪泰岩传》）实斋先生的曾祖子正，祖君信，都住在道墟。君信先生，名如璋，是候选经历。配易氏，继

配沈氏。“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晚岁闭关郤扫，终日不见一人。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益有味乎其言。”（《刻〈太上感应篇〉书后》及《仲贤公三世像记》，《家乘》卷一页四十八，《朱筠笥河集·祭史孺人文》）

父名镳，字骧衢，亦曰双渠，号励堂，又号岩旃。乾隆丙辰举人，壬戌进士；辛未官湖北应城知县。丙子罢官，贫不能归，仍居应城。戊子卒（《家乘》卷二，页九十二，《冯孟亭奉砚图记》）。先生自述云：“先君子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帙。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抄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喜习书，缮“五经”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诗》、《小戴记》，凡写数本，手不知疲。尝恨为此二事所牵，不得专意札录所未见书。每还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盖好且勤也如是”。（《瀹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又《两浙辅轩录》卷二十二章镳诗注载先生所作《行述》云：“……先人读书，不为名声。为古文辞，镵刻峭削。病唐、宋野史、小说、传记足辅正史而文多芜漫，因以意节之，钞《江表志》、《五国故事》、《南唐马书》、《北梦琐言》，凡十数种。诗则唐体多于古风，遗命勿轻示人。……”

在先生生前三四十年，骧衢先生迁居绍兴府城（即会稽县城）南门内善发弄。（《家谱》及《神堂神主议》、《仲贤公三世像记》）（按《三世像记》云：“先世自道墟迁居府城，盖百年矣。”当是算至作文这年，这年先生已五十八岁了。）

母史氏，赠朝议大夫颍州府知府史义遵之第九女，会稽人。

(《史府君铭》、《家谱》。参考《朱集·祭史孺人文》) 适按，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年谱》云："母史氏，会稽人，耐思之第九女。"此因误读朱筠《祭史孺人》文中"姊迂其言，父曰耐思"二句而误。耐思非人名也。

先生无伯叔，有一姑，适杜鉴湄。(《丁太孺人家庆图题词》)

先生无兄弟，有一姊，适山阴夏同，后来同侨湖北；(《杜燮均家传》) 妹妹很多，难详。

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先生生。(《任幼植别传》)

前一年，丁巳，先生之父骧衢先生会试下第，寓从子垣业(允功) 家。(《从嫂荀孺人行实》) 大约旋即回绍兴。

是年，先生之友人任大椿 (幼植) 生于兴化。(《任别传》) 是年先生之师朱筠 (竹君，笥河) 已十岁。同时名人，袁枚 (子才) 已二十三岁，钱大昕 (晓徵、辛楣) 已十一岁，戴震 (东原) 已十六岁。浙东前辈，万经 (页一) 已八十岁，全祖望 (绍衣，谢山) 已三十四岁。

乾隆四年，己未 (一七三九) 先生二岁。

二三岁时，从叔衡一常携向邻店朱叟索酒，日以为常。(《十叔父八十序》) 故先生长而善饮。

这年七月，清廷修《明史》告成，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文艺了。(《东华录》、《叶鹤涂文集序》)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先生三岁。

这年，崔述生于大名，赵翼生于阳湖。

清廷修《大清一统志》成。（《志序》）

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先生四岁。

这年，万经卒，年八十［三］。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先生五岁。

先生之父骧衢先生（镳）成进士。（《朱笥河集·祭章母史孺人文》）

自此以后十年间，骧衢先生居乡，以教授为生。（《朱集》。原文云："壬戌罢归，十年教授"。）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先生六岁。

友人余姚邵晋涵（与桐，二云）生。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先生七岁。

朱筠《祭章学诚之母史孺人文》云："自幼诫之，自《百家姓》。

先生自言，“幼多病，一岁中……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与族孙汝楠书》）

汪中（容甫）生，姚鼐（姬传）生。明年，友人武德（虚谷）生；又明年，友人洪亮吉（稚存）生。清廷诏纂《续通考》、《皇通考》。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先生十四岁。

从同县王浩学，读书于中表杜秉和（燮均）家之凌风书屋。王先生勤学古处，迂阔不习世事。学徒七八人，王先生常挞人，杜君受挞最多，甚至伤顶门，几死；后创愈而顶肉骨隆起，不复平。其酷可想！（《杜燮均家传》、《丁太儒人家庆题辞》）

是年先生与俞夫人结婚。四子书尚未卒业。（《与族孙汝楠书》、《章氏家谱》）

是年骧衢先生谒选，得官应城知县。（《李清臣哀辞》、《荀孺人行实》）先生从父至应城。（《仲贤公三世像记》）

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先生十五岁。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先生十六岁。

十五六时，在应城官舍。童心未歇。宾客皆为其父忧无后。

知识渐通，好泛览。骧衢先生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先生嗜好初入。不割置，辄彷徨者久之。

癸酉，父延江夏生员柯绍庚（公望）课先生以经义。先生不肯为应举文，好诗赋而不得其似。心无张主，却不甘与俗学伍。质虽骙滞，而识趣则不离纸笔，性情已近史学。尝取《左传》删节事实，其父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先生始力究纪传之史。又因官舍无他书得见，乃密从其妻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钞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凡百余卷，名曰《东周书》。经营凡三年，卒未成书。后为馆师所觉，被责，遂中废。那时常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柯先生慨然诲曰："文无今古，期于通也。时文不通，诗古文辞又安能通耶?"先生仍不信其言，柯甚以为恨。

官舍多暇日，宾客过从，见先生所为，渐多违心称誉者，先生心益乐之。春秋佳日，联骑出游，归必有记，同人相与贸贸叹赏。其事多绝可笑者。然先生嗜好初未入俗也。

当时学风仍尚时文，先生犹得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为杂学，诗古文辞为杂作。士不通四书文，不得为通人。

（以上综合《柯先生传》、《家书》三、《家书》六、《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跋甲乙剩稿》、《叶鹤涂文集序》、《又答沈枫墀论学书》）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先生十七岁。

秋冬之间，购得朱崇沐校刊《韩文考异》。塾师于举业外，禁不得阅他书；先生得此集，匿藏箧笥，灯窗辄窃观之。尚不尽解，但爱好不忍释手。（《朱崇沐刊〈韩文考异〉书后》）

是年戴震始入北京。(《戴年谱》)

明年，全祖望卒，年五十一。(《鲒埼亭集·年谱》)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一七五六)先生十九岁。

骧衢先生罢官。朱筠《祭史孺人文》云：

> 辛未夫仕，湖北应城，不枉民狱，不撼警兵。夫人坐梱，咨诹则中。……撙节日食，室缄一椟，余金投隙，曰吾养福。丙子夫罢，代者苛责；发千金偿，识远巾帼！曰“妾知君，无我负人。……君一毡来，以一毡去；赋归去来，藏此有故。”罢仍居县，不殊官时；昔不知粝，今精不知。
>
> ——《笥河集》十六

这一节可考见先生的父母在应城时情状。《李清臣哀辞》云：“丙子，先子罢县，贫不能归，侨家故治，又十许年。”又《行述》云：“先人……以疑狱失轻免官，窭甚，久不能归，士民亲附如家人。身后徙家京师，旧治士商至京师者，必访奠故令君旅殡，执土物通问，再世不绝”。(《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二引)

又《家书三》云：“祖父尝辨《史记·索隐》谓‘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吾时年未弱冠，即觉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一七五七）先生二十岁。

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家书三》）

先生自言，“二十岁以前，性绝骙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家书》六）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先生二十一岁。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先生二十二岁。

此两年骧衢先生主讲天门。（《元则公、又昌公二代合传》）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先生二十三岁。

始出游，道访陈执无于汜水县署，款留旬日。至北京，应

顺天乡试，主从兄垣业（允功）南城之寓。是时道墟章氏居京师者不下百家，独族孙文钦、守一，及文钦族侄汝楠颇好学，可与论文，欢然若兄弟。其后剧谈养气炼识之旨，有“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从嫂荀孺人行实》、《跋陈西峰〈韭菘吟〉》、《章氏二女小传》、《滕县典史任君家传》、《童孺人家传》、《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但《童孺人家传》云：“乾隆二十五年壬午，”壬午误。）

自庚辰至辛巳，骧衢先生主讲应城讲席。（《李清臣哀辞》）（《家谱》亦云：“去任后，邑人聘留主讲书院。”）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先生二十四岁。

先生自言：“廿三四时所笔记者，今虽亡矣，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家书》六）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先生二十五岁。

是年还会稽（《杜燮均家传》、《丁太孺人家庆题辞》）。不久，又北上应顺天乡试。道出山东，访族婿任肇元于滕县。（《任君家传》）

冬，始肄业于国子监内舍。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艰。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仅五、七而先生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齿，同舍诸生视先生若无物，每课榜出，先生往觇甲乙，皂

隶必旁睨笑曰："是公亦来问甲乙邪!"而以先生意视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为何许人也。(《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青圃六十序》)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先生二十六岁。

肄业国子监。(《甄鸿斋家传》) 二月，始识曾慎（麓亭），并因以识甄松年（青圃），皆相知契。是时学力未充，所言大抵鲜所征引。本其意识所达，则亦与后有不甚远者。慎辄为之首肯，且箴以稍洽于时。(《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鸿斋家传》)

夏，给假出都，省亲湖北，索处蒲骚侨寓。(《题壬癸尺牍》、《庚辛之间亡友传》)

壬午癸未两年中，先生与同志往反论文，函稿"烂然盈篋笥"，九月朔，辑为一卷，曰《壬癸尺牍》。(题《壬癸尺牍》。此书不存。《与甄秀才论修志》二书，《论文选》二书，当是这里面的残存者。)

九月，游陕西。(同上)《遗书》卷十九有《碑洞》《杨太尉墓》、《望西岳》等诗，当是此行所作。《祭汉太尉杨伯起先生文》则自题癸未九月。此行目的不详，似旋即返湖北。

是年，戴震作《原善》成。(《戴年谱》)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先生二十七岁。

骧衢先生主湖北天门县讲席。(《李清臣哀辞》)

是年冬杪，天门知县胡君议修县志，先生为作《修志十议》。十议者：一议职掌；二议考证；三议征信；四议征文；五

议传例；六议书法；七议援引；八议裁制；九议标题；十议外编。（《通义》外篇三）十议之中，征信一条注重核实，征文一条主张“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皆可见先生此时对于修志一事的主张已开后来的先路。

十议后有跋云，此篇“大意与旧答甄秀才前后两书相出入”。此可见《答甄秀才论修志》二书之作在此议之前。（按《甄鸿斋家传》云：“癸未，学诚肄业国子监，新宁甄松年亦在监中，与学诚志义相得，已而奔走四方。”又云：“乾隆乙酉，……松年遂膺乡荐。”据此，甄秀才即甄松年。）论修志二书当作于癸未、甲申之间。今撷其大要，附于此年。第一书论六事：

(1) 论义例：“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官，则为传以列之。”

(2) 论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撰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

(3) 论前志：“修志者，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

(4) 论“志之为体当详于史。……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椽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间史胥之遗意”。

（5）论“志乃史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

（6）论史志宜注重有裨风教之记载。

此六条之中，“前志”一条，后来先生修志时列为专目；“立志科”一条，即先生后来“州县请立志科议”之底子。

第二书论八事，第七事主张另立“文选”一类，与志乘相辅佐。此即先生后来立“文徵”一例之底子。篇末自言其志云：“丈夫不为史官，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按《文史通义》外篇三尚有《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天门县志·学校考序》三篇。《天门志》乃先生之父所修（此据孙德谦君《与孙毓修书》中语），诸序当是代笔，大概作于甲申与戊子之间。又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云：“《天门志》呈览。中为俗人所改，所存才十之六七。著作之事，必自己出，即此亦见一端。”则先生所代作，当不止三序而已。此书今尚存。

清廷重修《一统志》。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先生二十八岁。

先生三至京师，（《任君家传》）仍居国子监中，伥伥无侣。（《庚辛亡友传》）应顺天乡试，沈业富（既堂）与分校，荐先生之文于主司，不录。沈大惋惜，馆先生于其家，俾从事铅椠，益力于学。（《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冯君家传》）

是年十月，骧衢先生作《熊徵君墓志铭》（此篇今附见浙本《遗书》七，但刘本注云：代家大人作）。

是年先生始见刘知几《史通》(《家书》六)。先生自云:“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书》二)

始学文章于朱筠(似由沈业富介绍。因沈、朱最相契,与翁方纲、张曾敞并号四金刚)。朱先生一见许以千古。然语及时文,则云“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先生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朱先生曰:“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说。(《与汪龙庄简》、《湖北按察使冯君家传》)《跋甲乙剩稿》自评云:“甲申、乙酉,……沈先生始荐其文,而朱先生始言于众,京师渐有知名者。彼时立志甚奇,而学识未充,文笔未能如意之所向。”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先生二十九岁。

仍在国子监。仍学语文章于朱筠。(《通说》,又《朱笥河集·椒河吟舫小集序》)同学可考论者,邱向阁、吴兰庭(胥石)、任大椿(幼植)、冯廷正(仲囫)(《吴府君墓碑》、《冯瑶罂别传》、《通说》)。

是年,先生已寄居朱筠家,在日南坊李铁拐斜街之南。先生自述云:“是时朱先生未除丧,屏绝人事。学诚下榻先生邸舍,时时相过,若程舍人晋芳,吴舍人烺,冯大理廷丞,及君(蒋秦树,雍植)为燕谈之会。晏岁风雪中,高斋欢聚,脱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蒋君墓志铭书后》、《笥河文集》有《椒河吟舫小集序》)

从兄垣业方辑其支谱,商榷体例于先生。(见下书)

这年先生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题下自注“丙戌”)是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最可注意。其略曰：

>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惘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震)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此可见先生受戴震的影响甚大。又云：

> 近从朱先生(筠)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仆则以为学者祈响，实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然分界。及乎泛滥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古人复起，未知以斯语为何如也。要之，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不羡轻隽之浮名，

不揣世俗之毁舆，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

先生学问之所以有成功，实由此时立志不错。又云：

仆……家贫亲老，勉为浮薄时文，妄想干禄，所谓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顾又无从挟赀走江湖，籴贩逐什一；而加之言讷词钝，复不能书刺干谒：坐此日守呫哔，余力所及，不得希古人之一二。间思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近复时作时辍。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典衣质被，才购班、马而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约四五通，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悉其名数。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寡寡，邈然无成书之期。况又牵以时文，迫以生徒课业，未识竟得偿志否也。他所撰著，归正朱先生外，朋辈徵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

著书之志始此。又云："四月间，得楚中书，……细君去秋又举一子。……"此可知这年先生已有二子了。(即贻选、华绂)

此书末又议家谱义例，已引邵念鲁(廷采说)。

是年，戴震写定《绪言》三卷(《年谱》)。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先生三十岁。

先生自言，“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侘傺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任幼植别传》）

久居国子监，贫不知名。去年，欧阳瑾摄祭酒，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馆之士，至相诧而嘻！欧阳先生独谓“是子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秋，国子监修志，遂令专司笔削。（《欧阳先生奉使告祭碑后叙》、《与家守一书》）（但《后叙》谓瑾丙申摄祭酒，申字系戌字之误。下文叙瑾做官，曰累迁，曰进擢，曰官于庚寅冬，曰悠游六七年，而作文之年又是戊戌，丙申、戊戌仅隔二年，不合，必有误。且瑾令修志，而志修于是年。）

朱先生被诏撰《顺天府志》，亦属先生辈经纪其事，先生深以得行其旧所讨论之主张为喜（《与家守一书》）。但其书似未成。

清廷诏修《续通志》、《续通典》、《清通典》。钱大昕始撰《廿一史考异》。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先生三十一岁。

二月，自朱先生家徙寓族兄垣业儆斋，初七日有《与家守一书》。（题下自注“戊子”）

四月后，暂卸各书工程，读书以待秋闱。（《与家守一书》）

朱筠、朱棻元（春浦）皆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先生应试，仅中副榜。朱棻元于邻座见先生对策言《国子监志》得失，惊叹

不已，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先生名稍稍闻。(《朱府君墓碑》、《通说》、《笥河墓志铭》)。

是年冬，父骧衢先生卒于应城。(《朱集·祭史孺人文》)先生闻讣，犹暂寄从兄允功家，贫不能奔丧。(《章氏二女小传》)作允功妻《荀孺人行实》(甚详，为传记中佳品)。以第三子华绶为允功后。(《行实》、《家谱》)华绶字绪迁，号芝阡，系先生之妾蔡氏所生。(《家谱》)

这年以前，未有家累。馆谷所入，自人事所需而外，铢积黍累，悉以购书。(《澹云山房藏书目记》)

是年，朱棻元擢国子监司业。(《朱府君墓碑》)

是年，王引之生。

清廷纂《通鉴辑览》成。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先生三十二岁。

为座师秦芝轩校编《续通典》之《乐典》。(《上朱先生书》)

先生居父丧。举家扶柩附湖北粮艘北上。书箱为漏水所浸，骧衢先生随身的三数千卷书，损失三分之一。(《澹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夏六月，家口十七八人到北京。先生于三四月已赁居柳树井，冯君弼(廷丞)居宅，遂以安顿家眷。(《冯室周淑人家传》、《上朱先生书》)

是年，任大椿登第，先生始见之。(《任幼植别传》)

是年萧山汪辉祖赴京会试，始交先生。(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上，页三十二)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梦痕余录》，页五十七)

是年陈本忠(伯思)成进士，与先生朝夕论学。(《陈别传》)

任朝(鹭传)除国子监丞。先生方以国子生与修《监志》，

多与诸学官牴牾。独司业朱棻元主持其说，而任朝与之言，尤有深契。（《庚辛之间亡友传》、《朱府君墓碑》、《候朱春浦先生书》）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先生三十三岁。

仍居北京柳树井南冯宅。（《赠乐槐亭叙》）

二月，友人蒋雍植卒于北京。秋，朱筠为作墓志铭，值将主考福建乡试，属先生与钱大昕参定之。先生如命以诣钱先生；钱略商数语，不肯涉笔。先生乃仿佛朱先生之意而改定之。并作《书后》。（《与朱少白书》、《蒋渔邨墓志铭书后》）

朱先生自福建贻诗，问有意名山著作否。（《朱笥河诗钞》）

从兄垣业辑宗谱尚未成，属先生采遗文，因录《武强德政序》、《何垣序》以进；八月，并为《德政序》作《书后》。（《书后》）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先生三十四岁。

朱筠充会试同考官，邵晋涵（二云、与桐）、周永年（书昌）皆成进士。先生始识二云，欲因以访书昌，不果。（《周书昌别传》、《朱先生墓志铭》）

年来仍从事《国子监志》之编摩，殊不得意。朱棻元欲使做成《则例》一书，先生卒谢去。（《候朱春浦先生书》）

秋，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十月十八日，与先生及邵晋涵、张凤翔、徐瀚、莫与俦等，联车十二乘，离京。先生道吊从女适任肇元者于山东滕县。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到太平使院。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游采石矶，朱筠有记。(《笥河文集》、《章氏遗书》、《任君家传》、《陈伯思别传》)

先生方学文章于朱先生，苦无藉手。邵晋涵辄举前朝遗事，俾先生与朱先生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复检皆无爽失。自是晋涵与先生论史，契合隐微。(《邵与桐别传》、《丙辰札记》刘刻本外三页五十八)

其文尚有存者，如《景烈妇传》、《笥河文集》亦有，题曰《书烈妇景事》。

先生盛推邵二云从祖廷采(念鲁)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五百年来罕见"。二云甚谦挹，先生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辨此？"二云敬诺，乃为念鲁作《行状》，请朱先生表其墓。(《邵与桐别传》贻选跋，《笥河文集·邵念鲁墓表》。《南江文钞·念鲁行状》。念鲁事迹，详见姚名达所作《年谱》)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先生三十五岁。

三月五日，朱筠与先生等游青山，有游记。(《笥河文集》卷七)

夏，先生访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于宁波道署。过会稽。

秋，又在太平。(《冯君家传》、《冯瑶罂别传》、《杜燮均家传》、《与严冬友侍读书》、《童孺人家传》)

秋冬间，有《候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书》，申述所以脱离监志局之故，又云：

> 夫人之相知，得心为上。学诚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资不能自给。十口浮寓，无所栖泊。贬抑文字，稍从时尚，则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于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夫岂纷纷者所得损益？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

由此可知先生作《文史通义》实始于是年。（《南江文钞·与章实斋书》亦可作证）而所谓辛楣先生候牍，即《上辛楣宫詹书》，辛楣即钱大昕。

《上辛楣宫詹书》云：

>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较唐时为尤难矣。惟……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以表襮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

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此书可见先生当日之不合时宜。先生对于钱大昕，始终无有贬辞；对于王念孙，也无贬辞。但钱大昕似未能赏识先生之史学见解。（又按此书在浙本题注为《戊午钞存》之一，故本年谱初版列在戊午年下。今据《候朱春浦书》，知是此年之作。）

是冬，朱筠试士徽州（《笥河文集》），黄景仁、邵晋涵与先生皆相从校文。（《南江文钞·与章实斋书》）时徽州知府为郑虎文。（《黄景仁年谱》）

岁杪，先生又返会稽，主道墟族兄孟育家。（《元则公、又昌公合传》、《童孺人家传》）

是年，幼子生于北京。（《与周筤谷论课蒙书》）

辛卯、壬辰之间，都门尝再迁家，藏书颇有遗失。先人札录多袭巾箱，偷儿不知为书，负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别置一箱，得以仅存。（《滃云山房藏书目记》然其后亦未付雕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先生三十六岁。

正月初旬，访邵晋涵于余姚，留数日。晋涵始信先生推尊念鲁《思复堂文集》之言，属为校定，将重刻以问世。然卒不果。（《邵与桐别传跋》）（一直到光绪末年，才由蔡元培校定，徐友兰重刻，收入《绍兴先正遗书》。）

旅客宁、绍、台道署。（《书李梦登事》）

二月，由宁波过会稽太平至和州，似因朱筠之介，应知州刘长城之聘，编摩《和州志》。（《书李梦登事》、《金地山印谱序》、《笥河文集》、《安徽通志》）先作《志例》。据今日所存残本，则有

下列十一部：

(1) 皇言纪

(2) 官师表

(3) 选举表　先详制度，后列题名。

(4) 氏族表　每姓推所自出，详入籍之世代。科甲仕宦为目。无科甲仕宦，不为立表。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齐民，则及分支之人而止。虽有科甲仕宦而无谱者，阙之。

(5) 舆地图　一曰舆地，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

(6) 田赋书　具录田赋颠末，附采私门著述，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者。

(7) 艺文书　部次，条例，治其要删。

(8) 政　略　次比政事，编著功猷。凡三篇。

(9) 列　传　以正史通裁，特标列传；旁推互证，勒为专家；上裨古史遗文，下备后人采录。（并下列二列传，凡二十三篇。）

(10) 阙访列传　标名略注，事实难征，世远年湮，不可寻访者归之。

(11) 前志列传　历叙前志，存其规模。

但据刘刻本《和州志》考察，则决不仅十一部。如《田赋书》称书第一，《艺文书》称书第六，则其间尚有四书，而书之总数最少亦有六，可知也。《舆地图》称图第一，又云“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则图最少有四，可知也。故可谓为

共分十八部。

春，有《与严冬友侍读书》云：

> 皖江，足下旧游地也，风土人情，故自不恶。第武陵一穴，久为捷足争趋。邵与桐、庄似撰（炘）诸君相守终年，竟无所遇，文章憎命，良可慨也。锁院校文，生计转促。以此悒悒，思为归计。正恐归转无家，足下能为我谋一官书旧生业否？
>
> 日月倏忽，得过日多。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曾录内篇三首，似慕堂（曹学闵）光禄，乞就观之暇，更当录寄也。

是年夏，在宁波道署遇戴震（东原）。是时戴年已五十，方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先生与戴论史事，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乾隆己丑。见《戴氏年谱》），及《汾阳县志》（辛卯。亦见《年谱》），及见先生《和州志例》，谓修志但当详地理沿革，不当侈言文献。先生则谓“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又曰：“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又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外篇》三）

去年冬，清廷敕催各省访求遗书，朱筠除采奏数十种外，后又上《谨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拟出办法四条：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且饬取《永乐大典》分别写成专书；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宜开馆校书，择要进呈；四、金石、图谱在所必录。是年春，清廷议决采用前三条，命军机大臣为校书总裁，拣选翰林等官，定规酌办。将来成编时，赐名《四库全书》。旋又特征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五人入馆，赐官翰林。(《东华录》、《邵与桐别传》、《笥河文集》) 先生由宁波返和州，道过杭州，闻戴震与吴颖芳谈次痛诋郑樵《通志》。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先生因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马、班，下辨《文献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初名《〈续通志〉叙书后》，后易名《申郑篇》。(《答客问上》、《申郑》)

修《和州志》未讫，以私稿示周震荣 (篯谷) 于青阳县署。周偶失其稿，中有佳传，多不可忆。(《记鬼神二事》) (又《周篯谷五十屏风题辞》云："壬辰、癸巳之间，尝从大兴朱先生竹君较文安徽学使幕中，往来君旧治。"可知此时先生已识周氏。)

在和州时，病诸史列传人名错杂，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初欲通编全史人名，后以为功稍繁，先将列传所著人名，通编为韵，更取诸篇人名重复互见者，遍注其下，编为一卷。(《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书》)

九月，朱筠失官，左迁，在《四库全书》处行走。继其安徽学政者为秦潮。(《笥河文集》、《安徽通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先生年三十七岁。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讫，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及文辞典雅者，辑为《和州文徵》八卷，(《和州文徵·序例》)计：奏议二卷，徵述二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上其书于安徽学政秦潮。潮以州辖含山一县，志仅详州而略于县；且多意见不合：往复驳诘，志事遂中废。(《方志辨体》、《安徽通志》)乃删存为二十篇，名曰《志隅》。自序曰：

>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比也。……乾隆三十九年季春之月。(《灵鹣阁四》，一，页十七。)

季夏，代郑虎文作《沈母朱太恭人寿序》。据《文献徵存录》云，虎文称先生有良史才。

秋，与金友莲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钜浸，晓浮鹦脰湖，过嘉兴至杭州，应浙江乡试，不中。过会稽，抵宁波。(《金地山印谱序》、《杜燮均家传》、《童孺人家传》)遂在道署度冬。(《冯君家传》)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先生三十八岁。

春，冯廷丞迁台湾道，宾客云散。先生亦倦游，返会稽，初与宗人春社。(《冯定九家传》、《蒋南河家传》、《家效川八十序》)

五月，校编《章格庵遗书》，作序。又为《刘忠介公年谱》作序。秋，遂还北京。家益贫，而交游益广，因迁居金鱼池陋

巷。(《庚辛亡友传》、《朱司业碑》、《周书昌别传》、《任幼植别传》、《章氏二女小传》) 是时，四库馆已开，人才多集于北京。先生与邵晋涵、任大椿、任朝、胡士震、沈棠臣、裴振诸人时相往还。(《任幼植别传》、《庚辛之间亡友传》)

《邵与桐别传》云：

> 自四库征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積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王之志焉者，则河汉矣。
>
> 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君抚膺叹绝，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

即此时之事。

《周书昌别传》云：

> 余……乙未入都，……(书昌、与桐) 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余因与桐往见书

昌于藉书之园。

周永年以藉书名园，藏书近十万卷，中多精本。藉者，借也。周意在流通，颇似今之图书馆。先生为作《藉书园书目叙》，言周君“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故弃产营书，久而始萃。”末云：“群书既萃，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斯则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者也。”观此文，可知先生此时心思所注。

冬初，趋省从女于涿州，仲冬再往，则女已死。(《章氏二女小传》)

《跋甲乙剩稿》自评云：“甲午、乙未，江南修志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不免有意矜张也。”

乙未、丙申之间，蹙蹙无所就，侍朝为之筹画甚至。(《庚辛亡友传》)

朱筠弟子李威去年始自福建入京，今年始见先生。后作《从游记》，有云：“及门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指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笥河文集》首)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先生三十九岁。

困居北京，援例授国子监典籍。(《庚辛亡友传》)

秋，因朱筠、朱棻元、张方理之介绍，访梁梦善于蠡县，周震荣于曲阳。时震荣以清苑县丞，署曲阳县事，始与先生结深交。(《庚辛亡友传》、《朱府君墓碑》、《周筤谷别传》。内藤谱，曲阳

作永清，误。可参看卷七，《周府君墓志铭》。）其后先生屡馆畿辅，至于携家自随，中历悲欢离合，且有死丧疾厄患难之遭，震荣与休戚周旋于其间者，一十二年。（《周别传》）

震荣是年即调永清知县。（《周筤谷五十屏风题辞》）

清帝命史馆立《贰臣传》。（《东华录》）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先生四十岁。

春，因周震荣之介，主讲定州之定武书院。既萃诸生而课以文，复授州之秀童 以小学而榷其塾师之日课。诸童颇用斐然。（《书孙氏母子贞孝》、《庚辛亡友传》、《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

周震荣延先生主修《永清县志》。（《周筤谷别传》、《周府君墓志铭》）先生以五月去定州，至永清。（《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庚辛亡友传》、《周府君墓志铭》、《周筤谷题辞》）

秋初入京应顺天乡试。主考官山阴梁国治（瑶峰）恶经生墨守经义，束书不观，乃发策博问条贯，杂以史事，以觇宿抱。榜发，先生中式，谒梁。梁曰："余闱中得子文，深契于心。启弥封，知出吾乡，讶素不知子名。询乡官同考者，皆云不知。闻子久客京师，乃能韬晦如是！"（《庚辛亡友传》、《〈梁文定公年谱〉书后》、《张公墓志铭》、《周府君墓志铭》、《国朝耆献类徵·梁国治传》）

先生前此尝七应乡试，凡三中（兼副榜）一荐，一备，二落。（《与汪龙庄简》）

洪亮吉《北江诗集》有赠先生诗，当是此年所作。

自君居京华，令我懒作文。

我前喜放笔，大致固不淳。
君时陈六艺，为我斧与斤。
不善辄削除，善者为我存。
仪真有汪中，此事立绝伦。
藐视六合间，高论无一人。
前者数百言，并致洪与孙。
勗其肆才力，无徒嗜粱陈。
我时感生言，一一以质君。
君托左耳聋，高语亦不闻。(原注：君与汪论最不合。)
君于文体严，汪于文体真。
笔力或不如，识趣固各臻。
别君居三年，作文无百幅。
以此厚怨君，君闻当瞪目。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于北京，年五十五岁。戴震为当日朴学第一大师；清代朴学至戴氏而始大成；至戴氏诸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而始光大。先生对于戴氏，虽时有贬辞，但他确能赏识戴学的好处，先生作《朱陆篇》，即为戴氏而作的。《朱陆篇》云：

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为朱氏之

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于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后学之哓哓乎？但门户既分，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者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

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伪陆、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朱学之忧也。盖性命事功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诸经解义不能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何伤于大体哉？……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别，以为优于陆、王矣。然则承朱氏之俎豆，必无失者乎？曰，奚为而无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

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黄干、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著于竹帛，皆其宜于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有可以知而不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与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识以

> 示之，于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为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于朱也，惧其不类于是人，即不得为通人也。
> ……

先生晚年复作《书〈朱陆篇〉后》，明言此篇为戴氏而作。此篇前半论戴学为朱学的正传，真是特识，非研究学术渊源有所得者，不能为此言。先生不满意于戴氏，凡有数端。第一，戴氏论修志，与先生不合。先生述戴氏语，有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此言若确，戴氏真该骂了。第二，先生述戴氏论古文，谓“古文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为古文词，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复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为文者（适按：“者”字当删，）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远出左、国、史、汉之上。”此言若确，当是戴氏天才本高，自述其经验如此。（今观段玉裁所作《戴氏年谱》，似戴氏实曾用过古文的功。先生所引，或有不实。）但先生是用过苦功学古文的，故疑戴氏自欺欺人。第三，最重要的是戴氏攻击朱子，先生述其口谈有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先生是维持“宋学”的人，故对于此事最不满意。先生说：“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

诽圣谤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先生于此等处仍有“卫道”的成见，或尚含有好胜忌名的态度。

但先生对于戴震的学问，确有卓绝的了解。如《书后》云：

>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此与先生平日论学宗旨一致。先生平日深恨当时学者误把“功力”看作“学问”，见了“学问”反不认识，反以为不如“功力”，故他能为戴氏抱不平。

是年先生有《与李讷斋太守论碑刻书》、《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

是年先生不时回京。冬，始识罗有高（台山）（《庚辛亡友传》）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先生四十一岁。

春初，冯廷丞以失察江西文字狱得罪，逮刑部，旋被赦出。先生自永清入京，时往看他。罗有高亦时过冯君。是时京师讲梵学者，周永年最为渊奥而独深契有高。有高貌清癯，又持长斋不肉食。先生因诘有高：“佛氏言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信乎君所食者，来生则反报乎？”曰：“然。”先生曰：“然则贫欲求富，但当杀掠豪贾；贱欲求贵，但须劫刺尊官：来生反

报，必得富贵身矣。”有高不能难，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冯氏诸友与有高言议往往甚洽，先生每杂以谐戏，则哄笑而罢。（《庚辛亡友传》、《冯瑶罂别传》、《东华录》）

先生旋成进士。归部待铨。（《庚辛亡友传》）自以迂疏，不敢入仕。（《冯瑶罂别传》、《柯先生传》）（题名碑于先生名下注：“浙江会稽县人，”而先生之父镳下注：“顺天大兴县人。”盖先生以国子监生资格应北闱，故籍贯不改。）

先生挚友之同年者，周榮（晴坡）、张维祺（吉甫）、凌世御（书巢）。（《庚辛亡友传·周跋》、《凌书巢哀辞》）

六月，朱筠五十岁生日，先生有《屏风题辞》，述朱氏论文之旨，谓“有意于文，未有能至焉者；不为难易而惟其是，庶几古人辞达之义矣。……而其要乃在于闻道。不于道而于文，将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

五月，返永清，续修《永清志》。周震荣待先生甚优，先生自述修志时事云：“丁酉、戊戌之间，君馆余修《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绅采访，非略则扰，因具车从，橐笔载酒，请余周历县境侵游，以尽委备。……得唐、宋、辽、金刻画十余通，咸著于录。又以妇人无阃外事，而贞节孝烈录于方志，文多雷同，观者无所兴感，则访其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更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周筤谷别传》、《庚辛亡友传》）

是年，先生之母史孺人卒。（《朱笥河集·祭史孺人文》、《冯瑶罂别传》、《庚辛亡友传》）

父母遗柩，后皆归葬会稽之栖凫。（《丁巳岁暮书怀》、《章氏

家谱》)

是年正月，作《章氏二女小传》，二女皆从兄允功之女，次女所嫁非人，抑郁而死。先生作传，深致不平，对于择婿问题颇致感慨。

周震荣次其先世谱牒，尝商榷体例于先生。(《周松岩先生家传》)

馆永清时，间从周震荣入都。震荣置酒行馆，招致一时同人若王念孙、邵晋涵、任大椿、周永年、顾九苞、吴兰庭、刘台拱(端临)、史致光(余邨)、章廷枫(晓河)与先生等，宴会极欢。(《庚辛亡友传》)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先生四十二岁。

遇危疾。(《周筤谷别传》)

是年七月，《永清志》成。(《与李讷斋太守书》、《庚辛亡友传》及其周震荣跋)(先生有《又与周永清论文》书，中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据此，知《永清志》大概成于《和州志》六年之后。)

是年著有《校雠通义》四卷。(《跋酉冬戌春志余草》)此书原稿，后两年游古大梁时遇盗失去，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本，其第四卷竟不可复得。(同上)

《永清志·序例》十五篇，今载《文史通义》外篇二。《永清志》较《和州志》颇不同，今列表如下：

《和州志》	《永清志》
皇言纪	皇言纪

□	恩泽纪
官师表	职官表
选举表	选举表
氏族表	士族表
舆地图	舆地图
建置图	建置图
营汛图	□
水利图	水道图
田赋书 (中间尚有四书,名佚) 艺文书	六书(礼、吏、户、兵、工、刑)
政略	政略
列传	列传
阙访	阙访
前志	前志
文徵	文徵

《永清志》凡六体，共二十五篇。《文徵》五卷，计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各一卷。（据刘刻本。通行本则无金石一卷。）

《校雠通义》今存三卷，共十八篇。中多有极重要的见解，往往与《文史通义》互相发明。例如《原道篇》说古代“官守学业皆出于一，私门无著述文字”；又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这都是《文史通义》的重要观念，但此略而彼详耳。他

极力推崇刘向、刘歆父子，故有《宗刘》之篇。他论校书之法，很多可注意的：（1）互著（重复互注）。（2）别裁（裁其篇章，别出门类，如《管子》中之《弟子职》入小学）。（3）辨嫌名（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于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于姓名之下）。（4）采辑补缀。（辑佚书）。（5）书掌于官（平日责成州县官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6）广储副本备雠正。（7）有所更定，必载原文。（8）著录残逸。（9）藏书。此外，他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意见：

>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

此即今所谓“索引”之法，后来汪辉祖的《史姓韵编》与阮元等的《经籍纂诂》，都是这一类的书。

七月，先生访周震荣于顺义役次。震荣置酒高会，出《永清志》示坐客。张维祺、周棨争聘先生修志，不得，遂各就所

治成书。(《庚辛之间亡友传》，周震荣跋。但原文“辛丑”系“己亥”之误。)

秋后，馆座师梁国治家，课其子仲将读。(《庚辛亡友传》，及周震荣跋，《上梁相公书》、《周筤谷别传》)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先生四十三岁。

仍馆梁国治家。冬，辞馆，岁事殊窘。(《庚辛亡友传》)

第三女殇。(《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先生四十四岁。

春，图事辄蹶。三月，去游河南，失礼于□海度，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著。狼狈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张维祺于直隶肥乡县衙。维祺聘主肥乡清漳书院讲席，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庚辛之间亡友传》、《栗君墓志铭》、《张介村家传》、《与邵与桐书》、《刘氏三世家传》)《上梁相公(治国)书》最悲愤，略曰：

> 学诚……妄自诩谓：稍辨黍麦，不甘自弃。又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读古人书，泾渭黑白，差觉不诬。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呼吁哀号，失其故态；则毛生颖故投囊，张仪舌犹在口，尚思用其专长，殚经究史。宽以岁月，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未

必稍无裨补。若使尘封笔砚，仆仆风霜，求一饱之无时，混四民而有愧；则不过数十寒暑，便无此身，以所得之甚难而汩没之甚易，当亦长者之所恻然悯惜者也！

这回的遇盗，凡四十四岁以前的撰著文章，荡然不存一篇。先生的不幸，以这次为最甚。后来虽从故旧家存录的别本借抄，名之曰《辛丑年钞》。然十成之中，仅得四五。《校雠通义》第四卷竟佚。故今本所存，四十四岁以前之撰著专篇极少。其幸存者多系应酬文字。惟《金君行状书后》论择辨史料之法极精，今摘录于左［下］：

　　载笔之士，蕲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从事于择与辨。而铢黍芒忽之间，不苟为炳炳烺烺，饰人耳目，盖有道矣。……夫志状之文，多为其子孙所请；其生平行实，或得之口授，或据其条疏；非若太常谥议，史官别传，确然有故事可稽，案牍可核也。采择之法，不过观行而信其言，即类以求其实，参之时代以论其世，核之风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际而察其游，审其细行而观其忽，闻见互参而穷虚实之致，瑕瑜不掩而尽扬抑之能，八术明而春秋经世之意晓然矣。生平每谓“文采未优，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词章未极，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于斯文，则范我驰驱，未尝不为是凛凛焉。

自是年以后，每有撰著，必留副草，以备遗忘。而故人爱

先生文者，亦多请抄存副墨。周震荣、史致光抄藏最多，朱锡庚稍次。(《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闰四月，访同学邱向阁于南乐县衙(大名府)。邱君因朱竹君“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之言，作“通达”二字榜于轩，先生为作《通说》，略云：“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此意为先生一生的一个根本观念。(《通说》)

冬，张维祺移官大名，先生亦去肥乡，到大名，至岁暮辞归北京。(《张介村家传》、《大名县志》代序，《栗君墓志铭》)

是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竹君)卒于北京，年五十三。(《朱先生墓志》)

先生在清漳书院，有清漳书院会课题七道，今见《遗书》卷十二，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方法。其《策问》题云：

> 问古人教敩，启发是资。请业之际，先问尔所谓达；侍坐之余，则云盍各言志。诸生亦有抑郁未伸，惮于一日之长者欤？诸生有志于学，其意甚盛。顾所谓“学”者，特举业耳。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士无恒产，举业等于治田；谁谓诸生不当治举业哉？顾仕非为贫，学亦不当专为举业。敢问诸生读书之始，亦有志所欲为？抑既习举业，因文别有窥见，遂觉所业如是，而所志固有不止于是者欤？学问大要不出经史。……诸生自反平日必有入识最先而程功较易者；经于何道最有关心？史于何事最所惬愿？高山景行，

所言正不必今日之所已能者也。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无妨预定言之，将欲为诸生商榷其善否也。即以举业而论，敢问何所讲求？何所师法？……四书文外，经诗论策亦举业之要务也。向者于何致功？平日亦有怀疑不决，欲就请质而无从者欤？院长愿悉与闻，将为诸生效他山之错焉。

其四书大义、策问六道，都是很能引起学者的怀疑态度与思考力的。如第一道云：

问《论语》记言之例：夫子所言，皆称“子曰;”其有对君之言，则称“孔子”。说者谓君臣之际，记者致其谨严：然耶？否耶？《颛臾》一篇不皆对君之言，而皆称孔子，岂有说欤？……

又如第五道云：

问孔门之教，言行相符。弟子亲承，有疑斯问。……后世往往以问答之高下，觇诸贤学业之浅深，谓言者心声：理固不外是欤？宰我短丧之说，尹氏以为下愚犹耻言之。冉求鸣鼓之攻，亦已得罪名教。二子各列四科，乃是圣门高第；而所言所行，若如讲说家之所言，则后世乡党自好之人有所不为。敢问此何修何学而犹为高第之弟子耶？子贡之特达，而议礼仅爱

一羊；子路之果敢，而论仕乃至于佞给。子张学干禄，樊迟请学圃。凡此见于纪载，皆后世稍知礼义之士所不屑为；而当日函丈陈辞，略无忌讳。今之为时文者，当奉夫子之论以折诸贤，是固然矣。而诸贤毕世懿修，乃不足当时文家之一吷：则是今之工时文者，其见地乃贤于圣门诸弟子耶？蓄疑久矣，敢请诸生解之。

此种策问既可见先生自己读书善疑，又可见先生教学者亦从思考与疑问下手。上文所引第一策问，处处在寻出学者的志愿与向来的功力。此与上文所引《通说》所谓“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之意，正相符合。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先生四十五岁。

是年季春，乾隆帝谒东陵还，过盘山。周震荣以畿县例供除道。先生方自畿南失意归，未有所遇。周君邀先生偕行，环山治道；州县，茇舍相望；时桃李方华，镇山雪初霁，四山照耀，周君大置酒，遍召同官偕饮极欢。同官又互相酬答，寻山名胜殆遍。先生亦自忘家无宿舂粮也。(《周箕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删存近作为《辛壬剥复删存》。(徐本、浙本遗书目注)

先生旋主讲永平敬胜书院，自京师移家赴之。后此偶客北京，多依甄松年为主。(《黄烈妇传》、《丙辰札记》、《甄青圃六十序》、《丁巳岁暮书怀》)

山府近边，学者鲜可与语，僻处辄不自聊。幸邻境官吏凌

世御、袁汝琈、乔钟吴、刘嵩岳、蔡薰等皆以文字结交，蔡且欲聘先生撰《滦州志》。（《凌书巢哀辞》、《书〈滦州志〉后》）

先生病诸生俭学，乃取古人撰述，于典籍有所发挥，道器有所疏证，华有其文而实不离学者，删约百篇，以劝诱蒙俗，名曰《文学》，并作叙例。此书今不传。

春三月，作《朱先生墓志铭》称他“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请于心，如不得已；懔于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为加损。余力所至，神明变化。绚春拭秋，纤缕钜拓，陶冶万象，不为一律，并能令气之至符心之初。呜呼，盖自有宋欧阳氏以来，未有如是其才者也！”

是年尝为凌世御校定《叶鹤涂文集》，作序。（《凌书巢哀辞》）

季妹死于北京。（《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澹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是年春，朱棻元卒。（《朱府君墓碑》）

是年七月，《四库全书》告成。（《全书总目》）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二）先生四十六岁。

春，先生卧病京寓，病危急，（《周筤谷别传》称“己亥癸卯，两遘危疾。”）邵晋涵载先生至其家，延医治之。病中喜与邵氏论学，每至夜分。（《邵与桐别传》论）因与邵氏论修《宋史》，谓俟君书成后，余当更以意为之，不过五十万言。并问邵立言宗旨，邵以维持“宋学”为志。先生勉以“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同上。又《家书》五）

病愈后，回永平主讲敬胜书院。《与乔迁安（名钟英）论初学课业》三简似在此年。

有《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二篇，一在夏间，一在秋间。第一次书有“此间生徒难与深言”之语，可见先生在永平不很得意。秋间生徒多赴试散去，“荒斋阒然，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第二书）自七月初三日至九月初二日，共得《通义》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总得书十篇，计字二万有余。用五色笔逐篇自为义例，加之圈点。其更改多者，则用粉黄涂灭旧迹，改书其上。逐日结草，一章甫毕，即记早晚时节及风雨阴晴气候。（《癸卯〈通义〉草书后》）此十篇之中，惟《言公》《诗教》五篇可考，余篇之目不可考矣。

《癸卯〈通义〉草》以外，又录存数年以来古文辞为《癸卯录存》。（浙本、徐本遗书目注）

朱沧湄省其父映榆于永平府署，数过先生请教。先生颇属望之，有《论学书》，谓：

> 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欤，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欤，虽

> 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悬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人之性情才质，必有所近。童子塾时，知识初启，盖往往以无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后读书作文，与夫游思旷览，亦时时若有会焉，又习而不察也。此即道之见端，而充之可以无弗达者。未有人焉从而明示之。盖至终身汩没而不自知为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于此，亦将有所省乎？如有所省，则毋论治经业史，皆可求所得矣。……

又有题《朱沧湄诗册》文云："……必求诗之质，而后文以生焉。读书蓄德，名理日富，愤乐循环，若有不得已焉而后出之，此不求工诗而诗乃天至，以操之有其质也。强笑不欢强哭不悲。哀乐自来而哭笑不自知其已甚。学之于文，岂有异于是乎?"

九月犹在永平讲舍；九日与友人登高，游阳山九莲寺，有记。

十月，乾隆帝归自盛京，周震荣除道京东。招先生"临榆茇次，观乡田秋获则羡归耕；览山海关，相与慷慨怀古；其夕宿海边寺，闻海潮如殷雷，势挟风雨，震撼庭户，凄清不复成寐；夜半登高，见海日出，意惝恍思神仙。"先生谓"数日之间，随所见闻，心境屡化，人世何者可常恃耶?"周君因与先生论文，将托著述以期不朽，自谓十年博千古云。(《周篔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周震荣驳先生《诗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

论，先生不答。(《与周永清论文》)

《言公》三篇为先生得意之作。上篇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此是三篇大旨。中篇论“世教之衰，道不足而争于文，实不充而争于名”，尤痛切。下篇为赋体，泛论各种文体之公。

《诗教》上篇论“战国之文，奇衺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此语含有一种文学史的见解，但章氏说的不明白。下篇说“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此言较明白。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去，《三百篇》自是一切文学之纪元，一切集部之祖(子部即是集部，不当别立子部。)章氏此论，确有一部分真理。上篇又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著述至战国而始焉”，更有见地。但他假定一个理想的“同文”之治，作为上古无著述的解释，那可错了。

冬，先生去永平。(《题沧湄诗册》)

友人曾慎卒。(《庚辛亡友传》)

十二月清廷修《续通典》成。先生尝代拟《礼典序》，今本尚有原稿痕迹。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先生四十七岁。

癸卯、甲辰之间，永定河道陈琮招先生撰《河志》。(《曾麓亭传书后》)是年，先生就保定莲池书院之聘。(《王府君墓志铭》、

《周府君墓志铭》、《郎公家传》）家口自永平携赴保定，以后渐增至二十人。（《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是年有《甲辰存录》。

十一月八日，冯廷丞卒。（《冯君家传》）

是年，族侄廷枫成进士。（《海门厅志》、《名宦传》）

清廷修《续通考》成。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先生四十八岁。

仍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诸生多授徒为业，先生为他们作《论课蒙学文法》二十六通。此文大旨演癸卯《与周筤谷书》的意思，但更切实。大旨反对世俗课童子用时文入手之法，而主张用古文入手，先读《左传》，次及《史记》；作文则先论事，次论人，次数典，最后叙事。

正月，一至北京。（《张介村赐鸠杖记》）

八月，刻《太上感应篇》，二日作《书后》。

是年冬，先生暂至京师，馆同年生潘庭筠家，在兴化寺街，与任大椿寓相近，常互为主客谈宴。先生留旬月出都。（《任幼植别传》）

是年正月，张维祺《大名县志》成，悉用先生之法。（志序）并曾以其稿与先生商榷。（《记〈大名县志〉轶事》）二月，毕沅为河南巡抚。

是年十月，清廷修《一统志》、《续通志》成。

先生后自评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观，而未通变也。"（《跋甲乙剩稿》）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先生四十九岁。

仍在莲池书院，十二月十日（内藤谱作二十日）有《月夜游莲池记》。

是年六月，毕沅升任湖广总督，以伊阳拒捕案被议，仍留河南巡抚任。(《东华录》)

十二月十三日，梁国治卒。(《耆献类征》本传)

这年，章宗源（逢之）中举人。(《孙星衍文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先生五十岁。

是年春，先生最得意的门人史致光（余邨）进士及第，授修撰。(《耆献类征》本传)

是年先生因失梁国治之奥援，不得不辞莲池书院讲席。侨寓保定，寄居旅店，长孙女及第五子殇。是时“当道交疏，至典史背议为写白字!”(《丁巳岁暮书怀诗》及注)

春，先生闻戊戌进士开选；因往北京吏部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计索然。转食友家者几一年。五十生朝，主甄松年家，松年为置酒尽欢。(《甄青圃六十序》、《蔡滦州哀辞》) 冬间已垂得知县矣，忽决计舍去。十月遂回保定。（《丁巳岁暮书怀诗注》、《庚辛亡友传》、《存我楼记》)

十月，周震荣自永清至保定。一日，与先生论课蒙法。先生极言《东莱博议》及唐、宋人论人论事之文不可资以入门，揠苗助长，槁可立待。盖针指震荣旧作《养蒙术》中语而言也。震荣持其说甚坚。先生攘袂徵色，且丑语相诋。适周棨、

张维祺自外至，先生亦不及揖迎。维祺右震荣说，先生言益峻。桀曰："纷争至此，案何由定。"是时僮仆离立户外，皆诮曰："此省垣地，不走谒热官，乃聚讼此无益言语！"因各举其囊橐相示，曰："是宜吾侪之不得饱也。"先生闻之失笑，索酒斗饮，大醉别去。(《庚辛之间亡友传》，周震荣跋)

仲冬，因周震荣之介绍与启发，至河南见毕沅。欲藉其力编《史籍考》。(《上毕制府书》)(《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有《上毕抚台书》。(此书浙本《遗书》误刻两见，一题下有"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字，误也。)(刘本亦误)略云："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纵；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缺陷奚如！"书附旧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先生后十年追述此行云：

镇洋太保人伦望，寒士闻名气先壮。
戟门长揖不知惭；奋书自荐无谦让。
公方养疴典谒辞，延见卧榻犹嫌迟。
解推遽释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逶迤。
宋州主讲缘疑夙，文正祠堂权庙祝。
潭潭深院花木饶，侨家忽享名山福。
——《丁巳岁暮书怀诗》

据此诗，毕沅待先生颇厚，明年先生即主讲归德府之文正书院。

离保定时，周震荣置酒送别，半酣，曰："君昔矢愿作《亡友传》，墓草且宿矣，若死者何！"先生曰："是行也，宜偿之。"周曰："君敏于行文，怠于举笔。死者无穷期，生者百年

易逝！他日我作《亡友传》，将列君于篇末，以志此憾也！”先生默然。（《庚辛亡友传》周跋）

先生在保定之某年，尝为梁肯堂校定其业师仁和叶某遗文，这年在北京又尝附商《梁文定公（国治）年谱》。（《年谱书后》）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先生五十一岁。

正月，有《徐尚之古文跋》。

《论修史籍考要略》，当系去冬今春间在开封所作。经毕沅同意后，遂开局编《史籍考》，由先生主持其事。

二月，先生至归德，主讲文正书院。（《崔母屏风题辞》）三月一日有《与洪稚存书》，写途中及书院风景甚详。书末有云：“官场报访及宴会徵逐，稍已即闲。三月朔日为始，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虚谷、仲子诸人相与纵横其议论也。……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时检阅何书？《史部提要》已抄毕否？《四库集部目录》，便中检出，俟此间子部阅毕送上，即可随手取集部发交来力也。四库之外，《玉海》最为紧要。除艺文史部无庸选择外，其余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各门皆有应采辑处，不特艺文一门已也。此二项讫工，廿三史亦且渐有条理，都门必当有所钞寄。彼时保定将家迁来，可以稍作部署。端午节后，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别，竖起大间架也。”此书可见先生见毕沅后，即任编辑《史考》事；又可见《史考》编纂之情形与下手方法。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当日皆分任此事。

春夏屡致书邵晋涵、孙星衍（渊如）诸友。五月二十三日《报渊如书》有云：“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

二月《与孙渊如书》有云：

“鄙人不能诗，而生平有感触，一寓于文。”

《与邵二云论学书》有云：

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浅焉者也。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皆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

又书有云：

故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谓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难与庄语。吾党如余邨（史致光）、逢之（章宗源）、正甫（章某），暨朱少白（锡庚），不可不时时策之。

是年又有《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可因以见先生的人生观：

我有来往，我不长存者也。我不长存而思所以存之，以为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聪明，心识志虑，而于具我之质，赋我之理，有以稍得当焉，虽谓不负我生可也。

夫人之生也万变，所谓我者亦万变。毋论各有其生，各不相侔；即一生所历，亦自不同。……则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后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

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则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岂惟与年为异，抑亦日迁月化而不自知也。

然则欲存我者，必时时去其故我，而后所存乃真我也。

春杪，家眷始自保定旅店南迁至归德。（《丁巳岁暮书怀诗注》、《蔡滦州哀辞》）

五月，遣贻选入京应乡试，馆于永清县署凡一年。（《报孙渊如书》、《周筤谷别传》）

在归德时，校正《校雠通义》，以意为更定，与诸家所存本又大异矣。（《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接到章宗源所辑《逸史》，拟附入《史籍考》。（《与邵二云书》）

是年秋，得《文史通义》十篇。目不可考。又自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诸体古文词十三篇。（《题戊申秋课》）先生自言，“作文之勤，多在秋尽冬初，灯火可亲，节序又易生感也。平日所负文债，亦每至秋冬一还，然终未能悉扫无余。”又云：“涉世之文与著作之文，相间为之，使其笔墨略有变

化。”（同上）

是年秋，先生又撰《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一书，除夕在亳又有《顾文子传书后》。（《任幼植别传》）

内藤及会稽徐氏藏本《章氏遗书》目有《礼教》《所见》二篇，题下皆注“戊申录稿，”疑即是年所作十篇之二。（此二篇旧刻各本及浙本《遗书》中皆无之，惟刘刻本始有。）（王宗炎《复章实斋书》，在嘉庆四年，犹问《礼教篇》成否，则有可疑。）

是秋，荆州大水，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冬，先生失归德馆，将往依沅。冬杪，游亳州。逾月，因移家至亳州署，依知州裴振。（《裴母查宜人墓志铭》、《甄鸿斋家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丁巳岁暮书怀》、《庚辛亡友传》）

岁暮，先生到武昌，投毕沅于督署。（《洪北江年谱》）

是年所作小品可考者甚多，其较要者，《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书郎通议墓志后》、《与宗族论撰忠愍公家传书》、《跋戊申秋夜课》。其草稿册名又有《戊申录稿》“戊申仲秋序记杂文”二种。（浙本目）

这年，朱锡庚（少白）中举人。（《朱先生别传》）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先生五十二岁。

辗转太平、安庆之间，阨甚。（《上毕制储书》）

三月之杪，游太平，馆于安徽学使署中。学使徐立纲方辑宗谱，请先生经纪其事。（《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安徽通志·职官表》）张小兮、左良宇皆一时名俊，比屋而处，暇则聚谈，谈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机触发，则时有感会。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

篇，约二万余言。先生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以体例分为甲乙两编。甲编共十三篇，新十二，旧一。自序曰：

> 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至谓近日所云学问发为文章，与古之有德有言殊异，无怪前人诋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原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

其余十一篇，附存旧作二篇，为乙编，皆专论文史。统名《姑孰夏课》。甲编之目虽不可知，然《原道》、《原学》诸篇必在其内。以意度之，为下列十二篇：

《原道》 上、中、下。
《原学》 上、中、下。
《博约》 上、中、下。
《经解》 上、中、下。

《原道·上》论道起于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谓“社会的生活”也。又说，“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又说，“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此皆精到之言。他过崇周公，说他“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虽然很可笑；但他认道在制作典章，故宁可认周公而不认孔子为集大成，也不能不算是一种独见；我

们可以原谅他的谬误。

《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自是一种卓识。此意清初颜元、李塨、费密诸人皆主之，浙东学术亦与此派有相近处，但不必说实斋之论必本于前人耳。此篇说："后世……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原学·上》篇论学者"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中篇论"学必习于事。……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下篇论"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下篇切中清儒弊病。

《博约》诸篇与《原学》相发明，其中篇尤痛切：

> 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度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为高情胜致，至

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褚补苴为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经解》三篇，大旨谓“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此亦实斋平生一大主张。

浙江图书馆所藏会稽徐氏钞本《章氏遗书》目录纸下，有原来被贴去的《文史通义》目录。那隐目各篇题下皆有原注。今据那些原注，可证我上文意度的诸篇确是今年的作品：

《原道》上、中、下。　　原注“庚夏钞存”。
《原学》上、中、下。　　《博约》上、中、下。
《经解》上、中、下。　　原注“庚戌钞存《通义》”。

又下列诸篇那隐目皆注“庚戌钞存《通义》”：

《史释》　《史注》　《习固》　《文集》　《天喻》
《师说》　《假年》　《说林》　《匡谬》　《辨似》
《朱陆》　《知难》　《感遇》　《感赋》

亦可认为此年所作。大约因庚戌在武昌开局编书，有钞胥可令抄存旧稿，不似此年之东奔西跑也。（那隐目久晦于世，最近才由姚名达发现。）

《文理篇》因见左良宇案上的《〈史记〉录本》而作，自是

这年在太平的作品。《家谱杂议》、《与冯秋山论修谱书》及代徐氏所作传文，当然亦是此时做的。

《习固篇》教人以思辨之法，石破天惊，全书第一杰作。略录于左：

> 辨论乌乎起？起于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于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于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于秋毫。耳力穷乎蚁穴。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于是非之微而极于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宝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于无所见是非也。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若素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于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于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于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于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于向之所云也。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

其平而无足奇者也。……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于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于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于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遵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先生在太平留三月，六月自太平返亳，道经扬州，访沈业富，留扬州几一月，沈先生令人抄存先生文稿四卷。七月抵亳州，有儿妇之丧。（按《丁巳诗》注，此乃贻选之妇。）移居民家。八月游湖北，留月余，见史致光。史时官湖北乡试正考官。十月回亳州。（《答沈枫墀论学》、《跋酉冬戌春志余草》、《张介村家传》、《丁巳岁暮书怀》、《与陈鉴亭论学书》、《耆献类徵·史致光传》）

是年十一月，有《答沈枫墀论学》一书，于考订、辞章、义理三者，皆有平允之论。如云：

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足下有志于文，正当益重精学之士。能重精学之士，则发为文章，必无偏趋风气之患矣。……要之，文易翻空，学须摭实。今之学

者虽趋风气，竞尚考订，多非心得，然知求实而不蹈于虚，犹愈于掉虚文而不复知实学也。

此书可与《原学》《博约》诸篇参看。（沈枫墀名在廷，业富之子。）

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上毕制府书》。（见刘本补遗）附五言古诗以祝毕沅六旬初度。

是年秋冬，在亳州时，为知州裴振修州志。（《何君家传》）

长子贻选归自京，先生有《论文示贻选》。

起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迄明年二月三日，得大小杂著文稿二十一件，名为《酉冬戌春志余草》。（原跋）

此外，是年书信较要者，有《与周永清辨论文法》、《与史余邨论学书》、《与陈鉴亭论学书》、《与邵二云论文》、《与朱少白论文》、《又与永清论文》、《与家正甫论文》等篇。

是年四月，周震荣为先生刊行《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并作跋。

友人任大椿卒（《任别传》）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先生五十三岁。

长孙殇于亳州侨寓，（《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先生去年冬间答沈枫墀书，说："遥计正月之杪，《志》事未能卒业，便须挈此遗绪又作楚游矣。"今年有《与邵二云论学》一书，云："二月初旬，亳州一书奉寄，屈指又匝月矣。

仆于二月之杪方得离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阳馆未成，制府（毕沅）即令武昌择一公馆，在省编摩，于仆计亦较便也。”大概《亳州志》，至二月始成书。故先生《与周永清论文》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

先生对于《亳州志》自视甚得意，故《与周永清论文》云：

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语旁参，与足下同。而地广道远，仆又逼于楚行；四乡名迹，未尽游涉；而孀妇之现存者，不能与之面询委曲：差觉不如永清。然文献足征，又较永清为远胜矣。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贵远，自不察耳。后世是非终有定评。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

《亳州志》我未见。据《安徽通志·裴母查宜人墓志铭》，亳州知州裴振是年即去任，则此书不及刊板，当已佚。今从《文史通义》所保存残稿观察，其书盖具二特色：一为人物表，一为掌故。

《人物表例议》（《文史通义》外篇二）曰：

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

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剪裁。至于品皆曾、史，治尽龚、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于自郐无讥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托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昧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蔽久矣。……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于人物，于义未安。……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详于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于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

《掌故例议》曰：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于功令，守于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故求于今日之志，

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于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可不挈也。……

又曰：

故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有条贯，以成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先生又有《与史余村》一书（此篇浙本无之，此据马夷初先生所钞山阴何氏钞本）云：

近撰《亳州志》，更有进境。《新唐书》以至宋、元诸史书志之体不免繁芜，而汰之又似不可，则不解掌故别有专书，不当事事求备也。列传猥滥，固由文笔不任，然亦不解表例，不特如顾宁人所指班、马诸年表已也。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诟詈，几如众射之的。仆细审之，岂惟不可轻訾，乃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此例一复，则列传自可清其芜累耳。

先生所作诸志，至是体例始完备。文徵之例起于《和州志》，《永清志》详于六书，但掌故未成专书。“阙访”之列传

与“前志”之列传，二例亦起于《和州志》，得人表而法更简要。掌故之列为专书，确是先生的一大贡献。前此先生论方志，虽自夸得史法，其实仍是文家居十之七八，而史家仅居二三。至掌故一例成立，方才可称为史家之“方志”。先生后来作《方志立三书议》曰：

>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

此实是志书的大法。

但实斋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他说：

> 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修］《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连床叠几，难窥统要。……
>
> ——《〈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又说：

> 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官府，人可咨于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藉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倍汉而《宋史》倍唐，……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而亡之矣。
>
> ——《例议》中

此种议论甚为可笑。《史记》诸书乃后人东抄西凑补成的，故空言多于名物。《汉书》诸志已稍详于名物事实，已非“讨论大凡”了。欧阳［修］《新唐书》以下，记载名物制度之详，远胜前代，此正是史学上一大进步。实斋乃以“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为病，真是说梦话！况且印书术进步以后，重要的书籍皆有刻本，不易遗失。实斋因怕书繁重而易失，就反对详细的志书，这也是一大错误。他不知古今保存典籍的方法大不同，《尚书》虽简短，难免于亡逸；《宋史》、《明史》虽繁重，终不会失去了。

在亳州修志时，删定《和州志例》为《叙论》一卷（今存），删订《永清全志》为《新志》二十六篇。（《又与永清论文》、《上毕抚台书》）《新志》今未见。

由亳州往湖北时，有《家书》七，极有关系：

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但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方纲)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盖端临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顾，知己落落，不过数人，又不与吾同道。每念古人开辟之境，虽不知殁身之后，历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当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门人为之左右前后，而道始不孤。今吾不为世人所知，余邨、虎脂又牵官守，恐未能遂卒其业。尔辈

于此，独无意乎？

吾于古文辞，全不似尔祖父；然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柢则出邵氏，亦庭训也。

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沈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

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所谓乐则能生，不乐则不能生也。……攻习之余，必静思以求其天倪。……求于制数，更端而究于文辞，反覆而穷于义理。循环不已，终期有得。

是年在武昌，编《史籍考》。毕沅方编《续通鉴》，先生亦襄助其事。十二月，作《任幼植别传》。（本传）

是年抄存杂文中有《郑学斋记书后》及《朱先生墓志书后》二篇，皆甚有关系之文。《郑学斋记》见段刻《戴东原集》卷十一，原文有“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又说：“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岐为异端者，振其藁

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先生书后曰：

> 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说，而其《与任幼植书》则戒以轻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凡学者于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之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学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记数，不敢稍失，犹可谅其愚也。黠者不复需学，但袭成说，以谓吾有所受者也。盖折衷诸儒，郑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郑学”，即不劳施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犹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贼也。……

先生此论可谓深知戴氏之学。先生虽常不满于戴，然先生实真知戴者，观此篇可证。

是年抄存《通义》，可考者凡十四篇，已叙入去年。其他重要文章可推为是年所作者，《家书》七通外，《跋酉冬戌春志余草》、《与邵二云》、《与邵二云论学》、《跋陈西峰韭菘吟》、《跋孙香泉读书记》、《史学例议书后》二篇，《书朱陆篇后》。又徐本注明是《庚辛间草》的《释通》、《答客问》诸篇，皆可推为是年所作。

《答客问》三篇，是先生讨论史学的最重要文字。今摘录

于左：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可贵也。……

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

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自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

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

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

《甲乙剩稿》内有《报黄大俞先生书》，和这篇互相发明：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欹轻欹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连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释通》上半篇考"通史"之起原，叙"通史"之流别，皆前人所未道。其下半篇论通史的利弊，尤为精到。兹摘录于次：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

何谓免重复？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陈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

何谓均类例？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天文》，不载推步；唐书《艺文》，不叙渊源：伊古以来，参差如是。……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檃栝。《隋书》、《五代史志》，终胜沈、萧、魏氏之书矣。

何谓便铨配？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于臣下，则约略先后，以次相比。然子孙附于祖父，世家会聚宗支，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

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

何谓去牴牾？断代为书，……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牴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于范；

二刘始末，范异于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

何谓详邻事？僭国载记，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国载记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东魏悉其端，而五代汇 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矣。

凡此六者，所谓便也。

何谓具剪裁？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乎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

何谓立家法？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凡此二者，所谓长也。

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

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

何谓忘标目？……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

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

凡此三者，所谓弊也。

《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

腊月上旬有《江宁金石记·序》。（据原书）（《遗书》所载，题目文字皆略有不同。）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先生五十四岁。

是年仍在武昌为毕沅编《史籍考》。

作《陈伯思别传》。（此传亦浙本《遗书》所未收）

七月，周永年死，先生为作《周书昌别传》。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中之《史德》篇，《〈唐书纠谬〉书后》、《读史通》、《驳孙何碑解》、《论文上弇山尚书》、《朱先生别传》等篇。此外又有《庚辛间草》中《同居》、《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与邵二云》（辛亥）、《与族孙守一论史表》（辛亥）、《家书》七篇（庚戌），《元次山集书后》、《王右丞集书后》、《朱校韩文考异书后》、《东雅堂韩文书后》、《葛板韩文书后》、《朱子韩文考異原本书后》、《韩诗编年笺注书后》、《韩文五百家注书后》、《宜兴陈氏宗谱书后》、《冯瑶罂别传》、《曾麓亭传书后》……等篇。

是年始识胡虔（雒君）于武昌督署，（《胡母墓表》）盖胡虔亦受聘来编《史籍考》也。先生为其母作墓表。（《柿叶轩笔记》卷首《胡虔传》）

是年先生似曾修《麻城县志》。(《横通》)
《史德篇》论主观可以夺真实，其言极精。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

> 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以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文。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又《说林篇》云："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可为此篇"天""人"的注脚。又《答客问》说史的目的在"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也是这个意思。

这年有《答吴胥石书》，九月十三再答。（并吴来书皆见《吴氏族谱稿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先生五十五岁。

是年，先生仍编《史籍考》。（《与阮学使论求遗书》）闰四月，先生著《纪年经纬考》成，有序。后嘉庆十一年唐仲冕刻此书，误题先生之姓为张。（姚名达《纪年经纬考序》）

是年，毕沅《续通鉴》修成，先生代毕沅作书寄钱大

昕云：

《宋元编年》(此书初名如此)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檃栝。拾遗补阙，商榷繁简，不无搔首苦心。……按司马氏书于南北朝之争相雄长，五代、十国之角特鼎峙，其详略分合本于《左氏春秋》之详齐、晋。而陈、王、薛三家纷纷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昆山书最为晚出，一时相与同功，如万甬东、阎太原、胡德清诸君，又皆深于史事，宜若可以为定本矣。顾《永乐大典》藏于中秘，有宋东都则丹棱李氏《长编》足本未出，南渡则井研李氏《系年要录》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于书虽称缺略，亦其时势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如辽、金正史止阅本纪，间及一二名人列传，而诸传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后，元至顺前，荒略至于太甚，则不尽关遗编遗事之未出矣。……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今宋事据丹棱井研二李氏书而推广之，以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徵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鄙见区区自谓此书差有功于前

哲，然眉睫之喻实著书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盖取不敢遽续《通鉴》。……章实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义，且欲广吕伯恭氏撰辑，别为《宋元文鉴》，将与《事鉴》并立，以为后此一成之例。鄙以为……马《鉴》而后，续者似可不以《通鉴》为讳。且书之优劣不在名目异同。……名为《通鉴》而书之可嗣涑水与否，则存乎后人之衡度矣。……惟涑水之书中有评论，……鄙则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所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今则姑从缺如，未为失司马氏意否？其年经国纬，撮其精要，以为目录，亦岁内可以讫功。大约明岁秋冬拟授刻矣。而章实斋乃云："纪传之史引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就求其说，则欲于一帝纪中略仿《会要》门目，取后妃、皇子、将相、大臣、方镇、使相、谏官、执事、牧守、令长之属，各为品类，标其所见年月，定著"别录"一篇，冠于各帝纪之首，使人于编年之中隐得纪传班部；以为较涑水目录举要诸篇尤得要领。且欲广其例而上治涑水原书，以为编年者法。然续书而遽改原书规模，嫌于无所师授。实斋则言其意本于杜氏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诸谱例耳。鄙意离合参半，未能抉择。凡此皆就质高明，如何如何？全书并

录副本呈上，幸为检点舛误。……

此书论《续通鉴》的义例，说的甚明白，但先生后八年作《邵与桐别传》，中有云：

> 已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文汇》本作“宾”）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异。公未惬心，属君（邵）更正。君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公旋毙于军，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毙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乃宾客”以下，《国朝文汇》本作“仅止数卷，杀青未竟，家旋籍没，君之所寄，不可访矣。”）

又先生之子贻选注云：

> 先师（邵）为毕公复审《续鉴》，其义例详家君代毕公论《续通鉴》书，与毕氏所刻仅就徐氏增损之本迥异。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

适按：此事有可疑处。《续通鉴》初刻于嘉庆二年丁巳，即毕沅死之年，时邵晋涵已死了一年。毕沅家之抄没在嘉庆四年己未，是时《续鉴》尚未刻成，仅百三卷而止。后一年，嘉庆五年，冯集梧买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于成，乃为补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据嘉庆六

年三月冯集梧《续通鉴》序）是先生作《邵传》之时，（嘉庆五年）《续鉴》并未有刻本。先生传中所说，与贻选注中所说，似皆未可凭信。此一可疑。（若据《文汇》本，则毕家所刻，亦仅数卷，与事实相符。）况代致钱大昕书乃壬子所作，去刻书之时尚隔六年，而书中已言"邵与桐校订颇勤"的话，（据王昶《与毕沅论〈续鉴〉书》，亦谓邵早参与。）是邵氏校订之本已成于壬子之前，不容至己未付刻时犹用宾客初定之本。此二可疑。先生作《邵传》之年，即冯集梧买得《续鉴》原稿及残板之年，原稿尚在。先生说邵本"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的话，似亦无据。此三可疑。冯序又云："毕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年处，俱各冠年号，与前已刻一百三卷体例不合，亦姑仍之。"疑当时刻书时，不止一个副本，一为冠年号本，一为不冠年号本。此二本中，冯氏得其一本。若邵氏定本果至毕沅出征时始寄到，不知即是此二本之一否？此亦可疑。又代致钱大昕书说此书只有二百卷，今冯刻本有二百二十卷，钱大昕作毕沅的《墓志铭》，亦称二百二十卷。岂壬子之后又增加二十卷耶？抑二百二十卷本为邵氏改定本耶？若如后说，则先生所痛惜之邵本今尚在人间，成为定本，更可宝矣。此亦一可疑也。又据《钱大昕年谱》嘉庆二年始为毕沅复勘《续通鉴》。

（附记一）《续通鉴》冯刻本二百二十卷，虽署嘉庆二年，实成于嘉庆六年。板存嘉兴冯氏；同治丁卯归上海道应宝时，补刊六十五板；今归江苏书局。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作三百二十卷，注"嘉庆二年《经训堂》刻本；《书目答问》亦作三百二十卷，皆误。惟莫友芝《郘亭［书］目》所记作二百二十卷，

不误。

(附记二)刻《续通鉴》之冯集梧，为作《苏诗合注》之冯应榴之弟，与先生为丁酉同年生，先生曾为作《奉砚图记》。

是年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有云：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邵氏生于乾隆壬戌)，中间得过日多，约略前后自记生平所欲为者，度其精神血气尚可为者有几？盖前此少壮或身可有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后世；后此精力衰颓，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约计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阅涉至是不为不多，中见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书，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

先生对于邵晋涵的期望最深，故时时督责之。又云：

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立三书》之议同出新著。……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堕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夫……《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

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推论甚精，造次难尽，须俟脱稿便当续上奉郢质也。

但古人云，载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既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也。……仆于此役，……恐如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耳。然足下进而教之，或竟免于大戾，未可知也。

此书可为《书教》三篇作一很好的注解。《书教》三篇实可代表先生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今摘录如下：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上)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记注藏往以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

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

宪（即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史学亦复类此。……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以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

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隳栝，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定之或遗而或溢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以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至于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下)

先生这个主张，在我们今日见惯了西洋史学书的人看来，固然不算新奇；但在当时，这确是一个很新奇的见解。故邵晋涵答书评此论云：

> 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

很可惜的是先生的《圆通篇》始终不曾做成；更可惜的是先生的《宋史》也不曾成书。

《方志立三书议》的大旨说：

>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

是年先生尚有《史学别录例议》一篇，即代毕沅论《续通鉴》书中所说“别录”的例议。其大旨分二种办法。一为纪传之史的别录：

> 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篇，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得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者也。

一为编年之史的别录：

> 今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分名目，注其终始年月。……至于两国聘盟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

是年夏，先生长子贻选自亳州入京，访周震荣于固安。秋，先生嘱访张维祺于单县馆次，冬十月，周震荣卒。(《张介邨家传》、《周筤谷别传》)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先生五十六岁。

是年先生仍编《史籍考》。(《与阮学使论求遗书》)

先生自亳州到武昌时，仅携一妾自随，家口仍留在亳州。至是年家眷始自亳归会稽，先生所藏书之大部分亦于此时寄归，先生在湖北买楠木书橱十二只，寄归收藏精要书籍。(《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是年有《与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据内藤目，题下有“癸丑录存”四字。)自壬子以来，先生任《湖北通志》事。《通志》不知起于何年；按先生代毕沅作《通志序》，所说年代，甚不分明。初看来，好像《通志》始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但下文

又说“凡再逾年而始得卒业”，据此，则又似《通志》始于壬子。先生壬子任《志》事，屡见于《遗书》中，如《李清臣哀辞》、《孝义合祠碑记》等。以“再逾年”之语推之，当成于癸丑、甲寅之间。先生在这几年之中，除主修《通志》外，尚修有湖北的几种府县志。（一）为《常德府志》，凡一年而成，为书二十四篇：纪二，考十，表四，略一，传七。别有《文徵》七卷，《丛谈》一卷。（《为毕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二）为《荆州府志》，名为知府崔龙见撰，实亦先生所撰：首纪，次表，次考，次传。亦附有《文徵》及《丛谈》。卷数未详。先生且亲到荆州。（《为毕制府撰〈荆州府志〉序》；参考《复崔荆州书》。）（此二志年岁不可考，《荆州志》大概成于癸丑、甲寅之间，故《覆崔荆州书》有“鄙人又逼归期”的话，当即指甲寅年离湖北。故附记于此年。）

是春，草稿册名《癸春存录》。又有《癸丑存录》。（浙本目）

是秋，先生节钞友人王凤文《云龙纪往》为《云龙纪略》，字句多不尽同，而事实无稍去取。（《纪略》）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先生五十七岁。

是年《湖北通志》脱稿。三月中，乾隆帝巡幸天津，毕沅觐。（《东华录》乾隆一百十九，钱大昕《毕沅墓志》。）

毕沅入觐时，嘱先生于湖北巡抚惠龄。惠龄不喜先生之文，（《〈刘湘煃传〉跋》）余人谗毁先生者亦甚众。时有进士嘉兴陈熷者，乞先生推荐为“校刊”之事，先生为宛转荐于当道，以为“校刊”不过校正字句之讹错而已。不意陈熷受委后，即大驳《通志》全书之不当，以为宜重修。当事大赞赏其议，批

云，“所论具见本源。”先生大愤。及毕沅回省，令先生答复陈议，先生著有《驳陈熷议》一卷，（《方志辨体》、《丙辰札记》）

是年八月，毕沅以湖北邪教案奏报不详实，被议，降补山东巡抚，并罚交湖广总督养廉五年，再罚山东巡抚养廉三年。（详见《东华录》乾隆一百十九）

毕沅既去，先生亦离湖北。时《通志》问题尚未解决。有蕲州陈诗者，曾以十年之功著《湖北旧闻》一书，独赏识先生之书，以为非苟作。时陈诗居武昌府知府胡齐仑幕中，胡请于当道，以《通志》属陈校定。先生亦自幸此书落陈手。临别时，陈语先生云：“吾自有书，不与君同面目。然君书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议得失也。吾但正其讹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丙辰札记》，风雨楼本，页三十八。）

《湖北通志》全书分四大部分：

（一）《通志》七十四篇：

二纪：（1）皇言纪；（2）皇朝编年纪。（附前代）

三图：（1）方舆；（2）沿革；（3）水道。

五表：（1）职官；（2）封建；（3）选举；（4）族望；（5）人物。

六考：（1）府县；（2）舆地；（3）食货；（4）水利；（5）艺文；（6）金石。

四政略：（1）经济；（2）循绩；（3）捍御；（4）师儒。

五十三传：（目多不载，看《遗书》十四）

（二）《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 分四目：官司员额；官司职掌；员缺繁简；吏典事宜。

户科　分十九目：赋役；仓庾；漕运；杂税；牙行等。
礼科　分十三目：祀典；仪注；科场条例等。
兵科　分十二目：将备员额；各营兵丁技艺额数；武弁例马等。
刑科　分六目：里甲；编甲图；囚粮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　分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铜铁矿厂；硝矿；工料价值表等。

(三)《文徵》八集：
甲集上、下　裒录正史列传。
乙集上、下　裒录经济策画。
丙集上、下　裒合词章诗赋。
丁集上、下　裒录近人诗词。

(四)《丛谈》四卷：
(1) 考据；(2) 轶事；(3) 琐语；(4) 异闻。

先生后来以箧中保存的《志》稿，汇订为《湖北通志检存稿》二十四卷，今浙本《遗书》之卷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卷是也。又《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今编为《遗书》卷二十。观此诸卷，可见全书大凡。今录一序一书，以见先生著书之主旨：

《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此题从灵鹣阁《〈文史通义〉补编》本)

　　……臣愚以为志者，识也；典雅有则，欲其可以诵而识也。……今参取古今志义例，剪截浮辞，稟酌

经要，分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略，五十四传，以为《通志》七十四篇，所以备史裁也。臣又惟簿书案牍不入雅裁，而府史所职，《周官》不废。汉臣贾谊尝谓古人之治天下，至纤至悉；前人以为深于官礼之言。今曹司吏典之程，钱谷甲兵之数，志家详之则嫌芜秽，略之又惧阙遗。此坐不知小行人分别为书之义也。今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见行章程，分吏、户、礼、兵、刑、工，叙其因革条例，别为《掌故》一书，凡六十六篇，所以立政要也。臣又惟两汉而后，学少专家，而文人有集。集者，非经而有义解，非史而有传记，非子而有论说：无专门之长，而有偶得之义，是以尚选辑焉。志家往往选辑诗文，为艺文志。不知文艺仿于汉臣班固，乃群籍之著录，而方志不知取法，猥选诗文，亦失古人分别之旨。今于本志正定艺文著录，更取传记、论说、诗赋、箴铭诸篇，编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别为《文徵》一书，所以俟采风也。

昔隋儒王通尝谓古史有三：《诗》、《书》与《春秋》也。臣愚以为《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徵》义本十五国风。古者各有师授渊源，各有官司典守。后世浸失其旨，故其为书，离合分并，往往不伦。然历久推衍，其法渐著。故唐、宋以来，正史而外，有《会要》、《会典》，以法官礼；《文鉴》《文类》，以仿风诗。盖不期而合于古也。惟方志厘剔未清，义例牵混，前后一辙，难为典则，不足以备国史要删。臣忝为旧史官，……用是兢

兢与从事诸臣丁宁往复，勒为三家之书，以庶几于行人五物之义。他日柱下发藏，未必无所取也。……

先生自跋（此跋但见于灵鹣阁本）云：

此序虽为拟笔，实皆当日幕中讨论之辞。制府欣然首肯，且矜言于众，谓于斯事得未曾有也。呜呼，知己之感，九原不可作矣！

先生与陈观民工部（即陈诗）论《史学》及《湖北通志》书云：

仆论史事详矣。大约古今学术源流，诸家体裁义例，多所发明。至于文辞，不甚措议。盖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譬之品泉鉴石，非不精妙，然不可与测海岳也。即如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谓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是故文献未集，则搜罗咨访，不易为功。……及其纷然杂陈，则贵抉择去取。……

仆于平日持论若此，而《通志》之役则负愧多矣。当官采访者，多于此道茫如，甚且阴以为利。……府县官吏疲懒不支。其有指名征取之件，宪司羽檄叠催，十不报六。而又逼以时限，不能尽其从容。中间惑于浮议，当事委人磨勘。……以此败意，分其

心力。然于众谤君哄之际，独恃督府一人之知，而能卓然无所摇动，用其别识心裁，勒成三家之书，各具渊源师法，以为撰方志者凿山浚源；自诩雅有一得之长，非漫然也。

夫著述之事，创始为难，踵成为易。仆阙然不自足者，传分记人记事，可谓辟前史之前蹊矣；而事有未备，人有未全。盖采访有阙，十居七八；亦缘结撰文字非他人所可分任，而居鲜暇豫，不得悉心探讨，以极事文之能事，亦居十之二三也。……

《文徵》之集，实多未备，则缘诗文诸集送局无多，藏书之家又于未及成书而纷纷催还原集，是以不得尽心于选事也。然仆于文体粗有解会，故选文不甚卤莽。……至于诗赋韵言乃是仆之所短，故悉委他人而已无所与。不幸所委非人，徇情通贿，无所不至。恶劣诗赋不堪注目者，仆随时删抹；而奸诡之徒又贿抄胥私增，诚为出人意外。然仆毕竟疏于复勘，当引咎耳。惟是史志经世之业，诗赋本非所重；而流俗骛名，辄以诗赋相请托。情干势挟，蜂涌而来；督府尚且不能杜绝，何况馆中？仆是以甲集选辑纪传，乙集选集议论，而诗赋特分于丙、丁二集：丙集专载佳篇，丁集专收恶滥；譬居家者必有厕圊而后可以洁清房舍！他时势去人亡，则丁集自可毁板。此中剧有苦心，恨委任失人，不尽如仆意也。

……第有稍进于足下者。……前日奉质《顾天锡父子列传》，全出《白茅堂集》；其文几及万言，而仆所自出已意为联络者，不及十分之一；此外多袭原

文，可覆按也。然周窥全集而撷其要领，剪裁部勒，为此经世大篇，实费数日经营，极有惨淡苦心。不见顾氏集者，不知斧凿所施。既见顾氏之集，则此传乃正不宜忽也。《嘉定蕲难》之传，全本赵氏之《泣蕲录》；惟末段取《宋史·贾涉传》载，其淮北之捷及斩徐挥二事，为《泣蕲录》吐气，以慰忠义之心。其文省赵氏原文至十之六七，而首尾层折乃较原录更为明显，亦非漫然为删节也。……史家点窜古今文字，必具"天地为炉，万物为铜，阴阳为炭，造化为工"之意，而后可与言作述之妙。当其得心应手，实有东海扬帆，瞬息千里，乘风驭云，鞭霆掣电之奇；及遇根节蟠错，亦有五丁开山，咫尺险巇，左顾右睨，椎凿难施之困。非亲尝其境，难以喻此中之甘苦也。而文士之见惟知奉韩退之所以铭樊绍述者，不惮怵目刿心，欲其言自己出。此可为应举避雷同之法；若以此论著述，不亦戋戋乎私且小耶？……

此书首论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于己，"真数千年史家未发之至论。中间叙修志时之种种困难，末段自述作文的方法，皆绝重要之传料。

是年先生自湖北回乡。(《杜燮均传》、《二代合传》，又汪辉祖《梦痕余录》页五七。《跋甲乙剩稿》则谓"乙卯返故乡。")《梦痕余录》说先生"甲寅归自湖北，就馆近省，往来吾邑，必过余叙谈。"似先生自甲寅以后不曾回至湖北。

楚游五年，《史籍考》功程已十之八九，竟不得卒业！(《与阮学使论求遗书》)

是年汪中（容甫）死，年五十一。汪中以文学高才兼治经学，负当时重望；王念孙序其遗书，谓“宋以后无此作手矣。”先生独于汪氏深致不满意，有《立言有本》一篇及《述学驳文》四篇，皆为汪氏作。其《立言有本》篇云：

> 江都汪容甫工词章而优于辞令；苟善成之，则渊源非无所自。……无如其人聪明有余而识力不足，不善尽其天质之良而强言学问，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今观汪氏之书矣。所为《内篇》者，首解参辰之义，……次明三九之说，……大约杂举经传小学，辨别名诂义训，初无类例，亦无次序。苟使全书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鲜助也。杂引经传以证其义，博采旁搜以畅其旨，则此纷然丛出者亦当列于“杂篇”，不但不可为“内”，亦并不可谓之“外”也。而况本无著书之旨乎？……观其《外篇》，则序记杂文，泛应词章，（代毕制府《黄鹤楼记》等亦泛入）斯乃与“述学”标题，如风马牛。列为《外篇》，以拟诸子，可为貌同而心异矣。……

此评实中《述学》的根本毛病。《述学》乃是一种文集不是著作。

先生之《述学驳文》四篇则有得有失。《驳〈释三九〉》一篇，无关宏旨，今姑不论。其《驳〈墨子序〉》前半驳汪中谓墨子之诬孔子等于孟子之诬墨子，实不能使读者心服。汪中论墨子，实有独见处；如云：

> 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学也。

又如：

> 自墨子殁，其学离而为三，徒属充满天下。吕不韦再称"钜子"（《去私篇》、《尚德篇》）；韩非谓之"显学"。至楚、汉之际而微（《淮南子·氾论训》），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于司马谈所述。（适按：此则不然，司马谈实未见墨子之书，司马迁不为立传，《孟荀列传》仅有二十余字，疑亦后人所加。）于后遂无闻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务急国家之事，后之从政者，固宜假正议以恶之哉！

此等议论实二千余年来人所不敢发。实斋讥为"好诞"，如何能令人心服呢？《驳〈墨子序〉》的后半驳汪中论史佚等六家为墨家之渊源，则确有特见。先生向来主张孔子以前并无诸子著书之事，故云："其人有生孔子前者，如《管子》上溯太公之类，皆是后人撰辑，非其本人所自为。……《汉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墨家有尹佚等六家之书，皆在墨子以前。……盖道家有称伊尹、太公之言，后人则误为太公、伊尹之书；墨家有称尹佚之言，后人则误为尹佚之书。……而汪中叙六家为墨氏渊源，不其傎乎？"此言固是卓识，但先生之理由则不充足。

先生说："夫《春秋》以前，尚无诸子著书之事，而厚诬商、周之初有如衰世百家，自于官守典章之外，特著一书以传世乎？"此论不能成立。其实说商周之初有人著书，乃是"过誉"，并非"厚诬"！然此乃古今观点不同，我们亦不能过责实斋。

汪中的《释媒氏文》说《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一条，谓"会"读若"司会"之会，训为"计"；又谓"其有三十不娶，二十不嫁，虽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耻其民，使及时嫁子娶妇也。……《月令》，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非教民盗也；所以著之令，以惧其民，使及时收敛也。"此说虽有意为《周礼》解脱，——其实原文"会"字当如郑玄说，不必作"计"字解；原令乃是《周礼》最大胆的特识，正不须为他辩护，——然大旨不错。先生《驳文》太迂腐，实无道理。

汪中的《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痛论未嫁女子守贞及从死的非礼，乃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其自跋云：

> 婚姻之礼成于亲迎。后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见，钱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许嫁于高，秀水郑赞善之婢幼许嫁于郭；既而二子皆不肖，流荡转徙，更十余年，婿及女之父母咸愿改图，而二女执志不移。袁嫁数年，备受棰楚，后竟卖之。其兄讼诸官而迎以归，遂终于家。郑之婢为郭所窘，服毒而死。传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谓愚矣。本不知礼而自谓守礼，以陨其生，良可哀也。传曰："一

与之齐，终身不二”，不谓一受其聘终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谓不聘二夫也。

此乃社会问题的讨论，其用意与立言皆深可佩服。实斋乃作长文驳之，谓为“有伤于名义”，谓为“丧心”，谓为“伯夷与盗跖无分”。此真“绍兴师爷”之伦理见解！此等处又可见实斋对于当时负重名的人，颇多偏见，几近于忌嫉，故他对于他们的批评往往有意吹毛求疵，甚至于故入人罪。例如此文谓汪中论女子未婚守志，“斥之为愚，为无耻，比之为狂易”；又谓其论未婚殉夫，“指为狂惑丧心”。实则汪中原文只用“愚”字，其他字样皆原文所无。

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先生五十八岁。

作《瀚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有“四十余年远道归来，葺居仅足容身，器用尚多不给，而累累书函乃为长物，可慨也夫！”之语。书凡五千帙，五万余卷。

是年正月，毕沅由山东巡抚回至湖广总督原任。时湖南苗石三保作乱；毕沅奉命筹办粮饷军火，调兵防守攻剿，遂无暇顾及编书的事。故先生亦未回至湖北。

浙本《遗书》卷二十一为《乙卯札记》一卷，另有风雨楼排本，亦题为《乙卯札记》。今按此卷实非乙卯一年之作，中有远在六七年前者；如“得邵二云书，历城周书昌永年编修逝矣”一条，以《周书昌别传》考之，明是乾隆辛亥所记。此条在一卷之中间（浙本二十七页之十四，风雨楼本四十二页之二十一），

可此卷之作尚远在辛亥之前。题为《乙卯札记》，实是错误。风雨楼本卷末有“此册实斋先生五十八岁以前所记。复灿志”一行。此言近是。此卷末条论陆游《入蜀记》，乃驳陈熷之语，(《驳议》云：“《入蜀记》人地俱无关于湖北，宜删。”) 先生先已驳云：“今按其文叙欧阳文忠夷彝旧迹，即今归州境也。”(今见《遗书》十四，页二十四。) 于此处又驳云：“自其年八月十一日自江州至赤沙湖入境，为今黄州地；中历州县无数；至十月二十二日自巴东至巫山县出境，为今宜昌地。逐日为记，计日七旬有余；江行纡曲，为地二千里，书盈三卷；……皆今湖北境内名迹胜事也。……今签驳云云，是将陆氏所经水道二千余里，皆化作鸟道云烟了。”此可见此条作于甲寅驳议之后，大概在此年。故此卷当定为“始于辛亥以前，终于乙卯”。

是年四月之晦，先生到道墟一次，作了《像赞》多篇。(《仲贤公三世像记》) 今尚保存。

十月，离家往扬州。十二月送灶日，《跋甲乙剩稿》，此稿是昨今二年在会稽所作，没有什么重要文章。

冬，阮元督学浙江 (本传)，先生有《与阮学使论求遗书》，亦在《邗上草》内。

嘉庆元年，丙辰（一七九六）先生五十九岁。

二月，自扬州暂归会稽，将往湖北。(《跋丙辰山中草》) 在扬州时所作文，统名曰《邗中草》，可考者甚多，较要者为《墓铭辨例》、《驳张符骧论文》、《与吴胥石二简》。在扬州大约为高邮沈氏参校《家谱》，所作有《〈高邮沈氏家谱〉序》及《叙例》，皆在《邗中草》内。(《沈浔州传》、《跋甲乙剩稿》)

春间居乡，曾过道墟。(《后宅分祠碑》) 宗人修辑家庙告成，祭祖，适宗老有病，命先生摄主献酬。祀毕，因与宗人论旧谱荒不易辑，拟试为之。作《神堂神主议》及传记序多篇。(《十叔父八十序》、《元则公、又昌公二代合传》)

作汪辉祖《史姓韵编》及《二十四史同姓名录》二书合序，大旨谓“史之大忌，文繁事晦。史家列传，自唐、宋诸史，繁晦至于不可胜矣。倘欲文省事明，非复人表不可。人表实为治经业史之要册，而姓编名录又人表之所从出也。故曰专门之学，不可同于比类徵事书也。”

三月有《与汪辉祖书》，说明两书合序之故。又云：

>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故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词，而古文词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

末又云：

> 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

据此，则《文史通义》于先生未死时已有选刻本，今不可见矣。

是年所作《文史通义》稿，名为《丙辰山中草》，凡十六篇（跋）。除上述二篇外，可考者，为《文德篇》、《答问篇》、《古文十弊篇》、《淮南子洪保辨》、《答某友请碑志书》，（此据《内藤目》题下注）《与胡稚君论校胡稚威集》、《跋屠怀三制义》（据会稽徐氏钞本题下注）《论学十规》（此据臧镛堂《丙辰山中草跋》）及时文序一，与人书数篇。（同上）此外又有札记二段后与丁巳年札记二段合为《古文公式》篇。此诸篇中，无甚重要者，今略举《古文十弊》如下：

（1）剜肉医疮；（2）八面求圆；（3）削趾适履；（4）私署头衔；（5）不达时势；（6）同里铭旌；（7）画蛇添足；（8）优伶演剧；（9）井底天文；（10）误学邯郸。

《遗书》有《丙辰札记》一卷，（浙本卷二十二，亦有风雨楼本）此卷亦非丙辰一年之作，其下半乃丁巳年作也。

是年湖北白莲教起。七月，毕沅由山东巡抚复任湖广总督，忙于用兵。先生欲往续编《史籍考》，因兵事未决，迁延过夏，独自编纂，以至仲秋，始决计北上。八月二十一日，跋《丙辰山中草》，旋离家。（《与汪龙庄简》、《与邢会稽书》、《跋丙辰山中草》、《东华录》）

是年夏，朱筠之弟朱珪（石君）实授为两广总督；六月内调；七月授川陕总督，未到任；旋补安徽巡抚，（《东华录》）先生得信较迟，九月十二日，有《上朱中堂世叔书》，内中云："楚中教匪尚尔稽诛。弇山制府武备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难成；若顾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

辍。迁延观望，日复一日。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倘来之馆谷。可谓惫矣。”书中托朱珪推荐至河南大梁书院或直隶莲池书院。有云：“以流离奔走之身，忽得藉资馆谷，则课诵之下得以心力补苴《史考》，以待弇山制府军旅稍暇，可以蔚成大观，亦不朽之盛事，前人所未有也。而阁下护持之功，当不在弇山制府下矣。”此书之末云：“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按此可见上年《与汪辉祖书》所说欲刻之诸篇，大抵即《易教》三篇、《书教》三篇、《诗教》二篇。故云“题似说经。”又内藤藏本《遗书》目于此信八篇下皆注“已刻”二字，可以为证。

九月十九日，自杭州解缆。行向不详。（似系扬州）岁杪始抵安庆，投朱珪，并因为识布政使陈奉兹。（东浦）（《与邢会稽》、《与赵山阴》、《陈诗序》）

是年六月十五日，邵晋涵卒于北京，年五十四。（《邵与桐别传注》）

（内藤谱记先生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游扬州北城三皇庙，既而归乡，岁杪赴安庆，为道员陈东浦作诗序。适按：丁巳年《札记》中言丙辰四月二十三日游于北城三皇庙，但未言扬州；内藤先生不知系据此条否。以《丙辰山中草》考之，则先生已于二月归乡，直至八月底始出门，则三皇庙当属绍兴也。又为陈东浦作诗序，乃是丁巳年二月之事，不当在此年。“道员”二字亦误，《诗序》有“遍历三司”之语，可证其此时已非道员。据《安徽通志·职官表》，此年布政使是德化人陈奉兹。陈东浦

是德化人，可知即是陈奉兹，而且做了安徽布政使了。又姚鼐作陈东浦墓志铭，更可证。)

嘉庆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先生六十岁。

春，在安庆。作《天玉经解义序》。此书为相地之书，先生序中驳“古无相地之学”之说，引《周官》墓大夫掌辨兆域，谓“候风脉水之理未尝不具于中矣!”可见实斋终不能全脱绍兴师爷的见解。

正月十七，上书朱珪，谋偕胡虔同往杭州，借浙江巡抚谢启昆，学使阮元之力，续编《史籍考》。(《又上朱大司马书》)

二月，作《陈东浦方伯诗序》，此序论诗颇具特识，如云：

> 学诚尝推刘、班区别五家之义（《汉书·艺文志》序诗赋百六家分为五种，亦不明言其所以分五种之故。）以校古今诗赋，寥寥鲜有合者。……或反诘如何方合五家之推，则报之曰：古诗去其音节铿锵，律诗去其声病对偶，且并去其谋篇用事琢句炼字一切工艺之法，而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演为通俗语言，此有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数者，而枵然一无所有，是工艺而非诗也。

这个标准可谓辣极！只有真诗当得起这个试验。章实斋若生晚两百年，他一定会赞成白话诗!

三月，在安徽桐城阅试卷。(《丙辰札记》页三十七）所作文

稿名“桐署偶钞》。（浙本目）

姚鼐此时尝圈点先生规正孙星衍书稿。（据《与朱少白书》）（此书稿似即已佚的《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或尚存的《书原性篇后》。）

先生在桐城时，作《地志统部》，规洪亮吉之非。（徐本隐目）盖因是年洪亮吉刻《卷施阁文集》，载《与章进士书》，反驳先生十年前之说。先生三月十七日《与朱少白书》云：

> 弟辨地理统部之事，为古文辞起见，不尽为辨书也。洪、孙诸公，洵一时之奇才；其于古文辞，乃冰炭不相入；而二人皆不自知香臭：弟于是谓知人难，自知尤不易也。
>
> 诗与八股时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强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别，弟之所辨，较诗名家、时文名家转觉有过之而无不及矣。然生平从不敢与人言诗言时文者，为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谓于斯未能信耳。
>
> 故其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摇动。此种境地，邵先生（二云）与先师（朱笥河）及君家尚书朱珪（石君）皆信得及。此外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己者，不求乎外也。
>
> 以洪君之聪明知识，欲弹驳弟之文史，正如邵先生所云：“此等拳头，只消谈笑而受，不必回拳而彼已跌倒”者也。
>
> 今彼刻驳弟之书，乃因诎于口辨（先生曾在洪家辨过）而遂出于装点捏造，殆较驳邵为更甚矣。此书即

使出弟身后，儿辈力量尚能驳正，平日闻弟之教如史余邨及虎姿舍侄皆能谈笑而挥者也。……

大抵身履其境，心知其意，方有真见解。不用功于实际，则见解虽高而难恃也。

又云：

程易畴（刘本误作田）之于孙、洪诸君，自较胜矣。彼刻《通艺录》，直《周官》之精要义也。而不今不古之传志状述，犹自以为文也，而亦列其中，岂非自村俚供招？

程易畴（瑶田）与先生亦熟悉。据《庚辛之间亡友传》，庚子、辛丑之际，何思钧托先生求儿师，先生既荐顾九苞而时往谈款。时程易畴亦寓于何，出其著述，共相叹赏，以为得未曾有。

三月底，返安庆。（《与朱少白书》）

五月，陈东浦介绍先生到扬州，投盐运使曾燠（宾谷）至秋始得见曾。曾燠在扬州颇招致名士，提倡风雅，此时方拟修方志，有延先生主其事之意。后志事似作罢，先生留扬州至岁暮辞归，有《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为志别》七古长诗一篇，历叙一生的遭际，最可供传料。诗中自注尤重要。

在安徽时，屡与朱珪及朱筠之子锡庚（少白）通信。又有《湖北通志检存稿跋》谓“今志事为寇㹢所阻，尚未刊行。故汇订存稿为二十四卷。”又作《湖北通志辨例》一卷。（按现今尚存的《湖北通志检存稿》仅有四卷，则所佚尚多。）又作《方志辨

体》一篇。(《丙辰札记》之丁巳部分)

是年七月，毕沅卒于辰州军中。故先生诗有“终报前军殒大星；三年落魄还依旧，买山空羡林泉茂”之句。

曾燠有《赠章实斋国博》诗，写先生之奇丑，也是一种有趣味的史料，故附录于此：

章公得天秉，赢绌迥殊众。
岂乏美好人？此中或空洞。
君貌颇不扬，往往遭俗弄。
王氏鼻独齇，许丞听何重？
(参看上文引洪亮吉诗“君托左耳聋”之句。)
话仿仲车画，书如洛下讽。
又尝患头风，无檄堪愈痛。
况乃面有瘢，谁将玉璩砻？
五官半虚设，中宰独妙用。
试以手为口，讲学求折衷。
有如遇然明，一语辄奇中。
古来记载家，庋置可充栋。
歧路互出入，乱丝鲜穿综。
散然体例纷，聚以是非讼。
孰持明月光，一为扫积雺？
赖君雅博辨，书出世争诵。
笔有雷霆声，訇訇止市哄。
《续鉴》追温公，选文驳萧统。
乃知貌取人，山鸡误为凤。
武城非子羽，谁与子游共？

感君惠然来，公暇当过从。

此诗见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八，亦见于《章氏会谱德庆四编》卷十，杨君又引谢蕴山《怀人》诗有“耳聋挥牍易，鼻垩运斤难”之句，亦为先生作也。

是年袁枚死，年八十二。先生对于同时的三个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贬辞。但先生对戴震，尚时有很诚恳的赞语；对汪中，也深赞其文学；独对袁枚，则始终存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遗书》中专攻击袁枚之文，凡有五篇：（1）《妇学》；（2）《妇学篇书后》；（3）《诗话》；（4）《书坊刻诗话后》；（5）《论文辨伪》。攻袁之端始见于此年；《丁巳札记》有一条云：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此即《妇学》诸篇之动机与目的。先生之攻戴震，尚不失为诤友；其攻汪中，已近于好胜忌名；至其攻袁枚，则完全是以“卫道”自居了！《妇学》篇有云：

自宫禁革除女乐，官司不设教坊，则天下男女之际无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顿妓，渔色售奸，并干三尺严条，决杖不能援赎。（职官生监并是行止有亏，

永不叙用。）虽吞舟有漏，未必尽罣爰书；而君子怀刑，岂可自拘司败？

这完全是“绍兴师爷”的口吻。其《书后》有云：

《妇学》之篇，所以救颓风，维风教，饬伦纪，别人禽，盖有所不得已而为之，非好辨也。

袁枚的为人，自然有许多不满人意之处。但此人在那个时代，勇于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议论，自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论诗专主性情风趣，立论并不错，但不能中“卫道”先生们的意旨，故时遭他们的攻击。《妇学》篇之所以流通最早最广者，正是为此。实斋之攻袁氏，实皆不甚中肯。如云：

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

又云：

略《易》、《书》、《礼》、《乐》、《春秋》而独重《毛诗》；《毛诗》之中，又抑雅、颂而扬国风；国风之中，又轻国政民俗而专重男女慕悦；于男女慕悦之

> 诗，又斥诗人风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兰赠芍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驳诗文须有关系之说。自来小人倡为邪说，不过附会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闻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而恣为倾邪淫荡之说至于如是之极者也。

实斋所攻，在今日观之，正是袁氏之特识。此亦古今观点不同之一也。

先生不能作诗，乃有《题〈随园诗话〉》十二首，大半是谩骂之作，如云：

> 江湖轻薄号斯文，前辈风规误见闻。
> 诗佛诗仙浑标榜，谁当霹雳净妖氛？
> 诬枉风骚误后生，猖狂相率赋闲情。
> 春风花树多蝴蝶，都是随园蛊变成。
> 堂堂相国仰诸城，好恶风裁流品清。
> 何以称“文”又称“正”，《随园诗话》独无名？
> **(此指刘统勋。据先生云，统勋子墉，官江宁时欲以法诛袁枚，而朱筠为解脱之。语见《论文辨伪》篇。)**

嘉庆三年，戊午(一七九八)先生六十一岁。

(《内藤谱》误脱一年)

三月，作汪辉祖《〈三史同名录〉序》。先生于辽、金、元三史多同姓名之人一问题，曾于《丙辰札记》论及之，要旨云：

> 对音翻译，文字无多。名字相同，触处多有。作史者自应推《〈春秋〉释例》，兼法古人同姓名录，特选为同名考，将全史所载无论有传无传之人，凡有同名，详悉考列，勒为专篇，与国语解并编列传之后。

此次作序，即用此段札记，末加数语述汪书之详审而已。

此年，在杭州，借谢启昆（蕴山、苏潭）之力，补修《史籍考》。（据王宗炎记在《两浙輶轩录补遗》的话，及吴兰庭《复章实斋书》，阮亨《瀛洲笔谈》卷八页五，卷十页二。）助手有袁钧（陶轩）胡虔等。（《瀛洲笔谈》、《柿叶轩笔记》卷首方损之所作《胡虔传》。）毕沅死后，《史籍考》未成。先生“就其家访得残余，重订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润饰，为成其志。（《史考释例》末节）

《史籍考》全书不传，诸家目录多不提及此书，（惟《丛书会要》言毕沅未刊书有《史籍考》百卷）不知流落何所。马夷初先生（叙伦）抄得杨见心先生所藏先生未刊稿一卷，中有《史籍考》总目，附录于此：

《史籍考》总目

（一）制度　二卷
（二）纪传部　正史14卷　国史5　史稿2
（三）编年部　通史7　断代4　记注5　图表3
（四）史学部　考订1　义例1　评论1　蒙求1
（五）稗史部　杂史19　霸国3
（六）星历部　天文2　历律6　五行2　时令2
（七）谱牒部　专家26　总类2　年谱3　别谱3
（八）地理部　总载5　分载17　方志16　水道3

外裔 4

(九)故事部 训典 4 章奏 21 典要 3 吏书 2 户书 7 礼书 23 兵书 2 刑书 7 工书 4 官曹 3

(十)目录部 总目 3 经史 1 诗文(即文史)5 图书 5 金石 5 丛书 3 释道 1

(十一)传记部 记事 5 杂事 12 类考 13 法鉴 3 言行 3 人物 5 别传 6 内行 3 名姓 2 谱录 4

(十二)小说部 琐语 2 异闻 4

共三百二十五卷。

马先生的抄本中有《史考释例》一篇为《遗书》所无。其中义例亦与《遗书》中之《论修〈史籍考〉要略》一篇不同。盖《修〈史籍考〉要略》为草创时的义例,而《史考释例》乃成书的义例,故后者更胜于前者。《修〈史籍考〉要略》云:

> 校雠著录,自古为难。二十一家之书,志典籍者仅有汉、隋、唐、宋四家,余则阙如。《明史》止录有明一代著述,不录前代留遗;非故为阙略也,盖无专门著录名家,勒为成书,以作凭藉也。史志篇幅有限,故止记部目,且亦不免错讹。私家记载,间有考订,仅就其耳目所及,不能悉览无遗。朱竹垞《经义》一考为功甚钜,既辨经籍存亡,且采群书叙录,间为案断,以折其衷。后人溯经义者所攸赖矣。第类例间有未尽,则创始之难;而所收止于经部,则史籍

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尽，势固不能无待于后人也。今拟修《史籍考》，一仿朱氏成法，少加变通，蔚为钜部，以成经纬相宜之意：

一曰古逸宜存。
二曰家法宜辨。
三曰剪裁宜法。
四曰逸篇宜采。
五曰嫌名宜辨。
六曰经部宜通。
七曰子部宜择。
八曰集部宜裁。
九曰方志宜选。
十曰谱牒宜略。
十一曰考异宜精。
十二曰板刻宜详。
十三曰制书宜尊。
十四曰禁例宜明。
十五曰禁摭宜详。……

《史考释例》首论“著录”，极推崇朱彝尊之《经义考》。次论“考订”，谓刘歆为著录，而刘向“所为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上之言”乃是考订群书之鼻祖，其事难于著录。次言史部占群籍三之一（经为其一，子、集合为其一），而三部多与史相通。次分论十二纲五十七目之义例，文繁不具引。我们读此篇有三点可注意。第一，《史考》原稿分一百十二子目，

先生为并省成十二纲五十七目，为书三百二十五卷，可见先生对于此书所费心力之钜。此稿今竟不传，藏书家亦未见著录，真是学术史上一大憾事。第二，《释例》末云："予既为朱氏补《经考》，因思广朱之义，久有斯志。"此系代谢启昆说话，所谓补《经考》，即补《小学考》也。第三，先生论史部虽划分群籍三分之一，而实"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此论为先生的一种特见。先生初从事于《史考》时，曾有《报孙渊如书》云：

> 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

先生作《文史通义》之第一篇——《易教》——之第一句即云："六经皆史也。"此语百余年来，虽偶有人崇奉，而实无人深懂其所涵之意义。我们必须先懂得"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这一句总纲，然后可以懂得"六经皆史也"这一条子目。"六经皆史也"一句孤立的话，很不容易懂得；而《周易》一书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露出勉强拉拢的痕迹。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说法，便不难懂得了。先生的主张以为六经皆先王的政典；因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价值。故他《报孙渊如书》说"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史考释例》论六经

的流别皆为史部所不得不收；其论《易》，只说“盖史有律宪志，而卦气通于律宪，则《易》之支流通于史矣。”次论子部通于史者什有八九；又次论集部诸书与史家互相出入。说“什有八九”，说“互相出入”，都可见先生并不真说“一切子、集皆史也”，只是要说子部、集部中有许多史料。以子、集两部推之，则先生所说“六经皆史也”，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此种区别似甚微细，而实甚重要，故我不得不为辩正。

是年吴兰庭有《答章实斋书》(见《族谱稿存》)云：

> 别来又十余年，……自邵与桐死，遂不复知足下游历所在。顷接手书，知近客杭州。……承示近刻数首，其论史之识，有刘知几所未及者。《史籍考》经所裁定，足为不刊之典。然恐亦未能悉如所拟。盖意见参差，不无迁就，天下事大抵如斯矣！

此书又讨论修谱事。据严元照《悔庵学文集》吴传云：“丙辰自京师南归，又二年而吴氏重修族谱，叟独任其役，……尝乞会稽章典籍学诚为己作传。”则知先生在杭州续修《史籍考》确是此年之事。

是年六月，谢启昆、胡虔、陈鳣等编《小学考》成。(原书序)

是年先生有《戊午钞存》一卷，此卷中之文间有丁巳年所作的，——如《天玉经解义序》——但大部分都是戊午年作的。要目如下：

《立言有本》(论《述学》，见前)

《述学驳文》(见前)
《论文辨伪》(驳袁枚,见前)
《上石君先生书》(寄《论文辨伪》)
《上辛楣宫詹书》(此书不是此年作的,是壬辰年作的。)

《上石君先生书》作于戊午六月,有“五月在苏州陈方伯处附达笺记,兼贡《云龙记略》一卷,……”等语,知先生是年曾到苏州,留在陈东浦处。大概到毕沅家取得《史考》原稿即在此时。

是年冬,在扬州,主于曾燠官署。立冬日,作《八座云说》。又有《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是年九月十日,阮元任满去浙江。

嘉庆四年,己未(一七九九)先生六十二岁。

(内藤谱误作“四年戊午,先生六十二岁。”)

正月,乾隆帝崩。嘉庆帝亲政,权臣和珅赐死。和珅当国数十年,养成了一个匪乱遍地的现象,故此次他的倒败使当时的人心一振。先生游迹遍于南北,深悉当时的利弊,故是年有论时政的书六篇:

(1)《上执政论时务书》;
(2)(3)(4)《上韩城相公书》三篇(宰相王杰,韩城人);
(5)《上尹楚珍阁学书》;
(6)《与曹定轩侍御论贡举书》。

此诸书皆确有见地，故摘抄于此。

《上执政书》大意说："今之要务，寇匪一也，亏空二也，吏治三也。……事虽分三，原本于一。亏空之与教匪，皆缘吏治不修而起。"但他进一步说，当日的乱匪都说"官逼民反"，其实吏治之坏也很像良民之协从，都是不得不然。他说：

> 其最与寇患相呼吸者，情知亏空为患而上下相与讲求弥补，谓之设法。天下未有盈千百万已亏之项，只此有无出纳之数，而可为弥补之法者也。设法者，巧取于民之别名耳。……既讲设法，上下不能不讲通融。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谋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则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理势然也。

此下两长段，一言"设法之弊，非仅伤吏治，亦坏人才"，一言"设法之弊，非特损下，抑且损上"。皆重要的史料，又云：

> 设法之弊至于斯极，……而未有直陈其事者，盖恐禁止设法，则千百万之亏项将何措耳。愚窃以为此无患也。……今之亏空所谓竭且乾者，其所决之流可以指诸掌也。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讫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几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贪婪黩货；始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以数十万计，或百万计

> 矣。一时不能猝办，率由藩库代支，州县徐括民财归款。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今之盈千百万所以乾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县向以狼籍著者，询于旧治可知。而奸胥钜魁，如东南户漕，西北兵驿，盈千累万，助虐肥家，亦可知。(亦下浙本衍不字，今据上下文删) 督抚两司向以贪墨闻者，询于廷臣可知。……此辈蠹国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酿，今之亏空皆其所开；其罪浮于川、陕教匪，骈诛未足蔽辜。……其所饱贪囊，皆是国帑民膏，岂可遗患他人，公私交困，而尚许其安然肥家以长子孙? 非惟人事不可，天道亦不容矣。且康熙末年尝亏空矣，彼时上及部库通仓，其数甚于今日。世宗皇帝洞悉其弊，躬行节俭，风励臣工，裁革陋规，小廉大法，未尝责令设法弥补，而所亏之项则取康熙末年贪劣显著之员查抄抵补，十得六七；再有不足，则以耗羡盈余，分年犁析。当时吏治澄彻而府藏充盈，恭读一十三年朱批上谕，可复核也。皇上法而行之，则清厘仓库与整饬官方，正相资而不相背也。整饬官方之与消弭寇患，又为治其源而清其流也。……

清室之乱源实种于乾隆一朝。当时府库空虚，缓急俱不可恃，故川、陕之匪乱已能使政府手足忙乱，应接不暇。至嘉庆时，竟有林清等以乌合之众，直入宫禁，图谋大变。再历一代，遂有太平天国之乱，一举而攻下半［个］中国！先生此书，至今读之，几同先知之预言。其主张籍抄贪官之家产以抵补亏空，

在当日真是大胆之言，虽至今日，犹可采用。

上王杰第一书，即是呈献前书，附论乾隆帝十年一普免丁粮之弊；第二书论陋规不够补亏空；第三书论吏治之坏，州县甘为督抚的鹰犬，甚至督抚反以赃私受州县的挟制。

《上尹楚珍书》论整顿谏官之法，谓科道责在建白，平日乃不责以研究国计民生，仅以资俸得任用，实为不当。先生主张科道当考以经济时务策议，以定去取。

《与曹定轩书》论贡举事，亦有精义。乾隆丙子、丁丑始删表判而改用诗律。先生主张经义诗赋分科，又主张文实并重：

> 头场试以经书文义。
>
> 二场则治经义者，试以经解；长诗赋者，试以韵言。
>
> 三场发策，则三礼、三传、三史、算学、律令、会典之类，分科对策，可以优励实学。其无专长者即其经义诗赋所关，酌试论可也。
>
> 凡专门诸科，必须酌示程式，限年学习。三年五年之后，方可试。未及年限，姑仍旧例可也。

是年友人汪辉祖七十岁，先生为作《七徵》。（《梦痕录》页三十一，此文今不传。）

是年九月，上谕追罪毕沅，夺其家世职。十月，籍没其家产入官。

是年，谢启昆调广西巡抚；冬，阮元升浙江巡抚。（《耆献类徵》）

嘉庆五年，庚申（一八〇〇）先生六十三岁。

是年有《庚申新订》一卷，中多己未年之文。汪辉祖《病榻梦痕录》（页五十七）云：是年春，先生“病瞽，犹事论著，倩写官录草。”又先生是年作《邵与桐别传》，（在《庚申杂订》内）亦云，“今目废不能书；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口授大略，俾儿子贻选书之。”

《庚申新订》中有《书原性篇后》一篇，虽不能确定为此年之作，然其言大可引来归结先生一生论学之基本见解。《原性篇》乃孙星衍所作，见《问字堂集》卷二。先生论之曰：

> ……孙君《原性》之篇，繁称博引，意欲独分经纬，而按文实似治丝而棼之矣。……姑就其文论之，……其说无稽，不待辨也。挟求胜之心，持一隅之说，欲于棼如乱麻之中独辟宇宙，正如阴阳反复，后人复起而争，何时已乎？秦王遗玉连环，赵太后金椎一击而解。今日性理连环，全藉践履实用以为金椎之解。博征广譬，愈益支离。……今人自谓折衷前圣，恐如汧阳豕味，幸无庖人为左证耳。岂可谓定论哉？孙君言圣人贵实恶虚，是矣。不知《原性》之文，正蹈虚言之弊。宋儒轻实学自是宋儒之病。孙君以为三代之学异于宋学，当矣。顾以性命之理，徒博坚白异同之辨，使为宋学者反唇相讥，亦曰“但腾口说，身心未尝体践。今日之学，又异宋学？”则是燕伐燕也。……

是年《庚申杂订》中有《浙东学术》一篇，也可与此参看。先生说：

>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浙西之学，……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
> ……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先生主张人事之外别无所谓义理，即是上文引的“今日性理连环，全藉践履实用以为金椎之解”的意思。此言与近年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史观甚相近。

这年谢启昆、胡虔修《广西通志》，颇用先生之法。(《姚鼐文集·谢墓志铭》，《柿叶轩笔记》，嘉庆《广西通志》。)

嘉庆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先生六十四岁。

是年夏，为汪辉祖作《豫室志》，“中有数字未安，邮筒往反，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绝笔。”（汪辉祖《梦痕余录》页五十七）

先生卒于是年十一月（同上）。未死时，（章华绂《〈文史通义〉序》云“易箦时”。《梦痕余录》云“数月前”。）先生把所著的文稿请他的朋友萧山王宗炎（谷塍）校定。宗炎《晚闻居士集》有《复章实斋进士书》，即讨论编校先生文稿者。

友人吴兰庭（胥石）亦卒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七十二。先生尝言：“今之可与言史者，惟二云与胥石耳。”（据严元照《悔庵学文集》吴传）

先生之妻姓俞，生子二：贻选、华绂。（《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汪龙庄遗书》，章贻选《上朱石君先生书》。）（虽然《家乘》说华绂是蔡氏的子。）

先生有二妾，蔡氏生华绶，曾氏生华练、华纪。（《章氏家谱》）

第五子殇，（《丁巳岁暮书怀》）共有六子。（《章氏家乘》云有五子，则不计殇者。）

先生与俞、曾合葬山阴芳坞。蔡分葬泾口。（《家谱》）

贻选字抒思。举人。自先生死后，授馆为生。自道光甲申以后，连年脱馆，极窘。至戊子秋，求食河南，无所得；庚寅年下，归家。（《家乘》、《家谱》，及刘本《遗书》附录，华绂《〈文史通义〉跋》）以后活动情形不详。

华绂字授史，（《月夜游莲池记》）又字绪迁。（《章氏家乘》）先生令从汪辉祖学史。（《龙庄遗书》、《学治臆说》）道光丁亥戊子前

后，久在河南巡抚幕府。丙戌（一八二六）向长兄贻选索寄先生著述全稿并王宗炎所定目录，丁亥春（一八二七）收得。先录得副本十六册，未完。四弟华练时馆邓州，书言其居停易良俶愿为刊刻，将原稿讵寄邓州。华绂遂无全本。庚寅、辛卯（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华绂得交刘子敬（师陆）、姚春木（椿）将副本乞为复勘，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先行付雕，壬辰十月（一八三二）出板，遂通行于世。华绂作跋，甚能得先生之意。（原跋，贻选《上朱石君先生书》）以后行动亦不详。

华绶出继为垣业后。(《从嫂荀孺人行实》、《家谱》)

华练字祖泉，号仍湖。流寓河南邓州。讵得先生全稿，又不刊刻，竟视以为田畴货物，各得主先人之所有以为利。庚寅脱馆，以后再无消息。(贻选《上朱石君书》、《家乘》)

华纪字竹书，号竹史。有子启昆，字同卿，咸丰初，客梁、宋间，尝印《文史通义》数十部分送友人。辛酉，书板毁于匪。启昆有子季真，字小同。光绪乙丑游幕黔臬，丁丑重刻《文史通义》，戊寅竣事，有跋。(黔本原跋,《章氏家谱》)(适所见《偁山章氏家乘》与名达所得实斋后裔抄来《家谱》颇有不同,兹参用之。)

中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浙江图书馆得会稽徐氏钞本《章氏遗书》，铅印行世。冬，日本内藤虎次郎先生所作《章实斋先生年谱》在《支那学杂志》发表。十一年春，本书初版出版。国人始知章先生。同年秋，刘承干（翰怡）先生所刻《章氏遗书》亦行世。

校后补记

内藤湖南先生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和《读胡适之君新著〈章实斋年谱〉》两文，我于去年五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已译成国文。因内藤先生《研几小录》末页注明了“禁汉译”，所以不曾发表；而且不发表也没有什么关系。

又此书增补本已印成清样时，适之先生恰自北京家里检取了他的《章实斋年谱》校本，我亦恰自故乡回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送清样给我复校，适之先生亦赠校本给我补充。我因清样不易改排，校本又不忍抛弃，和柏丞先生商量了一番，决定把适之先生在校本添写的新史料录在此地。以下便是：

一、乾隆十六年下云：“《章氏会谱德庆四

编》卷一，页十，有《湖北应城县知县章镳本身妻敕》二道，末署‘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十二年疑是二十年之误。敕中有‘清廉克彰乎庶事，慈惠允著乎当官，’之语，似是已任事后之语。”

二、乾隆四十年下云：“按《章氏会谱德庆四编》卷一，页十一，有《国子监典籍章学诚本身敕》，文曰：“……尔国子监典籍章学诚，立程上舍，示范诸生。官冷而地则荣，青衿式化；教彰而典斯渥，紫绶宜颁。兹以覃恩，封尔为修职佐郎，锡之敕命。……’此敕末署‘乾隆四十年□月□日’。”

三、乾隆四十七年下云：“朱筠《笥河诗集》有《忆京华及门章实斋副贡诗》：‘欲杀吾怜总未收，甚都犹为百绸缪。冯生文史偏多恨，刘氏心裁竟莫收。燕市游来稀酒客，闽行壮绝忆书楼。凭君检拂残鱼蠹，有意名山著作否？’先生对朱筠的感情，实在是因为朱筠确是先生的一个知己。”

又，适之先生原本乾隆三十六年叙朱筠奏请开馆校书，末云“此奏似实斋与邵晋涵都曾与闻。”我这增补本把此事移在乾隆三十八年了，但忘录此句，是不该的。读者应知此事和实斋大有关系。

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姚名达记于上海

齐白石年谱

序　一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秋天，齐白石先生对我表示，要我试写他的传记。有一次他亲自到我家来，把一包传记材料交给我看。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写传记的事。

那时我新从国外回来，一时腾不出时间来做这件工作。到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暑假中，我才有机会研究白石先生交来的这些材料：

（一）《白石自状略》（白石八十岁时自撰，有几

个小不同的本子)：

甲、初稿本；

乙、初稿钞本；

丙、初稿修改后印本(《古今半月刊》第35期)；

丁、写定最后本。

(二)《借山吟馆诗草》(自写影印本)。

(三)《白石诗草自叙》。

甲、初稿本；

乙、改定本。

(四)《三百石印斋纪事》(杂记稿本)一册。

(五)《入蜀日记》残叶。

(六)《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白石自撰)。

(七)《白石诗草》残稿本，这里面有临时杂记的事，共一册。

(八)《借出图题》(壬申抄本)一册。

(九》《齐白石传》(未署名，似系王森然作，抄本)一册。

(十)白石老人杂件(剪报、收函等等)一小包。

我读了这些材料，很喜欢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我觉得他记叙他的祖母，他的母亲，他的妻子的文字(那时我还没有看见他的《祭次男子仁文》)都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朴实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他叙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样的感人力量。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做文章的训练，他没有做过八股文，也没有做过古文骈文，所以他的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

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

试举几个例子。白石写他的《母亲周太君身世》，中有这一段：

> 田家供灶，常烧稻草，草中有未尽之谷粒，太君爱惜，以捣衣椎椎之，一日可得谷约一合。聚少成多，能换棉花。家园有麻。太君春纺夏绩，不歇机声。织成之布，先奉翁姑，余则夫妇自著……

又有这一段：

> 太君年三十后，翁弃世，……从此家境奇穷。〔太君〕恨不见纯芝兄弟一日长成，身长七尺，立能反哺。……

前一段记椎谷粒，古文家也许写得到。后段“恨不见纯芝兄弟一日长成身长七尺”，古文家决不敢这样写。白石的传记文字里，这样大胆的真实描写最多。如他说：

> 吾居星塘老屋，灶内生蛙，始事于画。

“灶内生蛙”四个字岂是古文骈文家想得到的！又如他记民国七年在紫荆山下避兵乱的痛苦：

> 时值炎热，赤肤汗流，绿蚁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如是一年，骨与枯柴同瘦，所有胜于枯柴者，尚多两目，惊怖四顾，目睛莹然而能动也。

又如他记民国八年他避兵乱北游时的心绪：

> 临行时之愁苦，家人外，为予垂泪者尚有春雨梨花。过黄河时乃幻想曰："安得手有嬴氏赶山鞭，将一家草木同过此桥耶！"

这都是他独有的风趣，很有诗意，也很有画境。

我读完了白石先生交给我的这些材料，我就把一切有年月可考的记录分年编排，有时候也加上一点考订。当初我本想完全用白石先生自己的话作材料，所以我曾想题名作"齐白石自述编年"。编年的骨干当然是他八十岁时写的《白石自状略》。但我不久就发现了《自状略》引用时必须稍加考订。第一，因为《自状略》的本子不同，有初稿和修改稿的差别。第二，因为老年人记忆旧事，总不免有小错误，故我们应该在可能范围之内多寻参考印证的资料。第三，我最感觉奇怪的是《自状略》的年岁同白石其他记载里的年岁，往往有两岁的差异！《自状略》是他八十岁写的，其时当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从民国二十九年上推，他的生年应该是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但我研

究白石早年的记载，如《母亲周太君身世》等篇，白石是生在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我当时不敢亲自去问他老人家，只好托人去婉转探问他结婚时是和陈夫人同岁，还是比陈夫人小两岁。(白石《祭陈夫人文》说：“同治十三年正月廿一日乃吾妻子归期也，是时吾妻年方十二。是年五月五日吾祖父寿终。”《自状略》说他自己十二岁时祖父死。故我要他替我解答这个编年上的矛盾。如果他和陈夫人同岁，他们都是同治二年生的了。) 但我得到的只是一个含糊的答复，我就明白这里面大概有个小秘密，我只好把我的怀疑与考据都记在初稿的小注里，留待我的朋友黎劭西（锦熙）先生回来解答。

《齐白石自述编年》是我在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写成的。我把一本清钞本送给白石老人自己审查批评。我的原稿留在我家里，预备黎劭西回到北平时我要送给他看，请他添补改削。劭西回湖南去了，直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四月才回北平。他和白石老人都是湘潭县人，两家又有六七十年的亲切交谊。所以我早就打定了主意，这部《白石年谱》必须得着劭西的批评订补。他回到北平不到两个月，我就把我的原稿送给他，很诚恳的请求他同我合作，完成这件工作。

黎劭西先生费了半年的工夫，添补了很多的宝贵材料，差不多给我的原稿增加了一倍的篇幅。他的最大贡献，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他时常去访问白石老人和他的儿子子如先生，他的女儿阿梅女士，从他

们的口头手头得着不少资料，可以订正我的错误，解答我的疑问，补充我的不足。最重要的是查得白石老人因为相信长沙舒贻上替他算的命，怕七十五岁有大灾难，自己用“瞒天过海法”把七十五岁改为七十七岁！这一点弄明白了，年谱的纪年才可以全部改正。白石老人变的戏法能够“瞒天”，终究瞒不过历史考证方法！第二，劭西最熟悉湘潭一带的文物掌故，又熟悉白石老人做木匠时代的生活，故他不但替我注释了胡沁园、陈少蕃、萧芗陔、文少可诸人的名号事迹，并且用了许多有趣味的资料，把那个“芝木匠”时代的生活写的很充实，很生动，使我们明了当年湘潭一带的艺术文化背景，使我们知道天才的齐白石受到了那个历史背景的许多帮助。第三，劭西对于绘画与刻印，都比我懂得多多，所以他能引用一些我不知道的文件来记叙白石在这两方面的经验与成就。特别是在学习刻印的经过，劭西的增补最可以补充我原稿的贫乏。第四，劭西有终身不间断的日记，他用了他的日记来帮助考定许多白石事迹的年月。他在自序里曾说他将来也许还可以从民国十三年以后的日记里寻出一点新材料来给《白石年谱》做“补遗”。我盼望他不要忘了这件补遗的工作。

劭西把他订补的《白石年谱》送给我看，那时已是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了。我又请我的朋友邓恭三（广铭）先生把全稿拿去细看一遍。邓先生

是史学家，曾做过陈龙川、辛稼轩的传记。他和他的夫人，他的大女儿，都曾校读过我的《白石自述编年》初稿。恭三看了劭西订补本之后，来问我为什么不曾引用八卷本《白石诗草》的材料。我竟不知道白石自写影印的《借山吟馆诗草》一卷之外，还有一部八卷本《白石诗草》！劭西见我引用了《白石诗草自叙》，他猜想我必定已见了《诗草》全部，所以他也没有复检这八卷《诗草》。我请恭三放手做订补的工作。他不但充分引用了《白石诗草》里的传记资料，他还查检了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湘绮楼全集》，和瞿鸿禨、易顺鼎、陈师曾、樊增祥诸人的遗集。他还没有做完这部分工作，我已离开北平了。在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开始的几天，恭三夫妇和他们的大女儿分工合作，抄成这一部《白石年谱》的定本，辽远的寄给我。

这部《白石年谱》大概不过三万字，是黎劭西、邓恭三和我三个人合作的成果。我们三个人都是爱敬白石老人的，我们很热忱的把这本小书献给他老人家。他在八十五岁时曾有诗句：

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

我今天用这两句诗预祝他九十岁的寿辰。

我们本想请徐悲鸿先生审查这本小书，并且要请

他挑选白石老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来作这本《年谱》的附录。眼看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很感谢汪亚尘夫人和顾一樵（毓琇）先生从他们收藏的白石作品里挑出一些最可爱的精品来给这书作附录。

胡 适 三十八（1949），二，九。

序　二

我从四岁时就跟着齐白石先生一块儿在家乡玩儿，一直到现在，有五十五年之久的关系，所以胡适之先生让我参加撰定他的年谱，真所谓谊不容辞，责无旁贷。

胡先生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已写定初稿四册，那时我正因事离开北平，到三十七年四月才从湘返平，六月胡先生把全稿交给我，我读过之后，心想：第一，所据白石《自述》材料的本身偶有错误，胡先生多用考证的方法发现出来，最好就请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材料上自行

改正。第二，原有材料实在还有不够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纸笔"，即如他学画和刻印的过程，他的生活和他的艺术进展的关系，我虽然也略知道一些，可是并非本行，还得向他做个较长时间的访问。因此，从七月起，过门辄入，促膝话旧，经过半年，就胡先生的原稿随手订补。但是，年纪快到九十岁的白石老人，回忆往事，每不能记为何年。有时先后差上十几年他也不在乎。例如在清宣统元年己酉（一九〇九）以前，他游过西安、北京、上海、南昌、桂林、梧州、广州、钦州以及苏州、南京各地，他自称"五出五归"，经胡先生考订只有三出三归，问他自己，他自己也不能断定，只说："或者有两出两归是在己酉以后吧?"他的次子子如和次女阿梅，现在北平，邀同检讨，他们那时尚幼，也觉"余生也晚"，不敢断定。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我自己的日记是从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写起的，现都藏在北平，何不取来一查？结果就得出他四出四归的证据，还有一出一归是在己酉前一年，那时我已在北京，所以日记中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这么一来，我的直接访问的工作，仍须回到旁征曲引的考据路线上去。

于是我把我的日记来做旁证的材料，凡关于白石先生的记载，打算都摘下来，酌采注入他的年谱中。可惜我这个工作没有彻底做好，因为从癸卯至今四十五年间大小数十册的日记，并且从民国十一年起改用

注音符号写的，从民国十六年起，又改用译音符号的国语新字，要查某人的姓氏名号，不如汉字之容易映入眼帘，非有工夫一行一行的细看不可，所以《白石年谱》中自民〔国〕十三〔年〕以后，就没有逐年逐月检寻我的日记，只把有关的事情抽查几处，补入注中。将来我若是根据自己的日记来自订年谱时，或者还可以给《白石年谱》写出一点儿“补遗”来，也还可以替往来较密而最久的师友们找出一些编订年谱的材料。

在这“回到考证路线”的原则下，邓恭三先生对于这部《白石年谱》的订补工作，是更有价值的；他从白石同时人的著述里，如《湘绮楼日记》等，找到一些有关的材料；又把胡先生所据白石的《自述》材料，复查一遍，拣补了一些。这部稿本重新缮定之后，看起来相当充实，可以出版了。

齐白石先生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但他更从七八十年来的环境中，磨练了基本的实际功力，又收积了广博的创作经验。我对此道，虽幼年跟着他胡乱学习过，究竟不算内行，在年谱的按语中已经偶有几句叙评，应候专家批判，这序中不再絮说了。

黎锦熙　三十八年一月四日

于北平语小社

年　谱

齐氏原籍砀山，明永乐时，落屯于湘潭晓霞峰的百步营。

十三世　盛䆮公。

十四世　添镒公（始葬于杏子坞星斗塘）。

十五世　潢命公，行三，呼为命三爷。

十六世　万秉公，字宋交，行十，呼为齐十爷，白石祖父。清嘉庆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五月五日殁，享寿六十七。配马氏，嘉庆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十二月十九日殁，享寿八十九。

十七世　贳政公，字以德，白石父，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十二月二十八日生，民国

十五年丙午［一九二六］七月初五日殁，享寿八十八。配周氏，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九月初八日生，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二十五日殁，享寿八十二。

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癸亥

十一月二十二日，齐白石生于湖南湘潭县南百里之杏子坞星斗塘老屋。派名纯芝，后名璜；字渭清，又字兰亭（祖父所命）；号濒生；别号寄园、白石山人、寄幻仙奴、寄萍堂主人、老萍、萍翁、阿芝、木居士、老木一、三百石印富翁、杏子坞老民、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

白石之父名贯政，母周氏。白石自记《母亲周太君身世》云：

> 太君，湘潭周雨若女。年十七，归同邑齐贯政。两家皆良民，故清贫。于归日，检箱，太君有愧容。姑曰：“谚云，好女不著嫁时衣。”太君始微笑。三日则恭亲井臼，入厨炊爨。
>
> 田家供灶，常烧稻草。草中有未尽之谷粒，太君爱惜，以捣衣椎椎之，一日可得谷约一合。聚少成多，能换棉花。家园有麻。太君春纺夏绩，不歇机声。织成之布，先奉翁姑，余则夫妇自著。年余，衣布盈箱，翁姑喜之。
>
> 太君年十九，生纯芝，名璜。璜小时多病，每累母。忌食羶腻，恐从乳过。太君过新年，尝不知肉味

……

又白石《三百石印斋纪事》云：

戊辰十一月二十二日乃璜祖父重开花甲之期。……璜生时，祖父尝与祖母言曰：此孙他日当不忘吾诞辰，吾与伊同月同日也。

适按：周太君年十七嫁齐家，年十九生白石。太君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十七当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十九岁当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周太君身世》是白石亲笔，则白石生年自应在同治二年，而咸丰十一年则是他父母结婚之年。白石当七十五岁时，采用星命家“瞒天过海法”，自己增加了两岁。他自己在八十岁时写《自状略》，其实他那时只能算七十八岁。后人依据《自状略》上推他的生年在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实是被他“瞒”了。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丙寅

白石四岁

天寒围炉，王父就松火光以柴钳画灰，教识“阿芝”二字。阿芝，余小名也。

——为人题《霜镫画荻图诗》自注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丁卯

白石五岁

二月，弟纯松生。（字效林，殁于民国十九年庚午，年六十四。）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庚午

白石八岁

［是年］始从外祖父周雨若读书于白石铺枫林亭。

白石幼时，祖父（名万秉）常以指画字以膝上，或以炉钳画灰上，教他认字。一日或数十字，白石能不忘。祖父每叹息。白石的母亲知翁忧孙子无力从学，遂说：

> 儿媳往年有槌草之谷四斗，存于隔岭某银匠家，为买钗计。可取回买纸、笔、书本。阿爷明年邀村学于枫林亭，纯芝可免束修，朝去夜归，能得读书一年。
>
> ——《周太君身世》

白石自记读书村学时，每逢“春雨泥泞，祖父左提饭箩，右擎雨伞，朝送孙上学，暮复往负孙归”。

白石自记，他“性喜画，以习字之纸裁半张画渔翁起。外王父（周雨若）尝责之，犹不能已。”

是年秋，白石因病，停止上学。“在家，以记事账簿取纸，仍旧习画”。

白石上村学，不满一年，病愈后，因家贫需人助力，故不再入学，即在家放牛砍柴。白石自记云：

> 一日，王母曰："汝父无兄弟，〔吾〕得长孙，爱如掌珠，以为耕种有助力人矣。汝小时善病，巫医无功。吾与汝母祷于神祇，叩头作声，额肿坟起，尝忘其痛苦。医谓食母乳，母宜禁油腻。汝母过年节，尝不知肉味。吾播谷，负汝于背，如影不离身。今既力能砍柴为炊，汝只管写字！俗语云：
>
> 三日风，四日雨，
> 那见文章锅里煮？
>
> 明朝无米，吾孙奈何？惜汝生来时，走错了人家！
>
> 于是将《论语》挂于牛角，日日负薪，以为常事。
>
> ——以上见《白石自状略》手稿甲本

白石自记他牧牛时的情形云：

> 纯芝及弟纯松尝牧牛，归来迟暮，姑媳悬望。祖母令纯芝佩一铃，太君加铜牌一方，上有"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与铃合佩，云可祓除不祥。日夕闻铃声渐近，知牧儿将归，倚门人方入厨晚炊。
>
> ——《周太君身世》

又，《白石诗草》题画牛诗自注云：

> 余幼年常牧牛，祖母令佩铃，谓曰："日夕未归，则吾倚门；闻铃声，则吾为炊，知已归矣。"

又，《白石诗草》有《山行见砍柴邻子感伤》，自注云：

> 余生长于星塘老屋，儿时架柴为叉，相离数伍，以柴爬掷击之，叉倒者为赢，可得薪。

白石祖母姓马，父名传虎，湘潭人。王闿运撰《墓志》说：

> 生十岁，丧母，能自成立，孝事严父，慈育两弟。年十九，归同县齐君万秉。两姓寒族，……始婚三日，椎髻执爨，井臼躬职。……夫性刚烈，婉之以礼。（白石自撰《祖母墓志》云："万秉公性刚直，负气不平，常与人争论，大母闻之，辄以言解之。"）敬顺舅姑，克和娣姒，尤精纺绩，衣布有余。……有一子二孙，慈勤顾复，每助秋获，带笠负雏。众笑其痴，己增其爱。……

是年十一月，白石的三弟纯藻生（字晓林）。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甲戌

白石十二岁

是年正月二十一日，娶妻陈氏，名春君，是年亦刚满十二

岁（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二十六日生）。

五月五日，祖父万秉公病殁。《白石自记》云：是时“家财仅六十千文，尽其安葬。于是吾父一人耕，儿女多，无计为活，令吾学于木工。吾妻事祖翁姑之余，执炊爨，和小姑小叔，家虽贫苦，能得重堂生欢。”

> 适按：《白石自状略》记祖父死在他十二岁时。他晚年《祭陈夫人文》说：“清同治十三年正月廿一日乃吾妻于归期也。是时吾妻年方十二。是时五月五日吾祖父……寿终。”年岁皆合。但祭文又云：“吾与贤妻相处六十八年。”陈夫人死在庚辰二月（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距甲戌为整六十六年，因白石当七十五岁时自己加了两岁，所以多说了两年。
>
> 熙按：湘俗童养媳与其夫大都年岁相当，先正式举行婚礼，谓之“拜堂”，便在夫家操作。等到成年，择期“圆房”，然后同居。白石与陈夫人是到光绪七年十九岁时才圆房的。

万秉公很早就能认识白石的天才，他待白石也特别慈爱。《白石自状略》记祖父之死云：

> 璜感王父以指画膝，以炉钳画灰，教之识姓名字样；皮衣抱孙睡，孙暖自寒。（自注：王父常以乌羊皮裘抱孙于怀中暖睡为乐。）璜哭泣三日不食。

是年，璜父教之扶犁，后因年小力弱，转学木工。朝为工，暮归，以松油柴火为灯，习画，凡十余年。

白石学木工，初学粗工，后改学小器作，制作精微器物，并雕刻桌椅花纹。因选花样，得见《芥子园画谱》，甚爱之，遂一一摹绘。白石自幼即喜画，这个时期里他学了木匠的技巧，才得见画谱，故他的画不是专从临摹画本得来的。他学木工，雕刻花纹，也和他后来雕刻印章有关系。（参用王森然所记《白石事略》）

白石八十三岁时，有《忆先父》短文云：

> 余少时随父耕于星塘老屋前之田，向晚濯足星塘，足痛如小钳乱夹。视之，见血。先父曰："此草鰕欺我儿也。"忽忽七十余年矣，碧落黄泉，吾父何在！吾将不能归我星塘老屋也！　癸未五月十一日。

《白石自状略》于十二岁以后，二十七岁以前，无记事。他自记《周老君身世》中有云：

> 太君年三十后，翁弃世。……从此家境奇穷。恨不见纯芝兄弟一日长成，身长七尺，立能反哺。太君生六男三女，提携保抱，就湿移乾，补破缝新，寸纱寸线未假人手，劳苦神伤，故中年已成残疾。

从此节可窥见此十余年中的生活情况，先抄在此。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丙子

白石十四岁

十月，四弟纯培生（字云林）。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戊寅

白石十六岁

是年，从周之美学雕花木工。（白石撰有《大匠墓志》云：“周君之美，大匠也，以光绪丙午九月廿有一日死。……君于木工为最著，雕琢尤精。余师事时，君年三十有八。尝语人曰：‘此子他日必为班门之巧匠，吾将来垂光，有所依矣。’君无子，故视余犹子也。越十年，余改业于画。又越十四年，余身行万八千里，三出三返。又越五年，……君死矣。……忆自余从事以来，忽忽二十有九年，与余绝无间言。……”）

白石后来常在齐伯常（名敦元，邑绅）家中作木工。后来“为家公甫（伯常子）画《秋姜馆填词图》”，题诗中追记其事云：“稻粱仓外见君小（自注：余廿七岁前为木工，常弄斧于君之稻谷仓前），草莽声中并我衰。放下斧斤作知己，前身应作蠹鱼来。”

黎戬斋《记白石翁》云：“芝木匠（时乡人呼白石为芝木匠）每从其师肩斧提篮，向主家作业。……陈家垅胡姓，巨富也。凡有婚嫁具办奁床妆橱之属，必招翁为之。矜炫雕镂，无不刻画入神。”

熙按：陈家垅及竹冲一带，胡姓聚族而居，大都巨富，为宋胡安国后，与黎姓通婚姻。白石少时，于两家姻缘最深。戬斋名泽泰，一字尔谷，我族兄薇荪的次子。白石家居时，戬斋每年正月必过

他家拜年，自幼至壮，不曾间断，所以熟悉关于白石的文献。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己卯

白石十七岁

八月，五弟纯隽生。（字佑五。民国十七年戊辰，死于匪乱，年五十。）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壬午

白石二十岁

他晚年《祭陈夫人文》说：夫人“廿岁时，长女菊如在孕，一日无柴为炊，〔吾妻〕手把厨刀，于星斗塘老屋后山右自砍松枝。时孕将产生，身重，难于上山，兼以两手行。”又云：“以及提桶汲井，携锄种蔬，辛酸历尽，饥时饮水，不使娘家得闻。有邻妇劝其求去，吾妻笑曰：‘命只如斯，不必为我妄想。’”

光绪九年（一八八三）癸未

白石廿一岁

九月，长女菊如生（适邓氏）。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戊子

白石廿六岁

正月，六弟纯楚生。（字宝林。死于民国三年甲寅，年二十七。白石有哀满弟的诗与挽联。湘人呼幼为满。）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己丑

白石二十七岁

七月十一日，长子良元生。（字伯邦，号子贞。）

《自记》云：

年廿有七，慕胡沁园、陈少蕃两先生为一方风雅正人君子，事为师，学诗画。萧芗陔、文少可，不辞百里，往教于星斗塘。从此，画山水、人物都能。更能写真于乡里，能得酬金以供仰事俯蓄。

熙按：萧芗陔、文少可两人，是白石最早的画师。萧馆于杏子坞马迪轩家，马为胡沁园的连襟，马告胡：乡有芝木匠，聪明好学。胡始留意。当时白石在赖家垅做雕花活，每夜打油点灯自由习画。乡人见之曰："我们请胡三爷画帐檐，往往等到一年半载，何不把竹布取回，请芝木匠画画？"于是胡更留意。陈少蕃（名作埙，著有《朴石庵诗草》）时馆于胡家。沁园约白石来，对他说："《三字经》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正当此年龄，就跟着陈老师开始读书吧！"陈允不收学

俸钱，日点《唐诗三百首》（湘语课读曰“点书”）。白石仅于八岁时（二十年前）读过半年书，识字太少，只好用“白眼字”暗中自注生字之音，写在书页下端的里面，温习时即偷视之。“白眼字”者，同音通假之极常用字也。先是陈偕齐铁珊读书于一道士观中，白石的三弟为煮茶饭，白石时过之，因识铁珊。铁珊语白石：“萧芗陔将到家兄伯常（见前光绪四年）家画像，何不拜为师？”白石遂以所作自由画李铁拐像为贽，旋至其家（萧家朱亭的花钿，相距约百里），尽传其法。文少可亦家传画像，闻白石师萧，因访白石，数宿，又尽传之。白石自记所谓“学诗画”者，是点唐诗、学画像。他做了十余年木匠，到二十七岁才正式从师，改业做画匠的。（湘俗尚巫祝，神像功对每轴售钱一千。白石自由习画时即优为之。又士大夫家必为祖先绘衣冠像，生时则备写真，名“小照”，白石出师后常被邀请，故能得酬金以赡家用。）从此观摩名作，发展他的天才。

白石晚年有《往事示儿辈》诗云：

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
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自注云：

余少苦贫，廿七岁始得胡沁园、陈少蕃二师。王仲言社弟，友兼师也。朝为木工，夜则以松火读书。

熙按：王仲言先生名训，号蜕园，是我的蒙师，著有《蜕园诗文集》；是年还在从陈师读，附学胡家。

王训晚年有《白石诗草跋》，中有一段足补白石自记的缺漏。王训说：

山人〔齐白石〕生长草茅，少时泼墨以自娱。胡君沁园，风雅士也，见君所作，喜甚，招而致之，出所藏名人手迹，日与观摩。君之画遂由是孟晋，有一日千里之势。沁园好客，雅有孔北海风。同里如黎君松安、雨民，罗君真吾、醒吾，陈君茯根，及训辈，常乐从之游。花月佳辰必为诗会。山人天才颖悟，不学而能。一诗既成，同辈皆惊，以为不可及。当是时，海宇升平，士喜文宴，同志诸子遂结诗社于龙山，酣嬉淋漓，颠倒不厌。其一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熙按：此序中黎君松安即家父；雨民是我族侄，名丹，清黎文肃公培敬之长孙。罗真吾、醒吾弟兄亦世族，其父军职家居，喜文墨，号蔬香老圃。陈茯根亦乡间有文名者。但这个“诗社”甲午后才成立，不是这几年的事。

胡沁园，名自倬，字汉槎，是最有造于白石的一个人。他死后，白石《哭沁园师》绝句十四首，其中有云：

　　廿七读书年已中，顾余流亚蠹鱼虫。
　　先生去矣休欢喜，懒也无人管阿侬。

　　学书乖忌能精骂，作画新奇便誉词。
　　惟有莫年恩并厚，半为知己半为师。

　　平生我最轻流俗，得谤由来公独知。
　　成就聪明总辜负，授书不忘藕花池。

　　穷来犹悔执鞭迟，白发恒饥怨阿谁？
　　自笑良家佳子弟，被公引诱学吟诗！

胡沁园对于白石真有“成就聪明”的大功。

　　熙按：沁园是韶塘胡家，胡家多良田，善经营，惟沁园家不富裕，专事提倡风雅，奖掖后进。藏名人书画至多。辟小园，名藕花吟馆。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

白石三十二岁
《白石自状略》云：

　　借五龙山僧寺为诗社，社友王仲言辈，凡七人，谓为七子，推璜为龙山社长。黎松安、薇荪、雨民为诗友。识张仲飏，得见王湘绮，拜为弟子。

熙按：黎薇荪，族兄，名承礼，号鲸庵，文肃第三子，行六，清光绪甲午翰林，改官四川，庚子即辞职归田，白石印友，摹刻得力最多，事在后五年。张仲飏，一号正阳，名登寿，少业铁工，湘绮弟子，传其经学，亦能诗，后与白石为儿女亲家。湘绮称为“两畸士”。惟白石拜湘绮为弟子事，亦在后五年。湘绮曾语吴劭之——名熙，湘潭人——云：“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我门下有铁匠、铜匠；还有个木匠也好学，但他总不肯为我弟子。”因白石生有傲骨，不愿意人家说他趋附，前诗中所谓“平生我最轻流俗”是也；又其《挽沁园师联》亦有“衣钵信真传，三绝不愁知己少；功名应无分，一生常笑折腰卑”之句。

龙山七子，白石年最长，馀为王仲言，罗真吾、醒吾，陈茯根，谭子荃、胡立三。见白石题《龙山访旧图》小序。

熙按：谭子荃是罗真吾的内兄。胡立三是竹冲胡家的，时为乡绅。龙山诗社常以黎雨民家为集会地点。是年后又组织罗山诗社，则以我家为集会地点。两山相距约五十里。

白石于宣统元年自广州归后，有《与黎大松安书》云：

一日独坐，回忆十年前与公频相晤时，蜕园（王仲言）、云溪（黎裕昆）多同在坐。聚必为十日饮。或造花笺，或摹金石，兴之所至，则作画数十幅。日将

夕，与二、三子游于枇（杉）溪之上。仰观罗山苍翠，幽鸟归巢；俯瞰溪水澄清，见蟚蜞横行自若。少焉月出于竹屿（白竹坳）之外，归诵芬楼，促坐清谈。璜不工于诗，颇能造诗中之三昧。有时公为弄笛，璜亦姑妄和之。月已西斜，尚不欲眠。……璜本恨不读书，以友兼师事公，……迩年以来，奔走半天下，……买山僻地，去白石愈远，平生之知旧艰于来，璜亦艰于往，独坐杜门，颇似枯衲，……安得化身为蜗牛，负其庐置之于罗山之侧！……

熙按：这信是己酉十二月初九写寄的。信中“十年前”的“回忆”，就是从甲午到壬寅约八、九年间的故事。白石翁长于家父实年八岁，长于我二十八岁。是年甲午，他始到我家来画像——因先祖父上年癸巳九月去世，请他来画衣冠遗像的。其时我才四岁，延王仲言师“发蒙”，书桌旁的凳子太高，他常抱我坐上去。先曾祖工画，所藏恣其观摹。相与刻印则稍后。大约这八、九年间，他每年必在我家小住几个月。罗山俗名罗网山，在我家对面里许，是一林阜，中有元末陈友谅近亲古墓；前绕小溪，水自白竹坳来，有杉木桥，故名枇溪。罗山诗社既组成，有时龙山社友亦联合来会于我家之诵芬楼——丁酉年新盖的书楼。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湘潭大旱，有“吃排饭”的——饥民排队到有存谷的人家去吃饭，不必吃光——适社友数十人来聚会，乡人都以为是吃排饭的饥民到我家来了。这信中所叙“造花笺，摹金石，作画，吟诗，弄笛”

等事，我记得十岁左右也都参加过，号小社友，受白石翁的领导。

《白石诗草》卷六，题《画松》诗自注中，述及他和黎雨民相过从的一段旧事说：

余少时极贫，黎雨民过访，信宿不去，夜无油灯，常以松节烧火谈诗。

白石的题画诗中，有两首述及他在杉溪的生活，一首是《曾为旧友黎德恂壁间画松·寄题》，题下自注云："德恂因字松庵。"诗中有两句说："安得安闲情似旧，卧君书屋听溪声。"自注云："黎君书屋外有椒溪。"另一首是《丹枫黄菊画赠黎松庵》，诗云："三十年前溪上路，丹枫乱落黄花瘦。与君颜色未曾凋，人影水光独木桥。"自注云："松庵居杉溪，溪上有独木桥，惟有耕者能过去，非行人桥也。松庵云：'有人能倒退过此桥者，吾愿以佳印石赠。'余竟能得。"

是年二月二十一日，次子良黼生。（字子仁，娶王训女。民国二年癸丑十一月病死，年二十一。参后民国二年谱。）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丙申

白石三十四岁

熙按：白石此年始讲求篆刻之学。时家父与族兄鲸庵正研究此道，白石翁见之，兴趣特浓厚，他

刻的第一颗印为“金石癖”，家父认为“便佳”。此印及其早岁的工笔画“处女作”，多存我家，直到民国三十三年湘潭沦陷，被日兵摧烧殆尽。——家父的《松翁自订年谱》载：自丙申至戊戌共刻印约百二十方，己亥又摹丁、黄印二十余方。这几年白石与家父是常共晨夕的，也就是他专精摹刻图章的时候。他从此“锲而不舍”，并不看做文人的余事，所以后来独有成就。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戊戌

白石三十六岁

十月，次女阿梅生。（适宾氏，夫死改适符氏。）

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己亥

白石三十七岁

见王闿运，拜门作弟子。

《湘绮楼日记》本年正月二十日记：“看齐木匠刻印字画，又一寄禅张先生也。”十一月十八日又记：“齐璜拜门，以文诗为贽。文尚成章，诗则似薛蟠体。”十九日又记：“齐生告去，送之至大马头。”

铭按：“寄禅张先生”当指八指头陀，但《八指头陀诗集》末附有《自述》云：“余俗姓黄氏，名读山，出家后本师赐名曰敬安，字寄禅，近乃自号八指头陀。先世为山谷老人裔孙。”湘绮称为张

先生，可能是他把寄禅的姓记错了。

适按：王闿运说白石的诗“似薛墦体”，这句话颇近于刻薄，但白石终身敬礼湘绮老人，到老不衰。白石虽然拜在湘绮门下，但他的性情与身世都使他学不会王湘绮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诗与文都没有中他的毒。

熙按：近代湘潭有五怪：一和尚，即八指头陀；一铁匠；一木匠；一篾匠（制竹器的）；一牧童。怪在家皆赤贫，绝对无力读书，而能以自力向学，挺出成名。前三人都与湘绮先后有缘；《湘绮楼日记》中的“张先生”，若不是记错了寄禅的姓，也可能就是指他的又一弟子张铁匠。

影摹丁、黄印谱，篆刻大进。（黎戬斋《记白石翁》云：“家大人自蜀检寄西泠六家中之丁龙泓、黄小松两派印影与翁摹之，翁刀法因素娴操运，特为矫健，非寻常人所能企及。……翁之刻印，自胎息黎氏，从丁、黄正轨脱出。初主精密，后私淑赵撝叔，犹有奇气。晚则轶乎规矩之外。”又白石于十年后——宣统庚戌——有《与谭三兄弟刊收藏印记》，略自道其经过：“庚戌前，黎铁安〔按：名承福，字寿承，文肃第四子，行九。〕代无畏兄弟〔谭组安，谭延闿别号；弟组庚恩闿、瓶斋泽闿〕索篆刻于余十有余印，丁拔贡〔可钧〕者以为刀法太娴，谭子遂磨去之。是时余正摹龙泓〔丁〕、秋庵〔黄〕，与丁同宗匠，未知孰是非也。黎鲸公亦师丁、黄，刀法秀雅，余始师之，终未能到，然鲸公未尝相诽薄，盖深知余之纯任自然，不敢妄作高古。今人知鲸公者亦稀，正以不落汉人窠臼耳。庚戌冬余来长沙，谭子皆能刻印，想入赵撝叔之室矣，复喜余篆刻。……湘绮近用印亦余旧刻。余旧句云：姓名人识鬓成丝。……”）

《白石诗草》有《忆罗山往事》诗，述在罗山和黎松庵同

学刻印时事甚详。全诗云："石潭旧事等心孩，（熙按：石潭坝在杉溪下流，距罗山里许。）磨石书堂水亦灾。（自注：余学刊印，刊后复磨，磨后又刊。客室成泥，欲就乾，移于东复移于西，□于八方，通室必成池底。）风雨一天拖雨履，伞扶飞到赤泥（自注：地名。熙按：赤泥冲，在罗山西北里许，山甚深。）来。（自注：松庵闻余得数印石，冒风雨而来，欲与平分。）谁云春梦了无痕，印见丁黄始入门。（自注：余初学刊印，无所师，松庵赠以丁、黄真本照片。）今日羡君赢一着，儿为博士父诗人。（自注：松庵刊印，与余同学，其天姿有胜于余，一旦忽曰："刊印易伤目，吾不为也。看书作诗，以乐余年。"）

熙按：是年（己亥）前数年，竹冲胡石庵父辅臣始介绍白石到皋山黎桂坞（名锦彝，文肃次子，行五）家画像，后渐熟识鲸庵、铁安兄弟。颇自负能篆刻，一日问铁安："我总刻不好，奈何？"铁安答曰："南泉冲的'础石'，挑一担归，随刻随磨去，尽三四点心盒，都成石浆，就刻好了。"白石识其言，自是至庚戌十年间果成名。（为湘绮所刻"湘绮楼印"，戬斋曾钤入所编《东池社刊》次期印辑，纯摹仿丁龙泓法。又杨潜庵言：白石刻印改学扐叔后，在黎鲸庵家见扐叔《二金蝶堂印谱》，大喜，即假去用朱钩存，其精不异原本，至今尚存。此可见其摹习之勤。）"晚则轶乎规矩之外"，乃是他的创格，故晚年名更高。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

白石三十八岁

是年春，全家迁于莲花峰下百梅祠堂。（《祭陈夫人文》。此地即狮子口。）始构借山吟馆。（自作《借山记》云："余少工木工，蛙灶无著处。恨不读书。工余喜读古诗，尽数十卷。光绪庚子二月始借山居焉。造一室，额曰借山吟馆。学为诗数百首。"）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辛丑

白石三十九岁

《自记》云："辛丑识李瀚屏。"蔡枚功谓翰屏曰："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请来相见。"

> 熙按：蔡枚功，原名毓春，字与循，内阁中书，湘绮内弟。李翰屏，名镇藩，甲午举人，时亦官内阁中书。初，王船山裔继美病殁潭市，家父介绍白石往画像，始渐与城市士绅往来。王复介〔绍〕往李家画像。翰屏不可一世，渐与白石成莫逆。

是年十二月十九日，白石的祖母马孺人殁，享年八十九岁。白石记万秉公行十，人呼为齐十爷，因呼马孺人为齐大娘。"晚岁家益贫，日食苦不给，常私自忍饥，留其食以待孙子。"（自撰《祖母墓志》）白石晚年复追记云："马孺人爱孙甚笃。孙纯芝，年将八十，思之泪流伤心。"（《三百石印斋记事》）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壬寅

白石四十岁

到西安。《自记》云："壬寅，识夏午诒（寿田），李梅庵（瑞清，号清道人）兄弟叔侄，郭葆荪（人漳）兄弟。"

"是岁之冬，夏午诒由西安聘为画师，教姚无双。（夏午诒的姬人。白石曾自刻小印，曰'无双从游'。）风雪过灞桥，远远看华山。到时，年将终，识樊樊山（增祥，时任陕西臬司），晤张仲飏、郭葆荪。游碑林、雁塔坡、牛首山、温泉。"

由湘之西安，道出洞庭湖，画《洞庭看日图》。《白石诗草》卷二有诗追记此事，题下自注云："余壬寅冬之长安，道出洞庭，即画此图。"《白石诗草》卷七又有《灞桥》诗记西安之行。

是年四月初四日，三子良琨生。（后名愚公，字大可，号子如；别号渔家村人。娶张登寿女。）

> 熙按：辛丑以前，白石的画以工笔为主，草虫早就传神。他在家一直的养草虫——纺绩娘、蚱蜢、蝗虫之类，还有其他生物，他时常注意其特点，做直接写生的练习，历时既久，自然传神，所以他的画并不是专得力于摹古。到壬寅，他四十岁，作远游，渐变作风，才走上大写意的花卉翎毛一派（吴昌硕开创的风气）。民〔国〕初，学八大山人（书法则仿金冬心）。直到民六、民八两次避乱，定居北平以后，才独创红花墨叶的两色花卉，与浓淡几笔的蟹和虾。黎戬斋《记白石翁》云："翁作画，先学宋、明诸家，擅工笔，清湘（大涤子，即释石涛）、瘿瓢（黄慎）、青藤（徐文长），

得其神髓。晚乃独出匠心，用大笔，泼墨淋漓，气韵雄逸。”又云：“书法出入北海、冬心，疏落有致。诗则清奇灵秀。治印亦有独造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癸卯

白石四十一岁

从西安到北京。还家。《自记》云：“春三月，午诒请尽画师职，同上京师。樊山曰：‘吾五月相继至。太后爱画，吾当荐君。’”

“由西安上京华，道过黄河，望嵩高。到京，居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识曾农髯（熙，衡阳人），晤李筠庵（瑞荃，梅庵弟）、张贡吾（翊六，湘潭人）。”

“五月之初，闻樊山已起行，璜平生以见贵人为苦事，强辞午诒，欲南还。午诒曰：‘既有归志，不可强留。寿田欲为公捐一县丞。……。’璜笑谢之。”

“过黑水洋，到上海小住，还湘。”

熙按：还乡在五、六月间。我的《癸卯日记》：“六月廿六日，上午齐寄园先生来。”是年王仲言先生尚馆我家。

在由陕西来北京的途中，画有《华山图》和《嵩山图》。

《白石诗草》卷六，《自题闲看西山图》诗自注云：“余出西安，道过华阴县，登万岁楼看华山，至暮，点灯画图，图中桃花长约数十里。”

同书卷四，《题雪庵背临白石画嵩高本》有句云：“二十年前游兴好，□□涧外画嵩高。”自注云：“癸卯春，余由西安转京华，道出□□涧，携儿于涧外画嵩山图。”

白石于本年三月到北京后，即与友人肆游京畿各名胜。《白石诗草》第一首为《题画寄樊樊山先生京师》，开首记其初到北京时的一段生活云：

> 十五年前喜远游，关中款段过卢沟。京华文酒来征逐，布衣尊贵参诸侯。陶然亭上饯春早，晚钟初动夕阳收。挥毫无计留春住，落霞横抹胭脂愁。（自注：癸卯三月三十日，夏寿田、杨度、陈兆圭，在陶然亭饯春，求余为画《饯春图》以记其事。）琉璃厂肆吾所好，铁道飞轮喜重到。……

白石在游长安之前，曾作《借山图》，亦名《借山吟馆图》。其后他游西安、北京、江西、广西等地，都“自画所游之境”，总名《借山图卷》。《白石自状》不记作图起于何时。我细检《借山图题词》钞本，见其中有年月可考者重加排比，始得考定《借山图》的最早一部分是在他游西安之前画的。如谭延闿题两绝句，款题“壬寅六月”，这是在他游西安之前半年。又如徐崇立题的六绝句，有长跋云：

> 寄园先生自画所居借山吟馆为图，并自题两绝句。一时朋簪和者甚众。见而心赏，雅欲续貂。尘事匆匆，游即罢去。壬寅残腊，相遇于长安，……出纸属题，得偿夙愿。事隔两年，重逢异地，亦自幸墨缘

为不浅矣。……癸卯早春同郡徐崇立初稿。

这篇跋最可证明白石初画的是《借山吟馆图》，其时约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后来白石遍游南北好山水，每“自画所游之境”，范围年年扩大了。日子久了，他自己也不记得他开始在何年了。他甚至于不记得他自己原题的两首绝句说的是什么了。许多题诗的都是和他的原韵，第一首用还、关、山韵脚；第二首用风、蛩、钟韵脚。但白石在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自题《借山图题词钞本》云：

……黎苏庵诗是用余原韵。余原韵诗亦不见，余自忘矣，追思不可得也。

熙按：苏庵名承畸，文肃幼子。

樊增祥题的长歌，款为“光绪癸卯中和节”，中和节是二月一日。樊诗有句云：

山人无山却有山，湘波如镜开烟寰。
……
君有青山画里看，人有青山门外闲。
……
山人所至工修饰，纸窗竹屋明如拭。
一双米家虹月船，四面嘉陵山水壁。
竹林主人笑拍手，其人与屋皆不朽。
……

此诗可见《借山图》最初的状态。

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甲辰

白石四十二岁

春间偕王闿运至江西，游庐山、南昌等地。秋还家。

《白石诗草》卷五，《滕王阁》诗题下自序云：“甲辰春，余侍湘绮师游庐山。秋七夕，湘绮于南昌邸舍招诸弟子联句，湘绮师首唱云：‘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

《自记》云：

> 甲辰，侍湘绮师远游南昌。七夕，师赐食石榴，招诸弟子曰：‘南昌自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寂然。今夕不可无诗。’坐中有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及璜，推为‘王门三匠’。登滕王阁，小饮荷花池。游庐山。

> 熙按：铜匠曾招吉，衡阳人，时在南昌以制造空运大气球为业，可坐二人，任风吹行，但试验时坠水。白石说他常著官靴，每自表示其能文章。

又《借山馆记》云：

> 甲辰春，薄游豫章。吾县湘绮先生七夕设宴南昌邸舍，召弟子联句。强余与焉。余不得有佳句，然索

然者正不独余也。始知非具宿根劬学，盖未易言矣。

“中秋归里，删馆额‘吟’字，曰‘借山馆’”。

熙按：我的《甲辰日记》：“十一月六日，寄园先生来。”“七日，灯下，与寄园先生学魏碑用笔法。”这是他从李筠庵处得来的。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乙巳

白石四十三岁

游广西。自记云：“汪颂年（诒书）为提学使，偕游桂林，看佳山水。小游阳朔，穿走诸洞。”

《白石诗草·忆桂林往事》诗有自注云：“乙巳年余初客桂林。”又云：“乙巳冬，蔡松坡亦客广西，欲从事于画，余未敢应。”

《峭壁松林图》诗自注云：“余曾游桂林，息峭壁下，有牧童自言：‘此间多狐，常诱人入丛林中，数日不放，人亦忘归。’问山名，牧童不答。”

在桂林，开始以刻印为活，樊樊山为定润例。《忆桂林往事》诗自注云：“乙巳年，余初客桂林，其篆刻纯似龙泓、秋庵，樊山先生定为书定润资：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丙午

白石四十四岁

游广东。冬，还家。

熙按：我的《丙午日记》："十月十二日，上午齐寄园先生来。"这年我十七岁，家居读书，记得那天白石翁吃过午饭就乘原轿回家去了，说不久就要上广东去。

始置田地建房屋于茶恩寺茹家冲。（前曰"借山"，至是"买山"。）

是年十二月初七日，长孙秉灵生。（良元子，字近衡，号移孙。白石十一月二十日移居新屋，不一月生孙，故名"移孙"。乡人祝之曰："人兴财旺"。后肄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校。民国十一年十一月病死，年十七。）

《自记》云：

越年节（乙巳年节），得父示，四弟与贞儿从军到广东，命璜追寻。璜过苍梧，至广州，居祇园寺，探问，则已移军钦州矣。璜到钦州。郭宝荪（时官钦州兵备道）留之教姬人画。游端溪，谒包公祠。复随军到东兴，过铁桥，看安南山水。久客思归，携四弟与贞儿由香港海道至上海。一日，思游虎丘山。是日至苏州，天色已晚，宿驸马府堂。虎丘归后，复寻李梅庵于金陵。居三月还家。

适按：《白石自状略》这一节，自"越年节"以下，不记年月。考其行踪，自广西梧州南下，到

广州，又到钦州，则在广东省的西南角；又游端溪，则在肇庆府高要县，在广州的西面；后来又随军到东兴，东兴是钦州防城县最接近安南之地：故过铁桥即可看安南山水。大概白石在广东前后住了两年以上——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到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己酉还家，由香港海道回到上海。白石在上海，也住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他游虎丘，寻李梅庵于金陵，都是宣统元年己酉的事（参看己酉年谱）。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丁未

白石四十五岁

春，到广东钦州。（自忆是坐轿到广西梧州，再坐轮船转海道去的。）冬归。

适按：白石往高要县，游端溪，大概是在这年的春夏。《题石门画册》诗之《鸡岩飞瀑》一首，白石自注云："丁未春夏，余小住肇庆，尝偕郭憨庵游鼎湖山，观飞泉潭。"此可见白石为郭葆荪姬人教画，游端溪，都是丁未小住肇庆前后的事。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戊申

白石四十六岁

仍游广东。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己酉

白石四十七岁

从上海回湘潭。在回湘之前，他曾游苏州，并于中秋节“携儿辈同游虎丘”，后又访李梅庵于金陵。盘桓于沪、苏、南京诸地凡三月。《白石诗草·题画寄樊樊山先生京师》诗中有自注说：“己酉八月十五日夜，携儿辈同游虎丘。是夜无月，借人瘦马，几惊，危险。”《自状略》说：“虎丘归后，复寻李梅庵于金陵，居三月，还家。”

《借山图题词》钞本有虞山病鹤题的《青玉案词》，款云：

> 宣统元年己酉九月，白石先生归湘潭，谱此送之。即题于《借山图册》。虞山病鹤，同时客海上。

据此，知道白石归家在本年九月。

> 熙按：我的《己酉学堂日记》：“十月初八，午饭后至胡宅（在通泰街），晤寄公、云溪、仲师（时馆胡家）、仙甫（沁园长子）、五丈（即胡石庵，主人也）……”是时我在长沙优级师范学堂读书，常往胡家。）

白石于壬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作《〈白石诗草〉自叙》，开篇即说：

> 壬寅年，吾年四十，始远游。至己酉，五出五

归，身行半天下。

自壬寅至己酉（一九〇二——一九〇九），白石游览佳山水有六大处：壬寅自湖南到西安，癸卯自西安到北京，由海道经过上海回湖南。此一出一归也。甲辰游江西南昌与庐山，是年回湖南，此二出二归也。乙巳从湖南到桂林，看广西山水；丙午从广西到广东，回湖南。此三出三归也。丁未春游广东，冬回湖南。此四出四归也。戊申复游广东，由海道到上海，至己酉九月始回湖南。此五出五归也。他游览了六大处山水（陕西、北京、江西、广西、广东、江苏）。

《诗草自叙》说：

> 壬寅……至己酉，身行半天下。虽诗境扩，益知作诗之难。多行路，还须多读书。故造借山吟馆于南岳山下，……熟读唐宋诗，不能一刻去手，如渴不能离饮，饥不能离食。然心虽有得，胸横古人，得诗尤难。

《自状略》也说：

> 造一室，曰借山吟馆，置碧纱厨于其中，蚊蝇无扰。读古文诗词，吟新句。将所游好山水初稿重画，编入《借山图》，共得五十余图册。余闲种果木三百株。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庚戌

白石四十八岁

是年黎鲸庵于岳麓山下新造听叶庵，九月，邀白石往游。

《借山吟馆诗草》有《孤吟寄黎凫衣》诗，题下自注云："凫衣者，黎承礼辛亥后自呼也。"诗末自注云："庚戌冬，凫衣于〔岳〕麓山下造一室，曰听叶庵，招余游焉。"

又，《凫衣和前题，次韵赠之》诗自注云："凫衣和诗云：'探梅莫负衢山约'。时正九月。"

铭按：衢山为天衢山，在湘潭城南五十二里，见白石《老病兼寄凫衣》诗自注。

熙按：麓山湖南高等学堂即岳麓书院旧址。是年黎鲸庵为监督，张铁匠为教务长，招白石游山，寻李北海《麓山诗碑》。后白石壬子岁和鲸庵诗有"麓山无复寻碑梦"之句。(我的《庚戌学堂日记》："十一月十七日，晚至胡宅，晤五丈、仲师，及寄园。"是白石冬间尚在省垣也。)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辛亥

白石四十九岁

在长沙，求王闿运为他祖母马孺人作《墓志铭》，并求他写碑。《墓志》的大概，已引见前文。

是年三月十八日清明节，节后二日，白石应王闿运之邀，到瞿鸿机家看樱花和海棠，并禊饮于瞿家的超览楼。

上两事在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中记载甚详：

二月廿六日，未朝食，齐濒生来求文。

三月九日，阴，当招齐木匠一饭，因令陪军大（指瞿鸿禨，因他曾任军机大臣）。

〔三月〕十日，晴。午初过，子玖（瞿鸿禨字）同请金（甸臣，嘉兴人）、谭（祖同）、齐（白石）看樱花海棠。子玖作樱花歌，波澜壮阔，颇有湘绮笔仗，余不敢和，以四律了之。坐客皆和。……谈宴一日始散。

四月六日，作《齐志》。

〔四月〕七日，作《齐志》成。

白石《自记》云：

壬子春，闻湘绮师又来长沙，居营盘街，璜往侍。谭三兄弟邀往荷花池上，为其先人写真。忽湘绮师函示云，明日约文人二三，借瞿氏超览楼一饮。……得见超览楼主人及诸公子（主人即瞿鸿禨，公子之一为瞿宣颖）。湘绮师曰："濒生足迹半天下，久未与同乡人作画，可为画《超览楼禊集图》。"……璜因事还乡，久未画图报命。

铭按：据《湘绮楼日记》所载，知道王、瞿共邀白石诸人禊集看花，确实是在宣统三年三月。白石的《自状略》各稿本皆作"壬子春"，是向后错了一年；瞿宣颖作《白石翁八十寿文》，中记此事，

谓在“宣统己、庚之间”，又向前错了一二年。瞿宣颖转载《状略》（《古今半月刊》三十五期，页十五）无“壬子春”三字，将此事并入辛亥年，是不错的。

熙按：辛亥是也。白石写真，能于纱衣里面透视袍褂上之团龙花，自称为绝技。又于地毯右方角上画一“湘潭齐璜濒生画像记”小印。此皆于是年所画谭组庚衣冠像上可以窥见。组庚行四，为“谭三”组庵弟，瘵殁于己酉八月，在辛亥革命前。又《湘绮楼日记》中之“谭祖同”，即瓶斋，行五。

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壬子

白石五十岁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癸丑

白石五十一岁

十一月，次子良黻病死。（白石有《祭次男子仁文》，略道自己的生平，节抄在此，可印证前此十余年间的事：“吾居星塘老屋，灶内生蛙，始事于画，为家口忙于乡里。仁儿兄弟虽有父，实若孤儿。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春，借山狮子口居焉。仁儿年六岁，其兄十二岁，相携砍柴于洞口；柴把末大如碗，贫人愿子能勤，心窃喜之。夏，命于稻草棚于塘头守莲，一日吾入自外，于窗外独立，不见吾儿，往视之，棚小不及身，薄且筛日，吾儿仰卧地上，身着短破衣，汗透欲流，四旁野草为日灼枯，余呼之曰：‘子仁！睡耶？’儿惊坐起，抹眼视我，泪盈盈，气喘且咳，似恐加责。是时吾之不慈尚未自觉也。卅二年冬，买山于此

处，至民国二年秋，八阅寒暑。八年之间，吾尝游桂林及广州。吾出，则由吾儿省祖理家，竹木无害。吾归，造寄萍堂，修八砚楼，春耕小园，冬暖围炉，牧豕呼牛，以及饭豆芋魁，摘蔬挑笋，种树养鱼，庋书理印，琢石磨刀，无事不呼吾儿。此吾平生乐事也。儿事父母能尽孝道，于兄弟以和让，于妻女以仁爱，于亲友以义诚；闲静少言，不思事人，夜不安宿，绝无所嗜。年来吾归，尝得侍侧，故能刻印。因宣统三年之变，急于妨害，始习枪击，遂好打猎。世变日亟，无奈何，九月初六日忍令儿辈分爨。十一月初一日，吾儿病作，初八日死矣……初三日尚坐吾厨下，手携火笼，足曳破布鞋，松柴小火，与母语尚愁其贫，不意人随烟散！悲痛之极，任足所之，幽栖虚堂，不见儿坐；抚棺号呼，不闻儿应。儿未病，芙蓉花残；儿已死，残红犹在。痛哉心伤！膝下依依二十年，一药不良，至于如此！……”）

熙按：白石所造之寄萍堂，后园有竹笕通泉，客来烧茶，不待挑水。室内陈设雅洁，作画刻印之几案，式样古简，皆自出心裁。大约清末民初数年间是白石乡居清适、一生最乐的时期。他那时也实有“终焉”之志。他的创作天才多表现于日用的门帘几席间。所御都具机轴，非凡品。民六避乱离乡以后，环境才促使他更扩展到艺术上进一步的成就。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甲寅

白石五十二岁

家居。《借山吟馆诗草》有诗题云：“甲寅雨水节前数四

日，余植梨三十余本。”

是年夏，白石的六弟纯楚死于湘潭。《借山吟馆诗草》有《题六弟小影》诗，题下自注云：“戊申夏，余戏为画小影，壬子冬病归，甲寅夏死矣。因题之。”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丙辰

白石五十四岁

山居，临张叔平画。

是年九月，白石于乡间获观邻人藏画四帧，原题有“柏酒”、“益寿”、“拜石”、“笔林三百八株之余子”等字样。白石临摹一过，自题云：“我见其画笔题字及印章，实系张叔平先生手迹，世人不有萍翁，谁能辨之?”自临画幅又加题云：“戬斋七兄来借山，见余临张叔平先生画，意欲袖去。余知叔平先生与文肃公为同年友，非独喜余画，遂欣然赠之。丙辰十月，璜记于寄萍堂。”

熙按：张叔平名世准，湖南永绥人，道光己酉举人，与文肃同年。擅丹青，工篆刻。白石客皋山黎家时，每假阅而临习之。是亦其画学渊源之一。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丁巳

白石五十五岁

夏五月，避乡乱，到北京。适逢张勋复辟，段祺瑞于马厂

出师致讨，遂又到天津避兵。《白石诗草·京师杂感》诗有自注云："余阴历五月十二日到京，适有战事，二十日避兵天津，火车过黄村、万庄，正遇交战，车不能停，强从弹雨中冲过。易实甫 犹约听鲜灵芝演剧，余未敢应。"又，《白石诗草自叙》云："丁巳春，湘中军乱，草木疑兵，复遁京华。"

樊山本年六月初三日有五言律诗一首赠白石，其小序云：濒生以丁巳五月至京，适有战事。兵后将归，赋诗为赠，即题其集。"

《自记》云：

丁巳避乡乱，窜入京华。旧识知诗者樊樊山，知刻者夏午贻，知画者郭葆荪，相晤。璜借法源寺居之，卖画及篆刻为业，识陈师曾（衡恪）、姚芒父（华）、陈半丁、罗瘿公（惇曧）兄弟（瘿公弟敷庵、惇㬈）、汪蔼士（吉麟）、萧龙友（号息园）。

熙按：白石此次到北京，初未住在法源寺，我的《瑟僩斋日记》："民国六年八月廿六日，下午四时半过排子胡同〔前门外西河沿〕阜丰米局〔内有一大所公馆，郭葆荪家寓此。〕访齐璜翁，不晤，归。"十月十七日下午又往访，仍不晤。"二十三日晚饭后，齐濒翁、朱子翁〔子佩，一号师晦，名德裳，湘潭人〕至。"是时我往宣外香炉营西横街。又是年白石为杨潜庵刻"枕善而居"印《跋》云："余尝游四方，所遇能画者陈师曾、李筠庵，能书者曾农髯、杨潜庵先生而已。李梅痴能书，赠余书最多，未见其人，平生恨事也。潜庵赠余书亦多，

刻石以报，未足与书法同工也。丁巳七月中，齐璜并记，时二十日，由西河沿上移炭儿胡同。”按：所居排子胡同即西河沿；阴历七月二十日为国历九月六日，故我十月七日往访不晤，是他已移榻了。炭儿胡同亦郭宅，有同寓者与白石不相能，故白石不久又移榻法源寺与潜庵同寓。他又为潜庵刻“视道如华”印《跋》云：“余二十年来尝游四方，凡遇正人君子，无不以正直见许。独今年重来京华，有某无赖子欲骗吾友（按：“吾友”指郭葆荪），吾友觉，防之，某恐不遂意，寻余作难，余避之潜庵弟所居法源寺如意寮。倾谈金石之余，为刊此印。丁巳八月廿八日，兄璜并记。”潜庵又谓：据前印《跋》语，民六时，白石尚未与清道人相见，后三年即民九，清道人遂殁，其间白石并未曾至沪、宁，似此，壬寅“识李梅庵兄弟叔侄”，殆未识其本人；己酉“寻李梅庵于南京”，似亦未晤。我因径询白石，他记得在清宣统间，清道人兄弟二人曾到湘潭，寓城内郭武壮祠，相访未值，但最后似见了一面。

是年六月初三日，樊山《题白石诗草》云：

濒生书画皆力追冬心。今读其诗，远在花之寺僧之上。……冬心自道云：“只字也从辛苦得，恒河沙里觅钩金。”凡此等诗，看似寻常，皆从刿心钵肝而出，意中有意，味外有味，断非冠进贤冠、骑金络马、食中书省新煮馀头者所能知。惟当与苦行头陀在长明灯下读，与空谷佳人在梅花下读，与南宋、前明

诸遗老在西湖灵隐、昭庆诸寺中相与寻摘而品定之，斯为雅称耳。……

此即《白石诗草自叙》（初稿本）所记“樊山先生见其〔诗〕稿赠以言，劝予刊之。”

是年七月，陈师曾（衡恪）有诗题《借山图》云：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熙按：师曾是时与我同事教育部编审处，我的《瑟僴斋日记》民六：“十月廿五日，师曾来，谈及濒翁近所刊印，纵横有余，古朴不足。画格甚高，然能赏之者即能评其未到处。……”

是年冬，“湘乱稍息，复还乡。”（《诗草自叙》）《白石诗草》卷一有诗题云：“丁巳十月初十到家，家人避兵未归。时借山仅存四壁矣。”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戊午

白石五十六岁

在湘潭。

《白石诗草自叙》云：

越明年戊午，民乱尤炽，四里烟氛，窜无出路。有戚人居紫荆山下，地其僻，茅屋数间，幸与分居，同为偷活，犹恐人知。遂吞声草莽之中，夜宿露草之上，朝餐苍松之阴。时值炎热，赤肤汗流，绿蚁、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如是一年，骨与枯柴同瘦，所有胜于枯柴者，尚多两目，惊怖四顾，目睛莹然而能动也。(用《诗叙》初稿本)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己未

白石五十七岁

重来北京。冬，又还湘省亲。

《白石诗草自叙》云：

己未，吾年将六十矣，乘清乡军之际，仍遁京华。临行时之愁苦，家人外，为予垂泪者尚有春雨梨花。过黄河时仍幻想曰："安得手有嬴氏赶山鞭，将一家草木同过此桥耶！"

到京华，重居法源寺，以卖画刻印自活。朝则握笔把刀，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是谁使我父母妻子别离，戚友不得相见？枕上愁余，或吟诗一、二首，觉忧愤（一作忧闷）之气从舌端出矣。平时题画亦然。

故集中多绝句，皆非刿心铱肝而出者。

是年九月，纳副室胡氏，名宝珠，四川酆都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小于白石四十岁。)

白石《祭陈夫人文》云：“吾妻不辞跋涉，万里转圆，三往三返，为吾求如妇宝珠以执箕帚。”宝珠姓胡，家在四川酆都县转斗桥胡家冲，父名以茂，为篾工。(见《三百石印斋纪事》)《祭文》中说陈夫人三次北来，均未记年月。

《白石诗草》中有两次提及胡姬，均称做“宝姬”。一见于诗题，谓“宝姬多病，侍奉不怠，以诗慰之。”题下自注云：“宝姬自言有姊从朱姓，有弟名海生，忘其居住地名。”另一处是《题画》诗的自注，谓“宝姬为余理纸十年，余画中之巧拙，必能直指言之。”

因闻湖南有战事，还家省亲。《白石诗草》卷二有诗题云：“己未，三客京华，闻湖南又有战事，将欲还家省亲，起程之时有感而作。”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庚申

白石五十八岁

携子如、移孙同回北京。

《白石诗草》卷四题《老少年》诗有自注云：“庚申春，余携子如、移孙就学京师，至莲花山下忽大雨，避雨旧邻家。时《老少年》方萌动。”

同书卷二有《避乱携眷北来》诗云：“不解吞声小阿长，

携家北上太仓皇。回头有泪亲还在，咬定莲花是故乡。”（自注：莲花，山名。）

自法源寺移居宣武门内石镫庵，大概在这次回北京之后。

正月至三月之间，有花果画册，此册有题记数则，其一云：

> 老萍亲种梨树于借山，味甘如蜜，重约斤许，戊巳二年避乱远窜，不独不知梨味，而且辜负梨花。

此可与上年所记“春雨梨花”的回忆参看。其一云：

> 朱雪个有此花叶，无此简少。

其一云：

> 余画梅学杨补之，由尹和伯处借钩双钩本也。友人陈师曾以为工真劳人，劝其改变。

> 铭按：《白石诗草》卷三，《友人重逢呈画梅》诗有句云：“雪冷冰残肌骨凉，金农、罗聘逊金阳。自注云：“伊伯和名金阳，画梅空前绝后。”
>
> 熙按：尹伯和，湘潭人，清末以画梅著称于时。

白石在二十五年之后印行此册，自题诗云：

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
此翁无肝胆，轻弃一千年。

《自跋》云：

予五十岁后之画，冷逸如雪个。避乡乱，窜于京师，识者寡。友人师曾劝其〔余?〕改造，信之，即一弃。今见此册，殊堪自悔，年已八十五矣。乙酉，白石。（乙酉是民国三十四年，“雪个”即八大山人。）

是年夏，直皖战起，白石携子孙自石镫庵移居东城帅府园以避兵，有《避难》诗记其事云：“石镫庵里胆惶惶，帅府园间竹叶香。（自注：庚申，余携子如、移孙父子祖孙三人避兵帅府园友人郭憨庵家，帅府园为外人保护界也。）不有郭家同患难，乱离谁念寄萍堂。”

石镫庵的老僧好蓄鸡犬，昼夜不断啼吠，故白石在直皖战事停止之后，不再搬回石镫庵，而迁居于西城的观音寺内。又因寺内佛号钟声，睡不成寐，故又迁三道栅栏，后又迁鬼门关外。识朱悟园（羲胄）、林琴南（纾）、徐悲鸿、陈散原（三立）、贺履之（良朴），皆在迁居观音寺以后。

熙按：我的《瑟侗斋日记》民八：“四月十七日五时半过法源寺，晤齐濒翁及杨潜庵（昭俊，湘潭人），话乡情，览何字。”民九：“五月廿四日夜，齐白石翁至，久话。”是时家父亦来北京也。“六月廿九日，濒翁率其子孙至（三子子如，长孙移孙

也)。”“七月十四日，侍父亲及张裕恂（蔚瑜）到齐濒翁处，已迁东城矣。”时正值直皖战争，东城向称保卫界也。自是常来与家父剧谈。“八月八日，八时，随父及裕恂至帅府园六号齐濒翁处，看画及诗。”十八日，“次煌（林世焘，平乐人，甲申翰林）及濒翁来，面后余同至西城观音寺，为看房子，坐朱悟园处。”“廿四日，至观音寺听讲……（时圆瑛和尚在此讲《楞严经》）梁任公亦至。坐濒翁处，新迁来此者。”“卅一日，同遇夫（杨树达，长沙人）过观音寺问房屋，坐白石处。”又白石营居鬼门关——后改名贵人关——时，堂上悬挂王湘绮所书“寄萍堂”横额，自题诗云：“凄风吹袂异人间，久住浑忘心胆寒。马面牛头都见惯，寄萍堂外鬼门关。”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辛酉

白石五十九岁

是年秋返湘，重阳节到家，旋返北京。《白石诗草》卷二有诗题云：“辛酉九日到家，二十五日得如儿京师来电，称移孙病笃；余至长沙，又得如儿书，言病已稳；到汉口又得书，言病大减。作诗以慰如儿之周密。”

熙按：移孙次年十一月病死。

十二月廿日，胡姬生子，名良迟。（行四，字翁子，号子长，娶献县纪昀裔彭年的次女。）

《祭陈夫人文》说："宝珠初生良迟，吾妻恐其不善育，夜则抱之慎睡，饥则送人母室乳之。"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壬戌

白石六十岁

还家，旋返北京。

是年四月，在长沙与张正阳（即仲飏）、胡复初（即石庵）、杨仲子（名钧，号白心，皙子——度——之弟，以工隶书名）、黎戬斋诸人过从。为仲子刻印甚多，为戬斋画鸳鸯芙蕖绫本横幅，极精美。

《白石诗草·卖画得善价复惭然纪事》诗，自注云："陈师曾壬戌春往日本，代余卖杏花等画，每幅百金，二尺纸之山水得二百五十金。"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癸亥

白石六十一岁

在北京。是年陈师曾死，年四十八岁。白石有《师曾亡后，得其画扇，题诗哭之》："一枝乌桕色犹鲜，尺纸能售价百千。君我有才招世忌，谁知天亦厄君年。"

又有《见师曾画，题句哭之》："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党寥寥心益伤。安得故人今日在，尊前拔剑杀齐璜！"

《白石诗草》卷六，《与友人重过三道栅栏话陈师曾》诗自注云："陈师曾七月二十四日来三道栅栏，自言二十八日至大

连。闻在大连得家书，奔祖母丧，死于南京。”

熙按：陈师曾是白石的诤友，也是白石作品的宣传者。(黎戬斋《记白石翁》云：“辛亥以还，湘中多故，山寇出没，乡居不宁，翁仓皇避地，仍游燕京，不求人知。陈师曾携翁画东游，日人出数百金购之。其所作曾选入巴黎艺术展览会，而日人亦将翁之作品及艺术生活摄为影片，献映于东京艺术院，名动海外。”)

熙又按：陈师曾是这年暑天奔祖母丧，到南京后得痢疾死的，夏初还在北京与白石宴饮。我的《注符日记》民十二：“六月三日，十二时到安儿胡同周印昆师（大烈）家吃饭，会了齐白石、陈师曾、杨潜庵、孙伯恒（壮)、杨遇夫、姚石遗、凌直支（文渊）等。”

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胡姬生次子，名良已。(行五，字子泷，号迟迟，娶顺义温氏女。)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甲子

白石六十二岁。

在北京。日记云：“八月初七日，如儿分居于象坊桥，余与百金作移居费。……冬□月，如儿迁于南闹市口。此儿自今春以来，画名大著。……”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乙丑

白石六十三岁。

在北京。日记云：“正月，宾恺南先生（名玉瓒，湘潭人，癸卯解元）来寄萍堂。同客有劝余历游日本者，其言甚切，以为兼卖画，足可致富。余答以余居京华九年矣，可以过活，饥则有米，寒则有煤，无须多金反为忧患也。恺南兄以为余可学佛，谈禅最久。廿四日，余往广济寺寻恺南兄，授予□□□□□□□□□□□□……并赠《净土四经》一书。”

“二月廿九日，余大病。……人事不知者七日夜，痛苦不堪言状。……半月之久，始能起坐。犹未死！六十三岁之火坑即此过去耶?”

是年梅兰芳从白石学画。

《白石诗草》卷二有诗题云：“庚申秋九月，梅兰芳倩家如山约余缀玉轩闲话，余知兰芳近事于画，往焉。兰芳笑求余画虫以观，余诺之，兰芳欣然磨墨理纸，观余画毕，为歌一曲相报，歌声凄清感人，明日赠我以诗。”诗云：“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墨三升。西风飕飕袅荒烟，正是京华秋暮天。今日相逢闻此曲，他时君是李龟年。”黎戬斋《记白石翁》云：“时有某巨公称觞演剧，坐中皆冠裳显贵，翁被延入坐，布衣褴褛，无与接谈者。梅畹华后至，高呼齐先生，执礼甚恭，满座为之惊讶。翁题画诗云：“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有感而发，一时传为佳话。

熙按：白石自言：梅家种牵牛花百种，花有极

大者，巨观也，从此始画此花。后有句云：“百本牵牛花碗大，三年无梦到梅家。”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丙寅

白石六十四岁

春初回湘潭，因乡间大乱，未到家便折回北京。《白石诗草》有“余自校阅此集，至卷六，中有‘紫云山上夕阳迟’句，感泣一首。”开首两句为：“十载思儿日倚门，岂知百里即黄泉。”下有自注云：“丙寅还湘潭，值家园大乱，百里星塘，使我与年各九十之父母不能相见，竟成长别。”

是年三月二十日，白石之母周太君卒于湘潭，享年八十二岁。七月初五日，白石之父贳政公卒于湘潭，享年八十八岁。日记云：

三月十五日得子贞书，知吾母病重，将难治，并需汇钱济急。余心痛不乐。十六日汇百元。……至廿四日，不见子贞再函，未知母亲愈否，尚有猜疑。来北京十年，十日未作画第一度。心殊不乐。兵匪共“乱”，铁道不通，奈何！

四月十九日得贞儿家书，知吾母前三月廿三日巳时逝世。即令人打探，火车不能通，兵匪更炽。即刻设灵位。此大痛心事，非能言尽。总之一言，不成人子至极！

七月七日得贞儿书，言吾父前六月初间得病，病系寒火症，不数日稍愈，复能进饭。忽又病，无论何

食物不进。

八月初三日夜，得快捷家书，未开函，知吾父必去，血泪先下。拭泪看家书，吾父七月初五日申时亦逝！……

余亲往樊樊山老人处，求为父母各书墓碑一纸，各作像赞一纸，共付润笔金一百二十余元。（《三百石印斋纪事》）

白石自作《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其文甚朴实恳切，已引见前。此文记太君晚年生活状况云：

……年将老，纯芝方成立，以画重于中外，太君心中喜乐，精气自强，渐能下床，不治病能自愈。五十岁后，姑亦逝，第六子纯俊及长女先后夭亡，太君连年哭之丧明，两眶见血，心神恍惚，语言无绪。……年七十，湘潭匪盗如鳞，纯芝有隔宿粮，为匪所不能容，远别父母北上，偷活京华。太君二老年共百六，衰老不能从游。……民国十五年丙寅夏历三月之初，太君病笃，医药无功。是时正值南北大乱，道路隔绝。……延息至廿三日巳时，问曰："纯芝归否？我不能再候。不见纯芝，心虽死犹悬悬。"遂卒。……男六人，女三人，孙十四人，孙女五人，曾孙七人，曾孙女三人。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丁卯

白石六十五岁

在北京。

> 熙按：我的《G·R·日记》：六月十日，“下午，齐白石翁来，和他谈艺术教学法。”是时林风眠长北平艺专，请他教中国画。八月廿三日“下午五时，到齐白石家〔原注：跨车胡同十五号〕。”这就是他现在的住址了。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戊辰

白石六十六岁。

在北京，此后改名北平。

是年九月初一日，胡姬生第二女名良欢。（乳名大小乖。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病死，年十九。）

是年秋，白石的长子良元来北平看他，为述家乡乱事。《白石诗草》卷七有诗题云：“戊辰秋，贞儿来京省余，述故乡事，即作画幅一，题句以记之。”诗云：“惊闻故乡惨，客里倍伤神。对影歪兼倒，人踪灭复存。西风添落叶，暮雾失前村。远道怜儿辈，还来慰老亲。”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己巳

白石六十七岁

在北京。

上年白石第五弟死于匪乱。明年，他的第二弟死在家乡。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辛未

白石六十九岁

在北平。

正月二十六日，樊樊山卒于北平，年八十六。

三月十一日，胡姬生第三女，名良止。（乳名小小乖）

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在沈阳发动大侵略行动，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白石“与黎松庵登高于宣武门城上”，有诗纪其事，诗下自注云：“其时东北失守，张学良主义无抵抗。”

是年，曾孙耕夫生。（良元次子次生之长子）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壬申

白石七十岁

在北平。

是年冬，曾一度迁居东交民巷，《白石诗草》卷八有绝句两首记其事。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癸酉

白石七十一岁

在北平。

日记云：“十二月廿三日乃吾祖母一百二十岁诞期，是夜

焚冥镪，另书纸笺焚之，言曰：祖母齐母马太君，今一百二十岁，冥中受用，外神不得强得。今长孙年七十一矣，避匪难，居燕京，有家不能归，将至死不能扫祖母之墓，伤心哉！

是年印行《白石诗草》八卷，有自叙，题“癸酉买镫日，时居旧京西城鬼门关外。”自叙云：“将丁巳前后之诗，付之锓木。”《诗草》有老友王训长跋，作于前一年壬申之冬。

熙按：这部诗草原是樊樊山选定的，所选太少，我给他多收了一些。见他的《自叙》中。

有《癸酉秋自记印草》，文云：

予戊辰年（民国十七年）出印书后，所刻之印为外人购去，印拓二百。此二百印，自无著书权矣。庚午、辛未（民国十九至二十）二年所刻印，每印仅拓存六分，成书六册，计十本，每本计□十□印。壬申、癸酉、（民国二十一至二十二）二年，世变至极，旧京侨民皆南窜。予虽不移，窃恐市乱，有剥啄扣吾门者，不识其声，闭门拒之。故刻石甚少，只成书四本，计十册，每本□印。

以上皆七十衰翁以朱砂泥亲手拓存。四年精力，人生几何！饿殍长安，不易斗米。如能带去，各检一册，置之手侧，胜人入陵，珠宝满棺。是吾子孙，毋背期嘱。癸酉秋八月齐璜白石山翁自记，时居城西鬼门关外。

熙按：跨车胡同亦可称“鬼门关外”。

是年三月，日本军阀侵占热河，战事到了长城。五月以后，在《塘沽协定》之下，北平、天津都成了前线了。白石有戒心，是年春夏，他曾一度迁居东交民巷，借居门人纪友梅楼房，见《挽纪友梅联》自注。《白石诗草自叙》误记为“庚午国难”。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甲戌

白石七十二岁

在北平。

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胡姬生第三子，名良年。（行六，字寿翁，号小翁子。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殇，年五岁。）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乙亥

白石七十三岁

回湘潭一次。《自状略》云：“乙亥夏初，携姬人南还，扫先人墓。乌乌私情，未供一饱。哀哀父母，欲养不存。自刻‘悔乌堂’印。”

有日记云：

阳历四月一日起行，携宝珠、柏云同归。三日半到家。年十八九之女孙及女生（甥）不相识。离家十

余年，屋宇未损败，并有增加。果木如故，山林益丛。子贞、子如兄弟父子叔侄可谓好子孙也。只有春姊（即陈夫人，名春君）瘦得可怜。余三日即别，别时不忍相见。并有二三好友在家坐待相送，余亦不使知，出门矣。十四日还北平。

——《三百石印斋纪事》

又日记云：

余今年衰败叠出，既痛右臂，又痛右腿。最可怕者头晕。（仝上）

《祭陈夫人文》云：

吾年七十五时，一日犬吠聒耳，吾怒逐之，行走大意，脚触铁栅栏之斜撑，身倒于地，……竟成残疾。著衣纳履，宝珠能尽殷勤。得此侍奉之恩，乃吾妻之恩所赐。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丙子

白石七十四岁

游四川。是年阳历四月二十七日离北平，二十九日夜从汉口搭汽船往四川。五月七日到重庆。十六日到成都。八月出川，三十一日到汉口。九月五日回到北平。

有《过巫峡》诗：

怒涛相击作春雷，江雾连天扫不开。
欲乞赤乌收拾尽，老夫原为看山来。

有《客成都留别余生》诗：

不生羽翼与身仇，相见时难别更愁。
蜀道九千年八十，知君不劝再来游。

以上均据《游四川日记》残页。后六年，辛巳（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白石自题日记后云：

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事，兴趣毫无，以至此。九九翁。

《白石自状略》云：

丙子春，蜀人来函，聘请游青城、峨眉。入川，见山水胜于桂林。惜东坡未见也。居重庆两越月，居成都越半年。（此两句以日记考之，似有错误）识方鹤叟（旭），晤诸门人。返京华，识张芀圃。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丁丑

白石七十五岁，自改为七十七岁

在北京。

长沙舒贻上（之鎏）曾为白石算命，说“是年脱丙运交辰运，美中不足。”（就生辰八字推算流年一册，说“辰运：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壬午三月十二日脱。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运，辰与八字中之戌相冲，冲开富贵宝藏，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白石在命册上批记云：“十二日戌时交运大吉。……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关矣。”（批记又云：“交运时，可先念佛三遍，然后默念‘辰与酉合’若干遍。且在立夏以前，随时均宜念之也。……〔十二日戌时〕属龙、属狗之小孩宜暂避，属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类。”）

是年七月七日，日本军人在北平宛平县的卢沟桥发动全面战事。七月二十八日，北平、天津都沦陷了。

《白石自状略》云：“丁丑以前，为艺术学院教授数年，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数年。”

> 适按：白石记此条之意，似是表示在北平沦陷以后，他就没有在学校任教授了。参看民国三十三年谱。

是年二月二十七日（阴历正月十七日），胡姬生一女，名良尾，不育。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戊寅

白石七十八岁（实年七十六岁，以下照推）

在北平。

是年胡姬生第四子，名良末（行七）。日记云："阴历五月廿六日（即国历六月廿三日）寅时，——钟表乃三点廿一分也，——生一子，名良末，字纪中，号耋根。（命册注云：牛者，丑也，纪丁丑年怀胎也。八十为耋，吾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也。）此子之八个字——戊寅、戊午、丙戌、庚寅、——为炎上格。若生于前清时，宰相命也。"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孙秉声生（良迟子，行十，字隐闻。）

《三百石印斋纪事》（是一本不连续的日记）起于癸亥（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终于此年。

宣统三年，王湘绮曾命白石为长沙瞿氏作《超览楼禊集图》，当时他没有画。今年瞿氏后人请他补作此图。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庚辰

白石八十岁

在北平。

二月初得家书，知陈夫人于正月十四日死在湘潭。有《祭陈夫人文》。《白石自状略》一卷，作于此年。此卷有三个稿本，文字稍有异同，纪年也有改动处。其最后改本有结语云：

> 平生著作无多。自书《借山吟馆诗》一册，《白石诗草》八卷，《借山吟馆图》四十二图（陈师曾借观，失少十图），画册三集。尚有诗约八卷，未钞正。挽词及题跋、记事语、书扎，已集八卷，未钞正。画

册可印照稿，可印百集。在此地留连二十有三载，可惭者，雕虫小技，感天下之知名。且喜三千弟子，复叹故旧亦如晨星。忽忽年八十矣，有家不能归。派下男子六人，女子六人，男媳五人，曾孙男女合共四十余人，不相识者居多数！璜小时性顽，王母欲骂欲笑曰："算命先生谓汝必别离故乡。今果然矣。"多男多寿，独福薄，惭然。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壬午

白石八十二岁

在北平。

白石久居沦陷的北平，心情意境往往用诗与画寄托。这时期，他有《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一则说：

> 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 熙按：下署"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是上年写的，大字直幅，现以赐其门役收藏，其门役是清宫一个老太监。

他有《重到陶然亭望西山》词，其下半阕云：

城郭未非鹤语，菰蒲无际烟浮，
西山犹在不须愁，自有太平时候。

又有《跋苦禅画食鱼鸟》云：

此食鱼鸟也，不食五谷、鸬鹚之类。有时河涸江乾，或有饿死者，渔人以肉饲其饿者，饿者不食。故旧有谚云：鸬鹚不食鸬鹚肉。”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癸未

白石八十三岁
在北平。
有《遇邱生、石冥画会》短文：

画家不要〔以〕能诵古人姓名多为学识，不要〔以〕善道今人短处多为己长。总而言之，要我行我道，下笔要我有我法。虽不得人欢誉，亦可得人诽骂，自不凡庸。借山之门客邱生之为人与画，皆合予论，因书与之。

又有《自跋印章》云：

予之刻印，少时即刻意古人篆法，然后即追求刻字之解义，不为“摹、作、削”三字所害，虚掷精

神。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继室胡姬病殁，年四十二。白石在《齐氏五修族谱》批注云：“胡氏宝珠，侍余不倦，余甚感之。于民国三十年五月四日，余在京华凭戚友二十九人，立陈、胡所生之子各三人之分关产业字。并诸客劝余将宝珠立为继室，二十九人皆书名盖印，见分关字便知。日后齐氏续谱，照称继室。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甲申

白石八十四岁
在北平。
有《答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函》云：

> 顷接艺术专科学校通知条，言配给门头沟煤事。白石非贵校之教职员，贵校之通知误矣。先生可查明作罢论为是。(卅三年六月七日)

又有《题画蟹》云：

> 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
> 去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

白石老人虽闭门不出，他已知道敌人已到日暮途穷的境

界了。

是年九月，夏文珠女士来任看护。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乙酉

白石八十五岁

在北平。

重见六十岁时（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所作画册，题一绝句，其原稿为：

> 前身非雪个，何以怪相侔？
> 此老无肝胆，一掷舍千秋！

改稿为：

> 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
> 此翁无肝胆，轻弃一千年！

记此两首，以见白石改诗的功夫。（参看民国九年谱）

白石日记中记梦颇多，今抄他最后一次记梦的日记：

> 三十四年阳历三月十一日，阴历正月二十七日，予天明复睡，梦立于余霞峰借山馆之晒坪边，见对门小路上有抬殡欲向借山馆后走之意。殡后抬一未上盖之空棺，竟走殡之前，向我家走去。余梦中思之，此

我之棺，行何太急？予必难活长久。忧之而醒。

是年秋，敌人投降。十月十日，北平受降。白石有《侯且斋、董秋崖、余倜视余，即留饮》诗云：

柴门常闭院生苔，多谢诸君慰此怀。
高士虑危曾骂贼（此三字原稿作“缘学佛”，后改“常抱佛”），将官识字未为非。
受降旗上日无色，贺劳樽前鼓似雷。
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丙戌

白石八十六岁

十月，乘航机到南京、上海一游。他在南京时，中华全国美术会举行白石作品展览。他在上海时，上海艺术界也举行白石作品展览。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戊子

白石八十八岁

在北平。

近年常过从之弟子，娄绍怀、陈纫兰、李苦禅、李可俨、王雪涛、卢光照、刘冰庵、王庆雯、余钟英、罗祥止、姚石倩、姜文锦等。

跋

对于艺术部门当中的绘画和印章之学，我全然不懂。然而对于一个由木工出身、一跃而为近代艺术界的巨擘，在绘画和治印方面又都别开生面，有其特殊造诣的白石老人，他的艰苦的出身，和他由学习历练以至巍然自成一家的种种经过，我却是一向就感着极大的兴趣，而且怀着极高的敬意的。又因为我在近十年内，连续写成了几本古代人的传记，对于传记文学我也有极浓厚的兴致，很想进而就近代或现代的重要人物当中，选定几人作为我作传记的对象，例如胡适之先生和白石老人便全是我的目标人物之一。

三十五年夏，适之先生由美国返国，我也从四川复员来平，不久我便听说适之先生有试作齐白石先生年谱的计划，又听说白石老人亲自把手边积存的传记材料送交适之先生参考。三十六年的夏天，适之先生利用了那些材料，编成一本简单的年谱，题作《齐白石自述编年》。三十七年六月，适之先生将

稿本送交黎劭西先生，请他再作一番订补充实的工作。黎先生补充完了之后，适之先生又把稿本交与我看，希望我对这本传记能提供一点意见或材料。我翻读适之先生的序文，在其所列白石老人交来的资料当中，只见有《白石诗草自叙》，不见有《白石诗草》之名，后经询问，才知道因为白石老人手边已无此书，而且也没有记起印过这本书，所以在送资料给适之先生时把这书漏掉了。

在《白石诗草》当中，凡可以作传记材料的，我都已摘出补入这本年谱中了。此外应做的工作，便是向白石朋辈的著作中去搜辑一些有关白石生平的资料了。于是我借来了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和《湘绮楼全集》，姚华的《弗堂类稿》，罗正钧的《劬庵文稿》，瞿鸿禨的《诗选遗墨》，易顺鼎的《琴志楼丛书》，陈师曾、罗瘿公和八指头陀等人的遗诗。我遍加翻阅，结果却只有在《湘绮楼日记》中检获了有关于白石老人的三数事，在其余若干种内，偶尔有涉及白石之处，也只是一两首题画诗之类，与白石的生平无关，所以一概没有采用。此外，我所想到的还有樊樊山的诗文。自从光绪三十年樊山、白石识面以后，两人便极相投契，因而在这年之后的樊山的诗文中，必有不少与白石相关涉的。可惜现今有印本流传的全是樊山中年以前的作品，他的晚期作品全未辑印，所以，我虽多方访求，终竟毫无所得。

白石老人的朋友和门生，现时住在北平的也还不少，如陈半丁、徐悲鸿、王雪涛诸人，也应当去向他们采访一些白石的事迹，无奈现时的北平，出门访人也大非易事，这事只有期待于将来了。

有关于白石老人的个性和好尚等等的材料，在白石诗草中

也还可以钩稽一些出来，惟因无法划定其年代和时限，所以不能编入年谱的正文之中，今一并钞录于后，就作为本文和本书的一个结尾吧。

余十年以来，喜观宋人诗，爱其轻朗闲淡，性所近也。然作诗不多，断句残联，约三百余句。丙辰秋为人窃去，因悼之以诗。(卷一　《悼诗》自序)

余生平多病，皆由感受东风之故。每值百草萌动时，头颅作痛。今浅草竟萌，余病益苦。休问旧时宾客，先此聊告诸君。(卷一　《东风寄京师诸友》诗自序)

绝后空前释阿长，一生得力隐清湘。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卷二　《题大涤子画》)

余性嗜蔬笋，席上有蔬菜，其味有所喜者，虽鸡鱼不下箸矣。(卷三　《饱菜》诗自题)

下笔谁教泣鬼神，二十余载只斯僧。焚香愿下师生拜，昨夜挥毫梦见君。(卷三　《题大涤子画像诗》)

青鬓乌丝未唤翁，年年佳日喜秋风。自注：余不乐过春日。(卷四　《看菊，怀沁园师故宅》)

吾画不为宗派拘束，无心沽名，自娱而已。人欲骂之，我未听也。(卷四　诗题)

长恨清湘不见余，是仙是怪是神狐。有时亦作皮毛客，无奈同侪不肯呼。（卷四　《释瑞光临大涤子山水画求题》）

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卅年删尽雷同法，赢得同侪骂此翁。（卷五　《画山水题句》）

余平生工致画未足畅机，不愿再为，作诗以告知老：从今不作簪花笑，跨誉秋来过耳风。一点不教心痛快，九泉羞煞老萍翁。（卷六）

题某生印存（自注：古今人于刻石只能蚀削，无知刻者。余故题此印存，以告世之来者。）：做摹蚀削可愁人，与世相违我辈能。快剑断蛟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自注：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风雅事也。）维阳伪造与人殊，鼓鼎盘壶印玺俱。笑杀冶工三万辈，汉秦以下士人愚。（自注：维阳铸工笑中外收藏秦汉铸印者太愚。）（卷七）

皮毛袭取即工夫，习气文人未易除。不用人间偷窃法，大江南北只今无。（卷七　《梦大涤子》）

天津美术馆来涵征诗文，略以古今可师不可师者以示来者：轻描淡写倚门儿，工匠天然胜画师。昔者尚存吾欲杀，是谁曾画武梁祠。（自注：武梁祠画像古拙

绝伦，后人愈出愈纤巧。）迈古超时具别肠，诗书兼擅妙诸王。逋亡乱世成三绝，千古无惭一阿长。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自注：郑板桥有印文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卷八）

自嘲（自注：吴缶庐尝与吾之友人语曰：“小技人拾之则易，创造者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苦辛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造物经营太辛苦，被人拾去不须论。一笑长安能事辈，不为私淑即门生。（自注：旧京篆刻得时名者，非吾门生即吾私淑，不学吾者不成技。）（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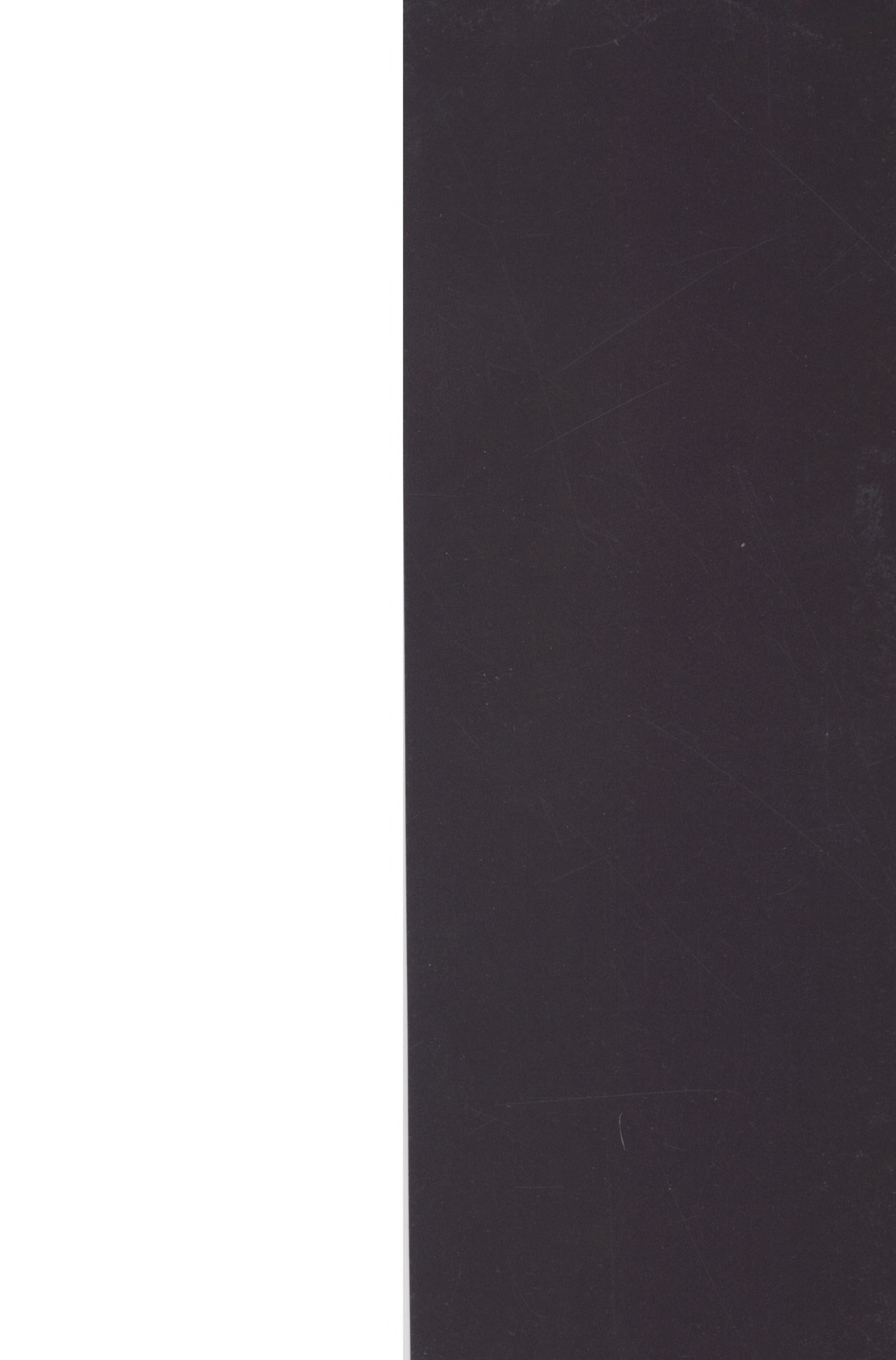
答徐悲鸿并题画寄江南：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异怪，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

雕虫岂易世都知，百载公论自有期。我到九原无愧色，诗名未播画名低。（卷八）

广铭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二日

写于北平东厂胡同一号





胡适

著译精品选

中国古代哲学史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先秦名学史
戴东原的哲学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国语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
尝试集(附《去国集》)
尝试后集
章实斋年谱
齐白石年谱
丁文江的传记
四十自述
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留学日记(上)
胡适留学日记(下)
杜威五大讲演(译著)
哲学的改造(译著)
短篇小说集(译著)



ISBN 7-5336-2483-1/Z・111

定价：13.00 元